

REMEMBRANCE

記憶

DOMESTIC EDITION

国内版

Aperiodic Publication

不定期出刊

追忆似水年华
汇聚天下文章
建立交流平台



《记忆》288期

内蒙兵团专辑（1）

王玉雷主编

【编者絮语】

知青星座，历千万祀，永存其光

【序跋】

雷霆 潮起潮落间，我们在这里

【往事】

王龙毅 15团组建初期

蔡连生 接受“挨饿挨批”的“再教育”

范之光 难忘的逃离——呼市历险记

邱力 兵团往事——从卫生员到大田班

徐卫国 我和我的知青老师们

【人物】

沈岩真 从绝食女生到极左排长

王金堂 炳年之死

——浮光掠影的往事

徐鸿年 指导员 副政委

龚玉 连长杨如玉——兵团战友素描

【附录】

杨如玉的思想汇报

为学习、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建设南街共产主义小社区
舍妻别子、舍生取义——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16周年

【资料】

雷霆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15团二连简介

【本刊声明】

【编者絮语】

知青星座，历千万祀，永存其光

王玉雷

1969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建制，大批来自北京、呼和浩特、包头、伊盟、集宁、锡盟、赤峰、天津、石家庄、保定、青岛、上海、温州、宁波、绍兴等地的中学生奔赴内蒙的偏远地区，在那里度过了最宝贵的青春岁月。知青大返城后，又因为少年失学，且无一技之长，面临种种困境。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知青个人的命运也随着历史的进程跌宕起伏，充满了艰辛的奋斗和鼎力的拼搏。

2019年是知青赴蒙50周年，原内蒙兵团2师15团的知青们写下了一百多篇文章，汇集成一套文集《乌加河之殇》（上下册），其中既有对上山下乡运动具体的回忆和深刻的反思，也有对知青返城后在改革开放中生活轨迹的描述。本专辑从《乌加河之殇》中摘取部分文稿发表，分为“兵团生活”“知青大返城”“后知青时代”三期。为了更全面地反映内蒙兵团的史实，特邀从20团调入15团的知青任国庆回顾了当年20团的重大事件，作为本专辑的专稿刊发。

始于1966年终于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早已成为历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作为文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随着知青返城而宣告完结。对它的评价与对文革的评价同样，至今都未能成为民族的共识和官宣的定论。但是，作为亲历者，知青们用文字留下了时代的记录。知青们的文章重在真实真诚，每个事件每个情节每个人物皆来自亲见亲为，都是真实可信，都有真情实感在内。更可贵的是回忆与反思并重，字里行间蕴含着深刻的思索，开卷畅谈实践着勇敢的表达。他们言道：如果因为知青中个别人跻身于特殊的地位，就以他们肤浅的认知和感受为圭臬，进而去颂扬千百万人所经受的言说不尽的苦难。那将给后人留下伪史、秽史，那将是知青一代人的悲哀和耻辱。

天地之间，只有时间的长河是永久的，如同“黄河、扬子浪千叠，”奔流永续；作为个体，从无不朽，一代人终将灰飞烟灭……

但是知青这颗星座，不管再历千万祀，总还会在天空中发出自己的光芒，我们深信：历史和后人不会无视这个星座……

【序跋】

潮起潮落间，我们在这里

雷霆



有幸在《乌加河之殇》（上下册）一书付梓之前通读了140位作者的160多篇文章。100多万字的体量，在知青文集中已是罕见。上世纪的60年代，一场由上层发动并强力推进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50年中，每个知青的记忆、每个知青群体的记忆都成为这场运动全景中的一块拼图。我们的还原会使这一重大事件的脉络更加清晰，本质更加通透，底色凸显，全景了然。为历史留下真相——这是知青的使命，也是本书的使命。

乌加河是黄河的一个支流，从地图上看位于黄河河道几字形的左上角，乌加河从黄河分流出来流过河套平原又归入黄河，形成套中套的地理环境，当年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2师15团的各个连队，就分散在乌加河沿线。本书的作者除了具备“知青”这个时代赋予的特殊身份以外，还有一个更小众的符号，即全部来自五十年前组建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2师15团。这个知青中的小众，却做了一件大事，在上山下乡运动50年之际，在知青已有不少人年龄进入古稀之年的时候，再次吹响集结号，启动了本书的征文以及后续的编辑出版工作，有近200篇稿件应征，覆盖了15团所有建制单位，各个小单位派出代表，组成了近30人的召集联络群和编辑委员会，全程义务参与。从征文到选文，到三编两核红，到筹钱排版付印等等，期间遇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困难，大家团结起来一一克服，终于迎来了《乌加河之殇》的最后成书。

上世纪1969年至1970年间，国家正承受着文革的劫难，六届滞留学校的中学生以及后来的各届中学生都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下被送往农村边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也应运而生。

1969年至1970年间，全国各地约7万名往届及应届中学生被分配到内蒙古各个地区，填充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六个师几十个团上千个连的编制里。2师15团地点设在内蒙古五原县东北方向一个劳改农场旧址上，先后有来自北京、

天津、山西、河北、呼和浩特、包头以及绍兴温州的4000多中学生到此落户。本书作者当年正是这4000多知青中的一员。其实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969年组建，6年后至1975年就全面撤建了。之后的45年间，原来的兵团2师15团以建丰农场的建制存在至今。当年的知青在内蒙古生活的时间短则3、5年，多则8、9年，超过10年为极个别。

知青在大返城中陆续离开了内蒙古，重新开始了各自的人生。回城后的知青生活的道路是发散的，他们分散在各行各业，遭遇完全不同的境遇，有上学的有下岗的，有的就是普通工人，也有的成为海外学者。知青的身份渐渐隐去，每个人都成为社会的一员，也都有了各自的群体属性。单位的、社区的、家族的，层层网格织就了每个人特定的社会脉络，曾经的知青岁月早已被40多年的城市生活淹没了，覆盖了。似乎知青这个群体也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可能。然而就是这么不可思议，分散到社会各个角落的知青这么多年竟不曾散去。虽然每个人的变化都很大，虽然由于各自原生环境和后半生境遇的不同，知青中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认知上的差异和思想上的分歧，间或带来联络上的疏离。但是，知青这个群体从整体上说却没有散落。15团每个连队都有自己的微信群，今年也几乎都组织了很具规模的下乡50年的纪念活动，大多数连队还组团返回内蒙古，重访当年的兵团旧址。与生命同在的知青情结像磐石，牢牢地把我们铸在一起。任凭时代大潮的冲刷而傲然挺立。在知青们进入晚年的今天，这套记载着我们青春风雨以及人生沉浮的《乌家河之殇》，再次把这个群体的命运和意志凸显出来，令人为之一振又感慨万千。

此书是10年前出版的《那年那月那人》的续集，10年前知青忆文集正呈遍地开花之势，我本人读过的就不下几十本。忆文集各具特色又有着共同的情怀，上山下乡几多艰辛苦难，青春做伴度过苦乐年华。感同身受，每每捧读我常有泪眼模糊，《那年那月那人》一书的后记即为我之所写，题目为《掩卷泪眼已朦胧》，我之心绪可见一斑。

又是10年匆匆而过，这10年，中国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变化，历史的发展如同蜿蜒的黄河，九曲十八弯，有大势的“进”，也有暗流的“退”，潮起潮落间，我们做了什么？《乌家河之殇》就是我们的回答。思想沉淀后的回顾，深刻反思后的追忆，知青们的书写更接近事物的本态和人性的本真，那层固化的

意识形态被突破后，对当年生活的叙述格外清晰实在，有血有肉，拨动心弦。

例如知青运动后期的大返城，是这场运动由兴到衰的重要节点。但是以往的忆文集很少触及。这一段经历是知青心底之痛，是绕不开的话题。本书中关于这段历史的回述揭开了真相，用触目惊心血泪交融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为了拿到一张病退（因病退回原籍）或者困退（家有困难退回原籍）证明，知青们和所有家有下乡知青的家庭，都紧急而悄然地行动起来，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托人情找关系、装病开假证明已是公开的秘密。有的知青为赢得一张疾病诊断证明甚至自伤身体，以致留下残疾甚至断送了生命！

本书上册被我称为镇书石的文章《从逃跑回家到病退回家》（王金堂），把深刻的反思嵌入细微的叙事中，读来如重锤撞击着心灵。所有对青春美丽的描写都在这场悲剧中花容失色，唯一闪烁于灰暗中的是人性的光亮和暖意。文中有一段话直击到悲剧的本质“多么令人悲哀的现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公然地陷入无底线的说谎造假的怪圈中不能自拔，……因为权力在说谎造假，权力也知道自己一直在说谎造假，但权力从不认错，它需要颜面，需要自欺欺人的理由，它胁迫人们以说谎造假来迎合它，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丧失了人的尊严，权力也丧失了合法性的尊严。”书中另外数篇如《丢失的诚信》（徐小棣），《漫漫回乡路》（刘占龙），《一波三折的困退之路》（秦应雷），《当我拿到病退证明时》（施和平）、《心泪》（雷霆）等，都是讲述这一时期的故事。大返城过程中上演的一幕幕悲剧与当初敲锣打鼓把知青送下乡的热烈场面形成强烈的反差，成为这场错误运动的落幕之殇。

对于兵团生活的回忆，本书的内容比之前也有了更丰富客观的描述，比如对当时连队现役军人的回忆文章有大幅的增加，文章立体多元地描述了这个当年对知青实施“再教育”的群体，打破了非黑即白的绝对思维，例如同一位连队干部，有的人回忆中是温暖如兄《亦兄亦长——三连首长记事》（吴仲华），有的人笔下则是无情冷血《一段苦涩的回忆》（赵学军），很矛盾但是很真实。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语境中，人性之善需私交中去体会，斗争之恶往往是在公众前张扬。本书秉承以真为本，只要是真实的，就呈现给读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现役军人杨如玉的回忆文字，从兵团时期担任连队领导到转业到地方工作直至离世，他如同那个特殊时代的活化石，固执地坚守着当初的

信念和行为模式，以至家庭解体儿女反目仍在所不辞。作者龚玉在《连长杨如玉》一文中如实记录了这个悲剧式人物的生前身后事，这个典型人物的典型事件，为后人研判那段历史留下了具象。

内蒙兵团除了知青、现役军人，还有一大批从农村入伍而复员来到兵团的老兵，他们虽然和知青们朝夕相处，但由于生活经历和文化水平的差异，他们几乎和知青没有密切的交融。兵团撤建后他们成了农场职工，后代也几乎都留在了内蒙。以往的知青忆文中极少涉及这个群体，本书填补了这个空白。不仅有《复员老兵今何在》（舒顺林、夏中来、纪颖博）专门讲述老兵们的情况，复员兵卢银元还亲自动笔写下《我在建丰四十年》一稿，实属难得。

本书对兵团生活的回顾和之前的回忆文字比起来，已经淡化了生活劳动的苦和累，更多地表达了知青内心的情感。有父女之情、母女之情、战友之情、恋人之情、上下级之情、患难之情，特别是对善恶之情有鲜明的褒贬。故事的主角有干部，有战友，有家人，有情人也有偶遇的陌生人。从题目中就可以感受到不同视角的思索和感悟，《孙老大和我》（冯桐）、《不离不弃，相依相守》（严翠棉口述，李亚卿、展云馨），《鲜血凝成战友情》（闫利中），《绝食之后》（沈岩真），《那年麦收不平静》（杜毓林），《战斗在探亲路上》（邱伟），《生死之间见真情》（张继伟），《呼市历险记》（范之光）等等，篇篇小文写事抒情，喜怒哀乐跃然纸上，点点滴滴令人动容。

本书对兵团生活的回忆在内容上也有了极大的扩展，兵团营房之外的人和事收入进来，触及更广阔的社会层面。如到农村支农的所闻所见，和驻地军队的互动以及转插到农村后对当时农村现状的具体描述等等，兵团生活外延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为本书增添了厚重之感。特别推荐《指导员、副政委》（徐鸿年），《车过百景一天中》（王玉昌）、《今生我欠自己一个梦未圆》（刘平清），《寻找知青》（詹景荣），《电影让我们结缘》（杜仲秋）。

本书出版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能为后人了解研究这段历史留下具体真实的史料。有几篇文章针对某连某地历史沿革做了系统的记录，数据翔实，纵横有序，可见作者收集整理的一片心血。其中《亲历与见证——记15团组建初期》（王龙毅），《呕心沥血知青园丁——记15团学校》（邢国侠），《几度春秋基建连》（王宝平），《青春的火焰，永远的眷恋》（王会义），《15团宣传队轶事》

（刘春林）《我和兵团战友报合订本》（舒顺林）等，都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

当然，更为精彩的，是本书收录了近百篇讲述后兵团时期生活的文章，这些文字再现改革开放艰难曲折而又激情澎湃的历史进程。这在所有的知青文集中当属首创。知青大返城之际，正是中国进入新的历史转折之时，十年动乱得到纠正，改革开放蓄势待发，知青们离开农村，回到城市，马上被卷入这个历史大潮，开始了新的人生历练。本书中知青们讲述回城后的故事，可圈可点，精彩纷呈，充满了生命的张力。可以看到，知青们的生命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脉动，既有激越的鼓点，也有深沉的旋律，跌宕起伏中显示着不屈的殇之涅槃。

当几乎所有知青都离开塞外返回城市时，北京知青翟新华却在内蒙古的建丰农场潜心耕耘着他的理想之地。作为建丰农场的场长，他从企业管理入手，对人力、生产、工资报酬等制度进行大胆改革，实现了农场经济上的扭亏为赢。他的做法引发农垦系统的震动，关于他的报道直接刊发到当年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可以说，翟新华前卫的理念和认知，像一粒种子撒在内蒙古的土地上，恰逢文革结束、中国走出拨乱反正的历史脚步，犹如春风雨露滋润，这粒种子，竟绽放出惊世骇俗的改革之花。1975年到1980年，是伟大变革的启动期，人心思变势不可挡。1975年到1980年的翟新华，站在风云变幻的最前沿，用热情和智慧探索着改革的雏形。请看本书力作《大鹏一日同风起》（王金堂），实录当年改革起步的风起云涌，实录改革前行者翟新华的心路历程。文中摘录翟新华的数篇日记，是颇为难得的历史见证。

而返城的知青则迎来了新的挑战。首先恢复高考给很多老三届知青带来了成就理想的机会，虽然不限年龄的高考只放开了两年，在录取率只有百分之几的情况下，仍然有不少知青凭着苦读拼搏，考上大学，成为28、9岁的大龄学生，特别是升学不再受家庭出身的限制，使得在文革中倍受压制的“可教育好子女”迸发出极大的动力，这部分人在知青大学生中占有一定比例。除了大学招生，电视大学业余大学也全面开花，没有机会走进大学课堂的知青，不倦地开始了自学的道路，回想起来，那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学习的年代，本书有几篇相关内容的文章，例如《我的高考路》（余师群），《亦真亦幻大学梦》（宋振伟），《我差点没上成大学》（沈岩真），《我在兵团上大学的故事》（叶小兵），《砥砺前行》（潘敬瑶）等，对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从个人命运上做了具体的解读。

在80年代初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整个经济结构经历着极大的震荡和改变。在企业工作的知青率先受到冲击，或企业破产，或自己下岗，或者被命运裹挟着离开了体制内，丢掉了铁饭碗，知青们的人生面临着新的考验。本书中不少文章都再现了这个时期的风云动荡，为改革的进程描绘了真实而动人心弦的画卷。如《风雨之路——我所经历的企业破产》（蔡连生），《下岗之后》（安玉海）《一个69届知青的五十年》（周筑先）《是痛苦的结束，还是磨难的开始》（张会战）《在马耳他的蹉跎中年》（王丽媛），《一袭风尘往事如梭》（张玉珍），《沧海桑田曾经的我》（秦维洁），《自我完善的救赎之路》（尚林）等等。这些文字读起来时而令人痛心疾首，时而又让人荡气回肠。改革开放带给每个人命运中的丰富多彩和酸甜苦辣远胜过兵团生活。当看到在1993年的除夕，周筑先一个人在租用的地下室，一桶桶掏出粪水，当看到张会战在阿联酋的街头为公司的进退奔波，当看到王丽媛在马耳他的中餐馆被炉火熏烤，当看到安玉海从开出租车拉活到56岁时拿下对外经贸大学的硕士学位，当看到潘敬瑶在冲压工的岗位上自学成才获得法学研究生学历，看到当年的知青这些拼搏奋斗的故事，不由得心生敬佩，不由得要为他们点赞。书中精彩文章不能在此一一列举。这些故事记载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风风雨雨，也彰显了知青身上不屈不挠的人格魅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投身金融改革的二十年》（龙涛）一文，这是编委会的特约稿件。作者有幸投身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成为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以及第一支股票上市的参与者和见证者。金融改革是我国结束计划经济启动市场经济的开路先锋，能够率先进入资本运作领域，是当之无愧的改革弄潮儿。此文读过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亮眼之感。

后兵团时代，知青进入各行各业，本书作者对各自工作生活的讲述各具特色，格外丰富。其中《远洋札记》（赵乃明）更是别具一格，把我们带入到远洋轮船的日日夜夜中，真是有惊有险有情趣，不失为一篇佳作。知青回城后恋爱结婚生儿育女，很多小文话家常，写亲情，如《我的家庭别样红》（智美玉）、《女大当嫁》（刘素梅）《爱情亲情友情》（罗友谅）读来暖心很接地气。

本书还有一部分身份特殊的作者，他们从另一个视角解读着当年的历史，这就是来自兵团第二代的文章。兵团第二代是指当年兵团里的现役军人、地方

干部以及农场就业人员的子弟。他们是当年知青老师教出来的小学生。虽然如今这些小学生都已是年过半百，仍然念念不忘师恩。《点点记忆留母校》（赵湖），《尖儿山脚下师生情》（项艳春），《追寻童年的足迹》（修心），都以单纯而美好的孩子的心灵，记住了知青老师带给他们童年的快乐和教诲。当年小学校的知青老师邢国侠以二万字的篇幅写下了《走访兵团第二代》一文，她和同是老师的先生舒老师从北京辗转巴盟几地，走访当年的学生。她笑称学生是“小精英”，对兵团第二代如数家珍，这绵绵不断的师生情，是知青岁月最好的纪念。

当年的小学生徐卫国，后来在巴盟农垦系统工作，他亲自主持启动了兵团博物馆的筹建和开馆，馆内收集了大量与兵团知青有关的文物资料，也包括历年来内蒙兵团知青的各类忆文集。为保存和见证这段历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提笔写下《永恒的记忆，永恒的歌》，倾吐了兵团第二代诚挚的心声，记录兵团博物馆的建立和发展过程，此文于本书有不可多得的特殊的意义。

五十年的风雨尘与土，五十年的光阴云和月，五十年前的知青，以集体的抗争和发奋，决意冲破命运之茧，走出时代之殇，我们穷尽一生的努力，或许有过一功一得的成绩，或许有了小家小户的温馨，但就社会整体而言，就改革开放的道路而言，理想之彼岸到达了吗？本书没有也无法给出确定的回答。征文聚焦在兵团以及改革开放初期中期，而对当下的社会情态言之甚少。当然，反思需要时间的沉淀，离我们最近的生活还不足以让我们整理出清晰的思路来表达。但不容置疑的是，我们心头有挥之不去的沉重之感。本书最具当下时间点的一篇叙事文章《寻医记：不归路之漫漫长途》（龚玉），是一篇极其沉重的文字，从医疗现状谈起，折射社会百态，也提示我们这些独生子女的家长，将老之人不堪的临终晚景。是的，本书没有依照中国传统的大团圆来结尾，而是用这篇文章留下一个沉重的问号。确实，作为知青，我们个人的命运已很难改变，但是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呢，他们将由何种制度决定命运，他们将在什么样的社会情态下生存？他们人生会被怎样的语境引导？中国的前行之路向何方？回顾反思的意义就在于指导前程，我们献上这本书，也献上我们的思考和忧患。尽管，也许在我们谢幕人生时这些问号仍未得解。但我们坚信：历史百转终要向前，我们期待着。

潮起潮落间，我们在这里！📍

【往事】

15团组建初期

王龙毅



今天是2010年1月21日，我脑海中不由地回想起41年前的今天，因为从这一天起，就开启了二师15团的历史。我把记忆中的点滴写出来，失误之处，敬请熟知详情的战友指正。

1968年下半年，在山西大同市，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华北农垦兵团内部就有传言：倪子文政委曾去内蒙古自治区视察了一些农牧场，华北农垦兵团要调到内蒙古，合并原内蒙古兵团，组建新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969年1月21日，这个传言变成了现实。

一、接受任务

1969年1月19日早上，一个由15人组成的先遣组从大同火车站出发，前往呼和浩特市领受任务。先遣组由8名现役军人和7名战士组成，当天下午到呼市，入住内蒙古党校（兵团筹备处临时驻地），等待分配任务。

由于中央军委对兵团还没有正式批复，所以没有新的番号或称谓，20日，先遣组受领了：暂以八团的番号来协商、接收五原县建丰劳改农场的任务。

1月21日下午三点多，先遣组从呼和浩特到达乌拉特前旗，由内蒙古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四分校雇了一辆跃进牌卡车，送我们去建丰农场。

我们当时没有相应的渠道，也没有办法通知建丰农场。对要去的建丰农场一无所知，而司机还不认识路。田团长和王参谋长坐进驾驶室，其余13人坐在卡车车厢里的行李上，汽车颠簸着，向着西北方，向着五原县进发了。

汽车出乌拉特前旗，驶过乌海农场后，一路上见不到几个人，偶尔遇到台拖拉机。从车厢里向车头前方望去，一条黄色的土公路，笔直地伸向遥远的天际。公路两边，除了有的地方长有一丛丛积箕草外，就是白花花的盐碱地，目光所及，树木不多，大多是柳树，稀疏又矮小，呈现一派荒凉。大家坐在车厢

里，话语越来越少。我的心也沉重起来。

汽车以30公里的时速向着西北方向蠕动着，车后腾起漫天飞舞的黄土，形成一个巨大的土龙，遮天蔽日，跟随我们到了五原县城。汽车从东南角拐入县城的东西大道，找人打听后，才知道，我们走过头了，要折返回去十几里地，从一个丁字路口向东，即可到达建丰劳改农场。

掌灯时分，汽车开到了公路的尽头，建丰劳改农场场部到了。汽车停在场部大院门口，田团长让大家不要下车，他和王参谋长拿着介绍信去找农场军管会朱（副）主任接洽。从呼市启程时大家就做好了思想准备，如果军管会不接纳，我们就连夜赶回五原县城住宿。十几分钟后，通知下车，安排住处。大家很高兴，很快就安顿妥当了。

原来，军管会并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只不过是前不久，倪子文政委来视察时，他们有所意识。并且，也是军人间的信任感使然，确信我们的身份，所以同意接纳我们完成对建丰农场的接收。

二、农场概况

第二天上午8点，由八团先遣组和建丰劳改农场军管会联合召开见面会。

农场方面参加会议的有120名管理干部和20名社会工人。朱（副）主任首先把八团的同志做了介绍，让我们相互认识一下。希望大家对八团同志们下去“学习”给予协助，配合（会后，领导提醒：在农场内不可随便叫“同志”）。

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友好，内蒙古是可靠的大后方。国家把很多的南方犯罪（法）、犯错人员集中到内蒙古黄河北岸一带建立一些劳改农场，进行改造。其中，比较有名的有建丰、乌海、中滩和狼山等劳改农场。因此，建丰农场的劳动改造人员里什么人都有，有的还是相当有能力的。他们在修建完包兰铁路，在建丰劳改农场刑满释放后，即在农场落户就业，安家生子，历经多年艰苦劳作，把一片沼泽地改造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机械化农场。

建丰农场场部下辖：农业队7个、机修队1个、副业队1个，还有一所有三四十张床位的简易医院。管理着1200多名劳改就业人员。全场有120多名国家干部，20多名社会工人（区别于劳改就业人员），几十名就业人员子女，还有一些家属，总共两千多人。

建丰农场有八万亩土地，已耕种四万多亩。林、田、路实现了网格化，规划有序，农田是引黄河水灌溉便利，排、灌系统配套，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很好。各种农业机械设施配套齐全，当时是内蒙古劳改局属下的一个机械化农场。

在见面会上，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没有讲明是兵团要接收农场，只是说我们15个人是来学习的。随后几天，先遣组人员分赴各队进行摸底，了解、熟悉情况。主要是各队有多少房屋，结构，可以住多少人，为兵团的大部队到来做准备。我曾去过一队、二队和机修队，了解房屋住宿和生产情况。

1969年1月24日，毛主席、中央军委批准，正式组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即“1.24批示”）。很快，八团先遣组从农场军管会那儿全面接收了农场的管理工作。农场大部分干部和工人转入兵团建制，劳改就业人员等，也按各自情况进行妥善的遣散与安置。二师15团的组建工作，就这样很快公开的、大规模地开始了。

一月末，迎来了第一批兵团战士，他们是呼和浩特市工业技术学校的学生，有三十多人。即：机修连杜军和四连王宜圣、张化仁他们那一批人员。随后到来的是北京电报大楼的下放干部，有二十几位（其中有几个是子女）。3月4、5日，在曹兰琦团（时任副团）长的带领下，华北农垦兵团八团全部人马分两批来到建丰农场，按计划、按编制分驻到各队（连），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15团的番号正式亮相。

三、克服困难开新局

先遣组的到来，很快就打乱了原农场的一切生产安排和政治、生活秩序。因为，“1.24批示”发布后，兵团很快就要接收大量的城市学生和转业军人，形势每天都有变化，工作量大，时间紧迫。

当时，需要尽早、及时地把原场两千多劳改就业人员和他们的家属遣送原籍，或遣散到黄河以南地区，这件事就成为摆在先遣组、农场领导面前的当务之急。时值文化大革命中期，建丰农场和全国的形势一样，比较混乱，所以实行了军事管理，设有军管会。现在，回想起那些日子，当时的确是够紧张、困难和刺激的！

农场的劳动改造刑满就业人员中，有一些是解放前旧政权的军、政、特人

员，情况很复杂。我们刚到时，就听说农场有各种各样的反动组织，什么“地下……军”，什么“……队”，和什么“……团”等不少组织。大家感觉在这里好像挺吓人，挺危险的。

农场的群众也有自发成立的革命组织，在农场内部进行文化革命活动。

文革中，无政府主义泛滥，刑讯逼供横行。建丰农场也不例外，自残、自杀的人员挺多，隔三岔五地就有一起。我们到那儿没几天，就听到了：三队有一个“坏分子”，当看守人员打开门让他起来时，他缩在墙角，不肯起来。看守人员上前拉他，无意中碰到他腰间硬物，撩起一看，肚皮上有一段铁棍子尖儿露出来。原来，是这个“坏分子”自己把捅火炉子的通条从肛门插进去，然后，又坐到地下把通条从肚子里硬顶出来，简直不可思议！当时是跳井的、上吊的常有、割舌头、用刀片儿把自己肚皮划成豆腐块儿的也不稀奇……。

我曾亲历：

1. 机修队宿舍房后一百米就是农场医院。二月的一天，我去医院的路上碰到军管会一个军人手端一个巴掌大的搪瓷碗和我走了个对面，我问他：“你端的什么？”他说：“你看”，我一伸头看见半碗防腐水中泡着半截儿舌头。我明白又是一个不肯交代而自残的。

2. 三月份，在一队里抹脖子自杀了一个“坏分子”，送到医院抢救，没能抢救过来。我正好到医院办事，看到过厅里围了好多人，金吉恒、王培德、吴桐胜几位医生正在忙活着解剖死者。当打开死者胸腔时，看到肺泡上一层黑膜，就和杀鱼剖肚时，鱼肚子里的黑膜一个样。吕医生（院长）说，抽烟的人肺脏就是黑的。从那儿以后，就更坚定了我不吸烟的念头。

3. 二月份，我和郑吉兔、申寅生被分到机修队工作，跟车熟悉情况。在机修队宿舍前的土广场上每天都能看到几个“坏分子”在跑圈儿，跑了一圈又一圈。跑慢了，跑不够圈数或跑不动了，旁边就有人“练”他、收拾他……，这道风景是人们不愿看到的。

记忆中的那个春季里，我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压力。这样的环境下，先遣组和农场要共同完成几千人的大转换，完成15团的组建，有多少艰苦，细致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啊。

1969年春天，对于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来讲是一个困难的春天，各师团都

是一派忙着接新兵、盖营房的景象。有的连队是房屋不够，只好住地窝子和帐篷。大量的学生兵到了，却没有房子住。因此，住房也成了大问题。

我们15团，相比之下，还是比较好的，原农场的房子虽不太好，但劳改就业人员遣散后腾出的房子，还是可以满足初期需要的。可是，随着学生大军源源不断地到来，房子不够住了。各连队都及时地从春播生产安排中，抽调部分劳力，投入到基建盖房，脱土坯的劳动上。脱土坯，看似简单，实际上，是有一定技术含量的重体力活。对新来的城市孩子们来讲，可真是一个严酷的考验。那时，学生兵们刚到兵团，心气足，泥里水里，干得很欢，不怕脏，不顾伤痛，再苦再累也不在乎。我那时在五连开拖拉机，看到小伙子们在烈日炎炎下赤膊熟练的和泥、上模、扣坯，曾被他们精神深深感动过。也曾担心，后面还有割麦子，挖大渠等艰苦劳动在考验着他们，能顶得住吗？

与此同时，平整土地、积肥、春耕春播也在抓紧进行。时间节令不等人，河套地区主要是种植春小麦、水稻和糜子。而春小麦必须赶在三月底，四月初播种入土，否则，全年无收。这对于各连队领导，无疑是带了一帮秀才进京赶考，能行吗？在团领导协调下，各连队发挥留场老农工的积极性，机修连进行春播动员，搞好后勤支援。各拖拉机组想方设法，克服困难，配合所属连队生产。各农业生产连队派出最好的班排配合机务人员，使用播种机械在20天里就基本上完成了全团的春播任务。

那时，我已下到五连，配属五连拖拉机春耕春播。我们这个一号机组有杜孝、王跃新、黄志瑞和我。杜、黄调走后，…从五连补充新兵杜红礼、刘彦生和马长有。拖拉机是白天黑夜的连轴转，人员轮班倒。夜间，平地耙地，把不返浆的，墒情较好的地平整好耙好；第二天白天抓紧把小麦拌上颗粒肥料种下去。每天都要播种二三百亩土地，有时还要更多些。

当时，不违农时，能保质保量地完成小麦播种，留场老农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五连有冯希圣、冯永安兄弟一家人，尤其是冯希圣大哥，白天黑夜的在地里转，是个庄稼通，是连领导得好军师，出了不少点子。也是我的好老师，帮助我合理的安排机械作业顺序，使生产任务能较科学的，按部就班地进行。使我们机务班和连队较好地配合了工作，及时的避免了一些矛盾的产生。另外，我向连领导建议：每晚都要召开各排长、老农工加机务班长的生产碰头会，安

排第二天的生产。郭振声连长采纳了这个建议，并一直坚持下去，效果不错，生产活动有序的展开。后来，其他连队也效仿。

从二月开始，京、津、呼、包各大城市知识青年意气风发，奔赴兵团，响应号召建设边疆。他们来到内蒙古巴彦淖尔河套以后，虽有落差，大多数人为建设边疆做贡献的决心很大，但也客观地存在许多“活思想”矛盾及实际困难。团、连各级领导做了不少思想政治工作，化解一些思想问题。广大兵团战士克服了想家、生活不适应及“娇娇”二气等“小资”情调……，很快就适应了兵团生活。在春播中，学生兵们经受了第一场考验，不少人学会了使用播种机、驾驭牲口、配制颗粒肥等技术，还有人开上了拖拉机。那时，风气比较正，钻研技术的人也不少。

1969年春夏期间，15团各连队基本都是这样的组建、生产、营建齐头并进，成效显著，意气风发地工作着。团、连、排、班各级组织逐步健全，田地里的麦、稻、糜子，农作物长势喜人，一排排新的营房平地而起。团领导带领全体干部、战士，在人新、地新、啥都新的困难局面下，15团的组建工作，走在了全兵团的前面。

四、招才进宝，发展壮大

1967年春天，我们华北农垦兵团八团的一部分战士，从山西省怀仁县河头镇被调到大同市花园屯的华北农垦兵团（农垦学校）直属连。当时，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兵团也是“大字报上墙满天飞，造反闹革命”。有些人把斗争矛头指向了贺龙元帅和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上将及政委廖汉生中将。说什么：华北农垦兵团是杨勇的“私家军”，是杨勇和北京军区“反党、反毛主席的黑部队”。杨世明因为是杨勇的堂哥，所以是杨勇的走卒。华北农垦兵团是一个黑兵团，杨世明是个黑司令。那时，这种言论甚嚣尘上，严重地影响了大家的情绪。

华北农垦兵团组建时间不长，只有三年，由于文革的影响，兵团的发展受到了影响。12个团的编制中，只有1、2、3、4团人员编制比较完整，其余的团人员较少，甚至是空架子。后来有些就撤并了，如10团在应县撤销后，干部到了8团，二师15团的王孟孟副政委、李献之副参谋长等就是原10团的干部。因为种种客观原因，华北农垦兵团没能发展壮大起来，1969年1月中央军委的“1.24批示”发布后，华北农垦兵团奉命到内蒙古，组建新兵团。全体官兵都

认为中央军委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是“反帝、反修，保家卫国、建设边疆”的重要举措，是华北农垦兵团发展壮大的好机会。因此，在八团从大同调动到内蒙古以前，进行思想动员时，人们可自由选择留在大同或去内蒙古，绝大多数人选择了到内蒙古贡献自己的青春，“反帝、反修，建设边疆”。他们作为老战士，在老八团有了三年的磨炼，官兵、兵兵关系融洽，农业生产技能也掌握了一些。最主要的是大家思想安定，建设边疆的信心充足。

在兵团建设的前期，老兵团战士、原场工人、转业军人、是发挥了骨干和决定性的作用的。老八团的战士们，不少人文化水平不高。很多人，原本都是一个班的，现在分散到全团各连队，担任了班排长。在自己面临全新的环境里，努力学习文化，钻研生产技艺，加强团结，搞好学生兵的传、帮、带。在各连队的政治学习、生产劳动及日常生活当中，以实际行动做出了表率作用。是团领导值得信任的一批骨干力量，在15团组建初期，在各种困难压力下，从容地应对了挑战，显示出了他们的作用。

1969年，兵团接收了大批的转业军人，各军、兵种都有，他们大多数人是农村兵。15团领导，对他们的到来非常欢迎，并且很器重转业军人们，几乎都安排了班排长职务。他们中间，有不少人思想觉悟高、素质好，也有较强工作能力，获得了广大学生兵和领导的认可。在各连里转业军人，是属于年龄较大的人员，思想较成熟，考虑问题全面些，因此，是连队领导的左右手。在兵团后期，有的人被提拔为团连干部。可惜的是，由于个别人的无良作为，在学生兵中名声很臭，这也影响了转业军人在兵团的信誉。总之，转业军人在兵团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在兵团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1969年，是15团接收城市知识青年最多的一年，全国各地知识青年来了有三千多人。首先是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小批量的学生，然后是北京、天津等城市的学生。另外，经由各部队或各省国防工办、省军区的渠道也来了不少人。还有少量学生兵是来自浙江省宁波、温州等城市以及全国其他城市的。

1969年文化大革命进入到中期，无政府主义逐步被扭转，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下，国民经济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渐有好转。1969年的春天和夏天，是乌拉特前旗车站和刘召（五原）车站的历史上最繁忙的一段日子。在这里差不多每天都是汽车，拖拉机云集，有大批的劳改就业人员被送走。在这里，差

不多每天都有学生专列到站停靠，走下来许许多多的青年男女学生。

我那时已经调回到机修连，全连有一辆解放牌卡车，一辆嘎斯-51 卡车，一台尤特兹-45 拖拉机，八台千里马-28 拖拉机。这十几部机动车，不分白天黑夜地跑，不是到火车站送走劳改就业人员、就是接学生、拉建材或者就是跑北山拉生活用的煤炭、拉盖房的石头……。司机们虽然很累、很紧张，但心里快活。

京、津、呼、包等大城市来的学生们是 15 团最大的生力军，在 15 团接收的北京兵最多，各个连里北京兵占大多数。他们里面有出身于普通家庭的，也有不少是高干子女。他们年龄小的十六七岁，大的也就是二十二、三岁。很多人是同班同学，还有些是来自北京 101 中、人大附中、北大附中等重点学校。他们当中人才济济，藏龙卧虎。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是兵团建设中的主要力量。经受了兵团沉重劳动的锻炼，顽强的通过艰苦生活的考验，磨炼了意志，使自己的思想道德品质得到了升华。

天津到 15 团的大都是天津五中的学生，初高中学生都有。15 团各个连里几乎都有天津兵。除天津外，别的城市来的学生，来自多所学校，比较分散，不象天津五中那样都是一个学校的，人数也多。和其他地方来的学生比较，天津兵显得齐整、活跃、团结。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在兵团表现非常优秀，堪当重任。

最后说一下现役军人。他们基本都是领导层的，15 团发展的好坏他们是决定的因素，现役军人约占全团总人数的百分之一左右，担任的最低职务是副连职。他们大多数人能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得到了战士们的尊重和拥护。其中，七连连长李方尊在军训投弹训练中，舍生忘死救战友的壮举得到了广大官兵的赞誉，提高了军人在学生兵中的形象。总的来看，15 团各级领导带领广大官兵从春到夏，从夏到秋完成了 10 个农业连队，及机修连、副业连、基建连、医院的建设，还有一些服务性行业设施的健全完善。当年农业生产也取得了较好的收成



15 团的团党委是一个团结的、有战斗力的领导班子，在团场建设工作中没有发生重大失误，巩固和维护了持续、稳定发展的局面，较好地完成了二师 15 团的组建任务，为全团后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18.7.28 修改于太原

【往事】

接受“挨饿挨批”的“再教育”

蔡连生



我是北京69届知青，在1969年8月“接受再教育”来到内蒙古兵团15团2连。下乡6年，经历了兵团初创期到快速衰退的过程。

在我们这些非农非武的学生到来之前，2连是建丰劳改农场的一部分。为了接收兵团战士，把原农场人员迁往内地，只留下少量就业农工。

吃不饱的记忆

听留场农工们讲，原来2连的1万多亩地，每年能产出几十万斤小麦，还养猪、羊、鸡、马。人都能吃饱，还能上交不少的余粮。我们接管之后，一年不如一年，粮食产量越来越低，后勤排养的牲口越来越瘦，养的鸡很快就消失了，养的猪，别说大伙吃肉了，连维持下去积肥都困难。我们大田排的男知青，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比起女生，饭量大、吃的多，比起后勤排的，劳动强度大、时间长。盐水煮土豆，粘馒头（每顿2个，限数）糜子米饭，再生布做的棉衣服。在这种条件下，几个冬天熬下来，大部分人情绪低落，干劲疲倦。

1排有个战士，偶然机会碰到了可以随便吃的好事，他甩开嘴大吃一顿。饭后集合出工，他胃病发作，到团部医院做了手术。术中，从他胃中掏出半盆未消化的食物。几经周折，救治无果死亡。

我也有两次为了吃饱饭险些出事。一次是与同排的杨世伟，从老乡那里买了一只野鸭子，急忙煮熟吃了。吃完才知道，老乡卖的野鸭子全是用农药伴着麦粒做诱饵毒死的，野鸭子死后放不出血来，内脏都是黑色的。当时吃得还挺香，也没有什么反应。多年后，再见到已经当了警察，在崇文分局工作的老杨，我俩还有些后怕。

另一次是去乌梁素海拉苇子。到了海子的芦苇荡里，我们接连走了几条死

胡同，绕来绕去还是迷路了。晚上，我彻底体会了什么是饥寒交迫。刺骨的寒冷，强烈的饥饿感，使我五脏俱颤。活命的本能驱使我不停展动肢体。我想到，难道就这样静悄悄地，毫无声响地冻死在这陌生的芦苇荡里，我还不到20岁，真有点不甘心呀。心里只有一个盼头，能熬到天亮，能走出芦荡吃上一口热饭。

终于天色微亮，我们发现自己离岸边并不远，赶上车出了芦荡，正好遇到了一位放牛的解放军战士，他是部队马场的，小战士把我们领到他们的放牧点，热情招待我们吃饭。端上来一大盆土豆炖羊肉和一盆糜子米饭，我心说这是因祸得福啊。羊肉的香味我有两年多没尝过了，此时不吃更待何时。我恨不得一口把饭肉都吞到肚子里去。我吃了一碗又一碗，一直吃到实在咽不下为止。

没想到肉香还没来得及回味我就发病了。回到连队后我大病了一周，高烧三天，呕吐不止，最后连黄色的胆汁都吐出来了。刚能起床就开不出假条了。连队医务室的大夫是随电信局人员下放来的老裴大夫，平时偷着跟我借书看，这会儿也只能出主意让我去团部医院看病，或许能再开出几天假来。对于大病初愈的我来说，徒步走到团部实属艰难。我只好勉强出工去了。

复员兵出身的排长可没有半点慈悲。我拖着虚弱的身体刚一复工，就赶上挖渠会战，他规定了挖土方的人头定额并分配到班。每天的土方量完不成就不能收工。我咬着牙坚持着。经常是腿打战出虚汗，疲惫之极。我没有诉苦，我知道他不会关心我的疾苦。稍有不满足还会遭到他的训斥，被说成偷懒继而还会扯到阶级路线上。同班的范平光曾与他争辩了两句，他就开始数落小范家庭出身问题。他说：“现在是新社会，要是在过去，我们贫下中农就得给你们家当牛做马。”我知道在把我们升学的权利剥夺之后，被迫改变了生活轨迹的我们，在像排长这样的领导眼里，就是被改造的对象。

劳动强度大和吃不饱饭成为下乡生活的常态。冬天挖渠，送饭的马车上装着馒头、熬土豆、米汤。米汤是不可少的，水分补充就仗它了。虽是用棉絮捂着，到地头也只剩点温气儿了，但总比砸冰块润嗓子强呀。冬季日短，回到驻地，天已漆黑。晚饭后，大田排参加挖渠会战的战士宿舍内外，除去烤棉鞋的，便是一片寂静了，劳动强度可想而知。

这样的会战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春天搞完夏天搞，春种夏收会战，冬秋水利会战。搞生产靠学大寨，搞会战。用大拔轰，大水漫灌的方式

管理生产。土壤盐碱加重，日益板结。粮食收成每况愈下，一年不如一年。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卖了力气流了大汗，就是见不到收获提高和增加效益。前三年，每人每月5至7元的津贴，伙食也越来越差，大部分时间吃不饱。

指导员和连长是现役军人，他们挣着工资，在自家开火做饭。本身在农业连队，菜粮油就近解决，伙食上花销没多少，也不用受票证限制，生活成本很低，生活质量都不错。我六年间去过两次指导员的家，都是因为探亲超假，怕挨处分。带着一条烟，忐忑不安地迈入屋里。只见几个女孩和一个最小的男孩围着小桌吃饭，他一个人单独坐在高处吃，眼角扫过饭菜，比知青吃的强多了。

在指导员眼里知青受苦是应该的。他最喜欢训话和熄灯时夜查，在冰冷和昏暗的大饭堂中，一口气讲2个小时。他能连贯说出十多个“要”。要战士拼命干，要大家改造灵魂，要这，要那，好像从来不想一想，这么多的要求之下，应该付出一点什么给战士。我从来没听过他讲，要关心战士的话。

干群关系开始紧张，除非有干部跟着，否则出工不出力现象扩散成风。瞎指挥造成的低效劳动和各种浪费现象普遍存在。

数九寒天，每天两顿吃不饱的饭，就是闲待着都会感到饥肠辘辘。连里安排大家去野外平地。在浇过冻水的大田里，每天站在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中，来回扒拉那点晒化的表层土。这种活儿，纯属摆样子作秀。听说前几年农场时，冬天都闲下来避寒。但是到了知青身上，领导们认为在家避寒是贪图享受，数九寒天在野外受冻是革命精神。冬天地里的风又冷又硬，往骨头缝里钻。被这冷风吹上一天，比在烈日下晒一天还要难受。知青们心里不满，嘟吐着：“腰里系根绳，顶上十来层。”用草绳子随便往腰上一缠，夹着铁锹，稀拉着跟着去上工。一个个又黑又瘦，衣冠不整，精神不振。以至于到后来几年，冬天外出平地，干几下就找个渠背向阳处晒够了太阳再说。班长们也都睁只眼，闭只眼装没看见。我就这样在严冬里混日子，也累、也饿、也挣扎。热切地期望着春天快点到来，每熬一天，我都暗自松一口气。

运动中被批判

然而随之到来的却是想不到更冷的冬天，指导员运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指导思想，变着法儿抓斗争，找敌人，整治知青的运动一

个接一个没完没了地搞。连队已经由改造思想的学校变成阶级斗争的战场了。我保存的日记，记录了当年的生活状态，摘录几段：

1972年12月1日 星期五

刚结束历时半个月的挖渠会战，6号地改稻地，每天分给我五米长的排水渠，开挖近12方土。听说冬天还要搞向阳渠会战，不累死也得扒层皮呀！从今天开始，短暂休整，每天6个半小时干活，2个小时学习，吃2顿饭。上午吃完早饭快10点了，到营房西北小树林边备土，3天内让10、11两个班为砖窑备2500方土，堆成70公分高。平地起埂，活不太累。就是天太冷，脸也冻了，去找老裴上了药。吃完第2顿饭，到礼堂听武指导员做总结动员批林整风报告，他讲了近3个小时，听得我比干活还累，脚也冰凉。他讲的乱七八糟的，从年初的一打三反到两忆三查，现在动员批林整风抓坏人，什么学习批林文件，什么庐山上的信，我听的像天书。去年他也是站在这台上，讲创四好连队，争当五好战士，传达的也是林副的指示，运动真像是翻烙饼呀。他说：“谁不好好干活谁是坏蛋，谁不学大寨，谁是反动派。”他太气愤了，又着急的念了一段（上级粮食工作会议文件）的内容。“今年全年比去年减产了20多万斤粮食，全团减产1百多万斤，自己的口粮不能自给，还需要向五原县要着吃，别的团更差。”听到的全是让大伙明年好好干，批林整风运动就要联系二连的坏现象揭批整改。我想不明白：拼命干一年，饿得眼发蓝，每月七块钱，天天抓坏蛋。

1972年12月10日 星期日

熬过了寒冷的一夜，门前就剩几堆煤粉末和黄土，根本无法生火，人也开始探亲走了，无心去找煤柴。天一亮，跟陈少民到一连待了一天。老王、老吴、马平聊了一天。

内容：我们这些人没有前途了，被抛弃了。现在又要搞运动，要注意言行，找港避风，少说少走动，书也别乱传，把书藏好了，听说有的连在搜书。老吴说：他开始鼓捣半导体了。马平说：4天后探亲回家了。回2连时，已经晚9点了，走在深浅不平的路上，老陈说：今天是阿波罗17号登月。我俩抬头，满天黑云，天地无光……

1973年1月3日 星期三

他可真能讲，动员了6个多小时，中午才休一会儿，坐得腰疼，晚上也睡不好，半夜被叫起来去场面粮库巡逻。前天小卖部被撬，丢了5瓶罐头，3支钢笔。

武指导员讲的主要内容：现在连里阶级斗争复杂，坏人在捣乱，有人造谣说：吃两顿饭是为了饿着战士，装病不上工的人越来越多，有的人经常跟村里老乡换东西，团部正在查咱连的人，已经有线索了，还有人偷粮食。这次揭批查不抓住不收兵。下午接着讲：社会上的新动向，五七干校的分配了的地方不去工作的，还有来2连乱窜的。主要是指电报大楼的下放人员。兵团正在中央的指挥下，打击对教育革命不满的王亚卓分子们。兵团要严打对上山下乡攻击的，对粮食、工资、就业政策不满的坏人。要求入党入团的积极分子，要向组织靠拢，揭发这些反动言行……

在指导员动员后，两忆三查运动、一打三反运动，在二连进入了揭批查的高潮。连里的第一场批判大会，是在经过几周揭发检举阶段后召开的，批判对象是北京知青小曹。我还被安排为第6个发言人。大会之前发言人先开小会，由小曹的班长介绍了他的罪状。然后每人承包了不同的批判科目。我领到的是批判他出工不力，讲吃讲穿的资产阶级思想。主要事实是：有一次吃忆苦饭，他给扔掉了。还有他经常把裤子压出裤线来穿。小曹的事刚批完，几天后，我们3排成了运动的风眼。先是老陈被关了两天禁闭，让他交代跟老乡换东西的问题。他被关在空置的粮库里。我去给他送棉被，用镰刀撬开了挡板。指导员下令把我也关了禁闭。从下午5点关到夜里12点。被查夜的连长给放了出来。

第二天，指导员问我：“你为什么撬库房挡板？”我回答：“因为给送棉被，塞不进去。”他顿了顿突然话题一转质问我：“你都到什么地方传送黑书，谁让你去的？”这一问吓得我目瞪口呆，低头不语，不知道怎么回答。很快我得知将在晚上召开批判我的大会。下午，我爬上乌加河边上的测绘铁架，站在离地面6、7米高的地方。我拿着弟弟寄来的家信反复看，想到自己16岁离开亲人来到这偏僻的边疆，苦熬岁月。我给战友送一床棉被，我看了几本书就要受到站台挨批的羞辱，理想被现实碾碎，这样的日子怎么活下去？望着远处的营房此时就像一座拘留所。我满脸眼泪擦不完，人也冻得发麻。几个小时过去了，

排长发现我不见了，到处去找。是同排的知青王广泽发现了铁架子上呆坐着的我，他急忙爬上架子把我拉了下来。

批判会上，让我站了将近两个小时。就像我发言批判小曹时一样，发言的也是各排的代表。批判的内容是：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破坏公共财产，传看黄色书籍。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低着头不敢看发言人一眼，也听不清楚发言的都讲了什么。浑身哆嗦，头上冒冷汗，两腿也站不直。后来一排的叶小兵就不叫我的名字了，给我起了个外号“歪歪”。

之后一个月内又连续召开了两次批判小范的全连大会。小范是北京育才中学老三届毕业生。他多才多艺，知识丰富，眼界开阔，是个很有内涵的人。在他带来的电唱机上，我第一次听到了俞丽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从他手中借来了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从他那里知道了莎士比亚、雪莱。他像是我和很多低年级知青的启蒙老师。在那个封闭愚昧的年代，能遇到他受到他的影响是我的幸运。这样的人在连领导眼里是容不下的。给小范罗列的罪状主要是传播资产阶级思想，有小组织活动，干扰学大寨运动。小范毕竟是内心强大的人，他在挨批时的表现镇定自若，比我强多了。

又过了两个月，指导员宣布了对三个人的处分：

小范：记大过。留兵团查看一年以观后效，送后山煤矿。他后来转到内蒙农村插队，考上大学，当了教授，现在退休了，依然在大学里忙碌着辅导学生。

老陈：记过处分。他是47中学老三届毕业的。我第一次听他讲黑格尔，是1971年。他讲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深入浅出。也是他跟我闲聊时说到他的同学——作家杨沫之子老鬼的故事。老陈退休后，沉迷于他多年收藏的古瓷器堆中，乐此不疲，老有所乐。

三人之中，我的处分最轻，是严重警告。可是却在档案中记上了一条：有反对学习毛著的言行。原来是有人写了检举材料，揭发我说过：“天天读没用。”这条记录即使在今天也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前途。

回城后参加工作我不能再背着这个黑锅。我通过同连知青也是邻居的贺同学，找到了他的叔叔贺干事。贺干事曾在武指导员转业的事情上帮过忙，使武指导员如愿转业到了兵团化纤厂。1979年春天，我拿着贺干事的亲笔信，带着工厂人事科的干部，到呼市化纤厂找到了武指导员。由他写出了详细的证明材

料，说明当时并没有认真核实此事，没有征询本人意见，对我的处分是错误决定。经过此番周折，兵团生活的痛苦经历算是翻篇了。

回城之后

1999年，2连战友有一次聚会。在会餐中，武指导员举杯来到我和叶小兵面前。他说：“过去的事，请大家原谅。”我看着老去的武指导员，他能在垂老之年请求知青的原谅也算是良心发现。我回答他：“事情过去了。”

1999年聚会之后，武指导员过世了。

回到北京后，我像一只小蜜蜂，在企业忙忙碌碌干了30多年。知青们回城就业之路并不顺利，我尽自己所能先后调入6个战友来我们厂上班。有的是面临下岗的同连战友，有的是我在兵团借书途中问路认识的知青羊倌，有的是当年在五原县城一起用一元多元钱解馋的知青朋友。我们有时聊起从兵团到工厂的经历，深切地感触到：我们是在艰苦岁月中一起经受磨炼的知青战友，晚年了更应该抱团取暖。我们这一代人的大多数是生活在“时代齿轮夹缝里”的人，属于那些很少被捕捉定格的人生经历和生活状态。而没有我们，没有这些无名之人，就无法完成名为历史的马赛克拼图。📷

2017年10月18日

【往事】

难忘的逃离

——呼市历险记

范之光



往事如烟，兵团的岁月伴随着青春已一去不复返了。只有一件事，仍清晰地记忆在脑海中。

1971年的10月，那是个敏感的时期。我在6连得罪了从2连新调来的刘军副连长。起因是我看不惯他那种不正当的习气，经常用手梳理着自己的大背头，色

眯眯的挑逗女战友；暗地里战友们给他起了个外号：红蓝铅笔——色棍。本人有绘画特长，曾随手画了一个他的漫画像，让战友们看看像谁？大家纷纷都说极像刘副。不知后来怎么传到他的耳朵里去了，在礼堂一次全连大会上，他指着训斥，我本来就对他没好感，所以他说一句我顶他一句，闹得他下不了台，大丢颜面！于是他对我怀恨在心，开始一步步的报复计划。他假借夜间紧急集合行军，派文书偷我的钥匙，翻我箱子找“罪证”，处处刁难我。我曾给团里写过信反映这些情况，但信却又被转回连里，这下他更恨我了。那种令人窒息的环境实在无法再待下去了，于是我毅然下决心离开兵团，去外面闯条路子。

我到5连(团篮球队驻地)去和自己最要好的原6连战友秦应雷告别，顺便也和团篮球队几个相识的战友一同辞别。当了解我的境遇和决心后，他们都表示同情，也都担心万一走不成，被整得更惨。球队原1连的张胜民给我出主意说：“你别走刘召站，从1连那边走乌拉特前旗站，虽远点儿，但可以防6连那个刘副连长带人到刘召站找你。如果把截你回来，就麻烦了！”

后来他设法联系了1连的几个战友，在一个清晨赶着小驴车，趁全团现役军人都集中到团部开会，连内无人管时，到6连悄悄地接上我，带着行李直奔乌拉特前旗。记得半路上我们还在一个老乡家大吃了几十个炒鸡蛋，那时真有种“越狱”的感觉。我计划先去四子王旗找插队的二弟，然后两个人一起到河南的邮电五七干校，去见被下放到那里的母亲，然后再作打算。

我到了呼市后，买了去四子王旗的长途车票，但车要在第二天早晨才开，只能在呼市过夜了。可身上没啥钱，得省着点儿，别住旅馆了，我决定在火车站候车大厅将就一宿。那时还不知道“九一三”事件已经发生了，整个国家内紧外松。半夜里，突然来了一大伙民兵，拿着枪，把所有滞留的旅客围起来，挨着个检查有无证件；我当时回答说是兵团15团6连的知青，没有证件，要去四子王旗探望插队的弟弟。因为自己是从连里“逃跑”的，哪儿有什么证件！

凡是没证件的，一律被民兵押着带走审查。于是一大群无证明的旅客排了一长队被押着走出了车站，记得其中还有一位穿国防绿带五角星帽徽红领章的现役军人。到了呼市民兵营，一个四层楼，有个院子，进大楼后进行逐一审查登记身份。随身带的物品行李，都被拿到另一处房间存放检查。我和另外两

个十几岁的年轻人被关在三楼的一个房间，房间里有四张木床，上下铺的，门上有个一尺见方的小玻璃窗，值班看守就在外面楼道里走来走去；每过半小时就在门窗口上察看我们的动静，屋内不许关灯，难以入睡。于是就拿着随身携带的毛主席语录翻来翻去消磨时间。第二天，看见那个现役军人和几个人被允许走了，估计是民兵联系核实了他们身份没问题，就放了他们。而我们三个依然被关在房间里，不知何时才能出去。在那几天里，每天早晨还要下楼去院子里操练，我在兵团受过训练，立正、稍息、左转、右转姿态正确，自然当了领队，可带领的大多是小偷、流氓，回想起来让人苦笑。

与同屋的两个年轻人聊天时了解到，他们是因为父母不在身边，偷东西被关进来的。其中有一个姓刘的小孩，也就十三四岁，估计家里大人都因文革被关押或下放，就一个人在社会上瞎混，小偷小摸的糊口过日子。我很同情，就劝导他，以后别干这种事了，要学点儿知识，将来人生时间长着呢！这个孩子本质不坏，还能听得进去，直称我大哥。以前可能在社会上没有人如此关心过他，和他说做人的道理。他很是感动，什么心里话都爱跟我说。

就这样又过了两天，因为吃的羁押饭不洁，得了肠胃炎拉肚子，隔不久就要去厕所，但每次都得高喊报告：我要去厕所！看守民兵不耐烦地呵斥说，你咋那么多事？老去厕所！我一边往外边厕所跑一边喊，要早点放我走，就没这事了，你们给的饭菜都不干净，害得我拉肚子。

失去自由的日子太难熬了，也不知道要等到哪天？我几次望着窗外的大杨树，测算着自己能否一下蹿到树上，顺树干下到地面逃出去，但因为树干上树杈太多，实在没把握，只好罢了。

第三天，门外的看守民兵说营长要找我问话，我想这回问题可能解决了，就随着他到一楼办公室去见营长。营长问我：“你是不是兵团的人啊？”我回答：“我是15团6连的，都好几天了，你们怎么还没联系上？”他说：“你们兵团电话咋那么难打？打了好几次都不通，你等着吧。”他又问我：“看你带的东西里有一些唱片，是不是黄色唱片啊？”我说都是小提琴练习曲的唱片，因为唱片上都是外文的曲名，他们也看不懂。他再问：“你还带了把小提琴，是你的吗？”“当然是！”我答道。我走时随身带了一把小提琴和一叠唱片，那在当时可都是我珍贵的精神食粮啊！被关进来时都被他们收走了。“去把他的琴拿来！”

他吩咐一个民兵取来我的小提琴，让我拉上一曲听听；想看看我是不是真会拉提琴，提琴是不是我的。几天没碰琴，手指都发硬了。我定好弦，稍活动了一下手指，心说他大概听得懂白毛女吧，于是我就给他拉了段白毛女的北风吹那段；他听完后，惊讶地说：“拉的还真行！你先回屋里等着吧，我们尽快联系你们单位，证实了身份就叫你走。”他似乎对我放松了警惕心，让我自己回屋子去，也没叫人跟着我。这时我一看，楼大门外一个人也没有，身边也没民兵看管，好机会啊！三天受够了失去自由的憋闷，也不知道他们何时才能联系上？不如我自己去兵团司令部找我认识的干事为我证明一下，因为我曾代表二师去司令部搞过展览，认识那里的几个干事。

于是，转身就住院外跑。我不认识路瞎跑了一段，忽然听到后面有人大喊：“快站住，不然开枪了！”我回头一看，原来他们发现了，追了上来。有个人还举着手枪，边追边喊抓小偷。我爱好体育，经常打篮球，那些追我的人哪儿跑得过我啊，一会儿就把他们落得老远。但没想到跑进一个民居宿舍的大院里，穿过几排房子，前面竟是一堵高墙，窜了两下，墙有点太高了，窜不上去。这时，后面几个民兵追上来了，大声吆喝着，还跑，看你跑哪去！这时院子里的居民都围上来问怎么回事？那个拿手枪的说：“我们在抓小偷。”我对周围群众说：“我是2师15团6连的知青，就因为没带证件已经被他们关了好几天了！”“别废话，把他铐起来！带回去！”那民兵小头目急了大叫。他们掏出一副手铐铐住我双手，那时我已饿得很瘦了，又有干巴劲儿，一用力居然把手从铐里脱出来了。那小头目见状大喊：“你他妈还会脱铐术啊！有绳子没有？把他绑起来。”原来他们用的是个老掉牙的手铐，只能铐胖人。当时把他们也吓得不轻，生怕我再跑了，负不起责任。我对他们说：“我是个知青，不是坏人，我就是想去兵团司令部找个人证。你们不用绑了，我跟你们回去。”

到了民兵营办公室，那个小头目气急败坏地向民兵营长叙说我如何逃跑又如何脱铐等所谓“犯罪”事实，还恶狠狠地说：“拿电炉来，烫他脚，让他再跑！”我也急了，对他说：“你敢烫！我不是坏人，你把我烫坏了你要负责养我一辈子！”我又对营长说：“我母亲在河南干校病了，我急着去看她，你们已关我好几天了还没结果，我只能自己去找证人。”营长似乎对我有些好感，吩咐到：“算了，让他回屋里去吧。”

我会拉提琴，还会窜墙脱铐，逃跑回来后居然还不受惩罚，这个消息不翼而飞，很快传遍全楼各个房间。我一时间成了在押人员的英雄。后来几天里，那些被关的各路“豪杰”见了我都毕恭毕敬、佩服得不得了。那年代像我这样的行动后果，一般抓回来肯定是一顿暴打躲不过的。所以我这样正常地回来，他们尤为惊讶而从内心敬畏我。

特别是那个我多次劝慰让他学好的少年，更是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大哥长大哥短的，告诉我他马上就要能出去了，他家住在什么地方等。后又悄悄告诉我，在屋内一个上下铺的床缝间，有根用一段段电灯开关拉线接起来的长绳，等他出去后，晚上听好外边他拍手三下，就把绳子拿出来，从窗子放下去，他打算给我送些食品和香烟来，用绳子吊上去。我嘱咐他不用了，千万别冒险，再被抓进来就麻烦了！他说：“放心，大哥，不会的，我知道怎么办。”看来他不是一次干这种事了。

第二天他果真被放出去了。当晚天黑以后，我听到楼窗外有拍三下巴掌的声音，从夜色中看到他躲在院围墙后面，露出个脑袋向我招手，就赶紧到床缝中掏出了那根绳子，让同屋的另一个人看住门的小窗，防止民兵巡视发现，把绳子放了下去；他灵活地翻过围栏墙把一包东西绑在绳子上，向上扬手示意可以拽了，我一边拉绳子一边向他摆手，让他赶快离开，他点了点头就飞快地翻过围墙，消失在黑暗中。拉上来一看，一个手绢里包着两盒香烟和将近一斤多的牛奶糖，真是好东西。于是我和同屋另一个人轮流放哨和享用。同时也在思索，小偷也是讲义气的，是什么造成了他们去偷呢？

又苦等了几天后，终于迎来了曙光。第七天的晚上，营长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一进门见他坐在办公桌后面盯着我看。我心里七上八下，不知是凶是吉？他卖了个关子，等了一会儿，突然说：“我们已经联系上了你单位。你们单位的电话太难打了，我打了多少次，今天才打通。你是个好人，可以走了，马上走吧！”我心里这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对他说：“谢谢，我明天走行吗？今天晚了，我出去后也没处过夜啊！还得去车站，弄不好又被你们的人抓回来啊！”他立刻说：“不行，让你走你就马上走，你去哪儿我们不管，到车站也不会再抓你了。但是，出去不要与同屋的那些小偷流氓联系，他们都是坏人。”在那个年代，在他们眼里，人只分为好人和坏人两种。于是，我取回行李，结

了账(住民兵营是要付饭钱的),我这个“好人”被关了七天后,终于离开了呼市民兵营。手提包里面几包牡丹牌香烟没了,肯定是民兵们拿走抽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联系的电话打到了团里,恰巧是团里卢参谋接的。卢参谋是我在团里搞展览时认识的,跟我很熟。他接到电话立刻说:“范之光是我们团6连的,我认识他,没问题。”通话就这么简短,我立刻获得了“新生”。如果这个电话打到连里,那个刘副连长接了,后果如何发展就难说了。果然,卢参谋接完民兵营的电话后,又给我连打了电话,刘副一听立刻对卢参谋大叫:“范之光可是逃跑的,你怎么说他没问题呢!”在我离开民兵营的第二天,他就带人赶到呼市,想把我带回去好好整治一通。但他扑了个空,民兵营长对他说:“你们团里说范之光没问题,我们就放人,别的我们不管!”刘副扑空后又去逛呼市的商场,后来听说他在商场摸一位妇女的臀部,被当流氓抓住,也许是因为是现役军人,又自称是无意碰的,就把他放了。多年来,我经常在想,冥冥之中一定是上天有眼,关键时刻总会保佑好人,惩治坏人。

我出了民兵营的第一件事是找了个澡堂,痛痛快快的大洗了一通。然后买了点儿烟和牛奶糖,按照同屋那个小偷留下的地址,找到了他。他家里空空荡荡,只有他一个人。我们随便弄了点儿吃的,边吃边聊。他应该是个本质不坏的孩子,我鼓励他多学点儿知识,将来做个有作为的人,千万别再干坏事儿了。后来就与他没联系了,真想知道他现在如何了!

与他告别后,我就去火车站过夜,准备第二天坐长途车去四子王旗找在那插队的弟弟。刚进车站,就看见一个经常出入民兵营的女警察,换了一身花棉袄坐在候车长椅上;我问她:“你咋也来这儿,要坐火车啊?”她不耐烦的低声说:“别和我说话,走走走!”这我才明白她是化了妆在执行任务呢。于是我找了个椅子躺下,准备睡觉了。夜里只听得乱糟糟的,民兵又来查旅客身份了。我就闭着眼,装作睡着了。有个民兵走到我身边对同伙说:“这还有一个没查呢。”另一个回答:“这个是刚出来的,不用查了。”我眯着眼一看,又被带走了一大队人,看来形势很紧张啊!

第二天,我坐长途车离开了呼市,前往四子王旗。我坐在车的最后一排,身边坐的也是一个在四子王旗插队的知青,聊了起来,才知道发生了大事儿,林彪在蒙古摔死了。我恍然大悟,在呼市的遭遇都是因此而生!

到了四子王旗库伦图公社，见到了弟弟，村支书还拿了鸡蛋请我吃。据说，村里的年轻妇女都被他睡遍了。那是个令人心碎的年代！随后，我们来到了河南邢集的邮电部五七干校与母亲团聚。

在干校休整了一段之后，开始了我人生第一次闯荡。先是去报考河南新乡的一个文工团，给那里拉提琴、画布景。但是户口问题解决不了，兵团那边没“路子”，不放人。后又去了云南昆明，我舅舅在那儿工作。我两个表哥都已从插队的地方转了过去，但我还是因为户口问题解决不了，无法调动。那时候走后门儿之风已很盛行了，如我连的一个知青，智力明显有障碍，却被他在军队当官的父亲弄去当了光荣的人民解放军。还给我们寄来了一张穿着军装的照片，看了真让人哭笑不得！

到了1975年，兵团当年的知青中一些人开始走向领导岗位，我与连里的干部关系好转，母亲也于一年前调回北京。那时上山下乡的知青正盛兴“病退”热潮，我也加入潮流当中，曾主动回连三个月；除了为连里画展板和出墙报外，就是和其他战友谋划如何办理病退的各种有效方法。于1976年终于“因病”把户口转回了北京。

因为我有绘画的特长，在闯荡的那几年中，为了谋生，曾给北京工艺美术厂画过彩蛋、灯笼。回京后分配到北京工艺美术工厂，但我还没等办手续，邮电部的一个单位急缺美工又找上了我，我选择了这个“中央单位”。文革结束，处处展现生机。我在工作之余，参加西城文化馆、工人俱乐部的美术培训班，开始正规学画。那时这种学习班都是免费的，而且都是从高等美术院校聘请来的老师，真怀念那个年代



80年代初，美术院校开始对成人招生，在成千上万的考生中，我被首都师范学院美术系录取，真正走进了美术的课堂。潜心求索，锲而不舍，多年的努力，使我成了一名职业油画家，作品多次入选全国各种大型美展。作品“历经沧桑”还于1991年荣获北京市优秀作品奖；当时北京市只有七人获此奖项。

回顾走过的路，深感——

人生如梦，那是一个充满辛酸苦辣的梦！

人生如歌，那是一首充满沧桑的“信天游”！🎵

2017年12月

【往事】

兵团往事

——从卫生员到大田班

邱力



我辈已将进入古稀之年，岁月逝去，遥遥往事却时常在脑海中浮现，历历在目。为了那些尘封的历史，为了那些亲身经历的事件不被埋没并石沉大海，为了后人将来启程不再迷惘，我们应该留下真实的历史，来告知和启迪后人。

—

1966年11月7日，本人刚到17周岁，为躲避纷乱的文革，从北京去了塞北高原，山西大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华北农垦兵团（后面简称大同兵团）直属连。从那天起便开始了我的兵团生涯。

大同兵团属于军队领导，直属连刚刚组建，连以上干部都是现役军人，接收的是当地劳教农场。农场的位置在大同市的北郊，距大同市20华里。大同市位于山西省最北端，地处黄土高原的东北边缘。大同市的西面是一片连绵不断，南北走向的太行山，在山脉的东边，延山脚下是京兰铁路和公路直通内蒙，距内蒙丰镇只有40华里。在大同市的东面，与铁路并排，旁边有一条干涸了的宽阔大河叫御河。我们在田间干着枯燥的农活时，隔着宽阔的御河，时常看到河对岸的火车飞奔着，汽笛鸣叫着，喷出滚滚的白烟向南，或向北呼啸而去，向南就是通往北京的方向，常常勾起我对故乡的思念，对亲人的思念。

兵团就在御河的东岸。在当年，平日里这条河的中心只有一条细细的小水沟，只有在夏日的雨季时河里才能涨满水。1967年的夏天，在河边的一间没住人的孤零零的小屋内，我们曾看到一具大同农技校的女学生李改兰，她那被泡发的尸体停放在那里，正等待她的家人来处理。她是因暑假后为返校抄近路，在河对面的小站下了火车，蹚河过来时被河水吞没，失去了自己不到二十岁的生命。

刚到兵团时直属连时的人员并不多，兵团战士是从北京去的几十个年轻人。连长是李凤良，指导员由兵团司令部的刘参谋临时担任。后来又从晋中的河头县迁来了华北兵团八团全体人员，团长是曹兰旗。我们直属连随即并入了八团，全团约有百十来人。那大同兵团的作息时间和后来内蒙兵团的作息时间安排相同，早晨吹起床哨，以排为单位出操，在每天清晨出操时，每一个命令后都要加喊一句口号，例如：向右转，高喊“打到×××！”向左转，高喊：“×××万岁！”稍息，高喊“×××××！”……出操以后以班为单位“天天读”，学习毛著、语录一小时，雷打不动。然后吃早饭，出工下田劳动。中午回连吃午饭，下午出工，收工，每天如此。

二

1967年的一天早晨，我们在女排长的带领下出操，依旧是向右转、向左转的例行喊口号，在喊口号时我们的班长徐斌不小心喊反了那句×××万岁！在那个时代，无疑地成了一句反动口号，连里马上就知道了。我替她捏了一把汗，替她揪着心，我想无论如何她也不会是诚心喊出那句口号。果然不出所料，就因为这一句口号，她被打成反革命，从此再没有了安宁之日，就因为这一句口号让她走上了不归之路。

徐斌马上被监督劳动改造，连里安排了一拨人，轮流将她看管起来。白天徐斌一人干最脏最累的活儿，淘厕所、挖粪坑等，晚上写检查，开批斗会。班里批，排里批，连里批，没有休息日，经过轮番检查、开会批斗，她早已没有了往日的形象，灰头土脸，低着头走路，后边监督看管的人员跟在后面，哪里还有做人的尊严！大家不敢和她说话，谁都不敢接近她，都像躲瘟疫一样躲着她。她从家里带来的装衣服及个人用品的小木箱被看管的人翻个底朝上。徐斌开始还能挺住，有时还以革命语言与欺辱她的人对辩，但欺辱压制她的势力太强大，后来她开始茫然，经常在关押她的仓库中向窗外凝望发呆。

一个秋风萧瑟的天气，她拿出钱让看押她的人买了苹果，平时她最爱吃水果，那天她衣服穿得格外干净整齐。下午时分有人发现她突然不见了，连里马上派人四处寻找，最后终于发现她在连里菜地边放种子的小棚里上吊自尽。那小棚很矮，比她的身高高不了多少。我亲眼看着男排长等人把她从绳子上解救

下来，我也赶忙用手托住她。我是被叫来救人的，因为我曾是连里的卫生员。当她被解下放在地上的时候，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变化，双眼紧闭，身体软绵绵的。我心里不停地替她祈祷，并马上去摸脉搏，已经没有，掐人中，扒开眼皮看瞳孔，双侧瞳孔已散大变形，呈了多角形的小星星，对光反射全无，按压心脏，呼吸、心跳都没有，经一番抢救没有任何反应，回天无力。我眼睁睁地看着我的班长，我的同学，同一天从北京来到兵团的战友，那一条鲜活的生命，还未来得及开放的花蕾，在这黄金岁月，就这样离我们而去了。至今徐斌的模样和她被解下绳子放在地上的那一幕，还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那是我挥之不去的噩梦。当时我哪里见过这种场面，吓得我直哆嗦，欲哭无泪，心里像是被压了一块大石头，堵得出不来气，但是我什么也不敢说，我知道，只要说出一句同情她的话来马上就会被打成反革命分子。

后来她被男排长背回连，放在一间空库房内。她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就匆匆而去，结束了短暂、刚满十八岁的青春年华。然后被无声无息，草草地埋在离连队不远的，营房东面河岸边的黄土高坡上面。在文革这场旷世疯狂与浩劫的运动之中，不知有多少人就这样非正常死亡。

我至今闭上眼就清楚地想起徐斌的样子，中等身材，圆圆脸，短头发，斯文白净，一双大眼睛戴着一副厚眼镜，山西的战友给她取外号叫“二柄子”。她父亲是位工程师，听说有历史问题。她的母亲是家庭妇女。她爱说爱笑，爱帮助战友。我们三个人很要好，曾在去兵团司令部的小卖部一起合买过一块做棉袄罩衣的布料，有徐斌、龚某、和本人，我们那时还太年轻，都不会做衣服，徐斌就把布料邮回北京，让她母亲给我们裁剪做好，再给我们邮回来，三个女孩子穿着同样的，合身的罩衣心花怒放，觉得很美。三人曾经在休息日来回步行四十里公路，去大同市游玩一整天，在市里一起吃午饭并去照相馆，穿着同样的上衣，拍了一张三人合影，回到连队时天色已黑。直到现在还保存着这张照片，当时没想到这张合影竟成为绝照。我们曾经到兵团司令部附近的花园屯公社小卖部去买当地叫槟子的一种水果，我们叫它沙果，我们一路走一路吃，高高兴兴，回连时已吃得差不多没有了。还买了饼干，那饼干和内蒙的饼干一样，大方块，又厚又硬，牙齿不好的人吃起来要小心，不然会把牙齿咯坏，不过那是那时唯一的糕点也是零食，我们吃得津津有味。我们还曾一起去附近农

村找老乡买鸡蛋。这些都是那时的苦中作乐。

徐斌积极要求上进，对工作认真负责，在地里干活中间休息时，我们都想多休息一会儿，但是她带着手表，掌握着时间，到点就开工一丝不苟。徐斌很爱干净，每当收工回来总是先洗洗涮涮，衣服从来都是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徐斌自来兵团后就是我们班的班长，她虽然爱说爱笑但是对我们要求比较严格，我们都曾被评为五好战士。但她这人就是太认真，也曾因此得罪一些人。没想到一向积极要求上进的她竟落得如此下场，仅仅因为一句喊错了的口号。

在后来回京的探亲中，我曾去过徐斌的家，北京市西城南锁胡同17号的老宅，想探望她年迈的父母，但找到她家后已是人去楼空，不知她家搬往何处，听邻居说她母亲也已因她的死而疯。可想而知，徐斌之死对于她的父母的伤害是何等之大。换位思考，我们都已是过来人，都有儿女，若这样的事不幸落在我们身上会做何感想？

知青大返城后我和同学们都回了北京。回京之后，我曾几次梦见她，还是原来十几岁那般模样。在1995年的夏天，我们一起返回大同当年下乡的故地，花园屯和李家湾，这是两个连队当时的驻地，我们曾生活和劳动过两年的地方。大家一起去找了当年埋葬徐斌的李家湾，想看一看那座孤零零的少女坟，想去吊唁身落异乡多年的同学、战友，并带去了之前采下的小野花，想放在她那久驻的坟前，以示我们对她的怀念。但是没能找到，因为时间太久远，而且没有任何标记，能看到的只是黄土高原上的一片片凄凄荒草……不由得我们热泪盈眶，脑海里又出现了当年她的片段……我们只得诚祝她18岁的在天之灵得到安息，但愿不再被尘世间的喧嚣所打扰，不再有这样、那样的运动，不再被批斗、不再被挨整，但愿能够享有正常做人的尊严，但愿曾经的浩劫能够不再重复出现……我们无功而返，面对李家湾，面对历史，我们的心情无比沉重，那里承载着太多的无奈和辛酸的回忆。

三

到兵团后尽管生活艰苦枯燥，劳动强度大，但遵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教导，本人认真改造思想，严格要求自己，不怕苦怕累，不偷懒，咬紧牙关坚持，努力奋斗，争当“五好战士”，这在当时是最高奋斗目标。大同兵团不是

供给制而是农工制，刚去时是每月18元工资，在半年后开始工资评级。经全班、全排、全连的多次讨论评选，大家一致评定我为二级农工，工资是29.50元，占评级人员的百分之三十。当时的一级农工工资是26元，占评级人数的百分之六十，剩下的百分之十规定不与评级。

在1967年的初冬，幸运降临于我，团里派我和另一位山西籍女生一同到兵团司令部卫生所去培训卫生员，我的心情无比激动，因为终于可以不用再干繁重的体力劳动了，所以暗自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

兵团司令部即大同兵团司令部，卫生所也是后来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的卫生所。地点就在花园屯，和我们八团团部卫生所相邻。司令部卫生所路所长发给我们每人一本《军队卫生员教材》，每天下午由路所长给我们俩在卫生所授课，晚上回去看书复习当天的课程。第二天下午上课前首先提问前一天的讲课内容，然后再讲新课。我非常珍惜这次学习机会，上课时认真听讲，回去后认真复习，所以每次都能准确无误回答问题。我们每天上午安排在卫生所实习，即在卫生所实际操作，打针、输液、发药、换药、消毒和一些小处置等……。

在学习过程中曾发生过一件笑话。有一天，一位现役军人来到卫生所，进门就问：“给我的眼药膏怎么不管用？”有位军医问“你上药了吗？”“上了，你看就挤在眼皮上了！”说着用手一指眼皮，仔细一看两只外眼皮上各挤上一条眼药膏，“上外面了？”“不就是挤眼皮上吗？”这时逗得在场的人哈哈大笑起来。半年的学习时间很快，我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圆满结束，路所长对我的学习很满意，并表扬了我。

四

回到八团卫生所，所长吕树桐也是后来内蒙兵团二师15团卫生所所长，他是这样对我说的：“把你安排在二连李家湾任卫生员，是因为李家湾离团部较远（距团部卫生所八里之遥），所以任务艰巨。一连在花园屯，就在团部旁边，因为你比她学习的好，所以把你放在二连，相信你一定能完成任务！”就这样我来到了二连李家湾。我去二连后才知道，另一位和我一同学习卫生员的山西战友马上被派去大同市六一部队医院又一次学习了。

李家湾是一个小村庄，只有两个院子。据说这里原来是一户地主的房子，

院子的西面就是那个小菜园。李家湾地处御河的河湾处，在御河和东面高坡之间的河边地带有很多农田。爬上农田东面几十米的高坡，向东望去是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我们去团部或兵团司令部就得爬到上面向南走。上面布满了大小沟壑，要走八里的沟沟坎坎。二连耕种的土地都在下面的河边地带。主要的农作物有玉米、谷子、土豆等。站在高坡上向西望就是宽阔而干涸的御河河道。御河的西岸沿线是京兰铁路，旁边是并排的一条公路直通内蒙的丰镇。再往西面是连绵不断的太行山脉，大同市就在兵团的南面二十里方向，御河的西岸。

二连的连长贾英，指导员李凤良都是现役军人，副连长赵进是原场干部也是早年的退伍老兵。连里还有两位刚刚复原的老兵排长。全连有几十位兵团知青和几位连队干部家属，还有几位留下来的原场就业职工。知青有两个女生班和两个男生班，后勤班，全连总共几十人而已。

有幸能成为一名连队卫生员觉得很自豪，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我一有时间就背着药箱下地和战友们一起田间劳动，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对待每一个病号都同样耐心，认真负责，无论是打针、给药、治疗，我都尽到了最大的努力，这样觉得每天都很充实，问心无愧。

连长的女儿出生才几个月，有一次高烧不退，我就用酒精给她擦拭，进行物理降温，打退烧针，对症给药，冒着寒风一天几次去她家测体温，观察病情。在悉心的照料下孩子的病情很快好转，康复，连长的爱人很是感激。

还有一次，在一个零下二三十度的寒冷冬夜我被叫了起来，是因原场七十多岁的羊号老职工胆结石发作，疼得在炕上翻滚，豆粒大的汗珠从脸上渗了出来。我马上给注射了止痛剂，处理完毕后回到宿舍时天已发亮，在被雁北的寒风摧残下我的手脚早已冻僵，第二天又送他去医院。

就是连队里家属来探亲，如果生病，我也是同样尽心尽力毫不懈怠。连里所有同志对我的表现反应都很好。只是觉得自己的专业知识很不够，非常想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水平。

本人家母是国立艺专油画系毕业，绘画功底非常深厚，徐悲鸿的亲传弟子曾是母亲的校长，系主任是吴作人，他们二人都曾给母亲上过课、批改过画作。受母亲的熏陶，本人也受到一些影响，当卫生员期间还负责连里的黑板报工作，母亲还从北京给我寄来了黑板报资料。总之，我对工作尽到了最大的努力。

五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1967年，文革在继续，那一年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又开始了，听说本团去了几个人到北京外调回来。本来以为离开北京就可以躲避文革，躲避人整人，没想到我团的运动又开始了。连里的食堂贴出许多大字报，气氛马上又不一样了。

一个初秋的夜晚，是在徐斌自杀之前，刚刚吃过晚饭，连长贾英把我叫到连部，进屋后看见一位山西战友魏晋安正在炕上睡觉，这时不知贾连长出于什么心理，顺手拿起旁边的一支毛笔，沾了点墨汁就在魏晋安熟睡的脸上挥笔画了起来，顿时面前出现了一只花猫脸，嘴角两边各多出来三根胡须。当他爬起来半睁开双眼时还是一脸的懵懂，睡眼惺忪奇怪地看着连长。我觉得那表情很可笑之极，忍不住，从没有过地哈哈大笑起来。

这时连长转过身来，突然非常和气地通知我放下卫生员的工作，再回大田班。这分明是解除我的卫生员工作，我感到非常突然、震惊，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连长的话音刚落，不由得我哇的一声委屈地放声大哭，和刚才的大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不明白我出了什么问题？犯了什么错误？我若当真有什么错误你们完全可以给我指出来，为什么从来没有？当时真有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连长没有一句解释。我想问连长为什么，但是哭得说不出话来，只觉得太委屈，太冤枉，不公平，心里无比愤怒，无法承受。可是不争气的我一句话都没说出来，只有哭泣，委屈……

这件事让我百思不得其解，虽然心里愤愤不平，很不服气，觉得他们很不讲理，但是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只能又回到大田劳动。

在二连李家湾，女生班的宿舍都在连部的院子里，李家湾的夜晚极为安静，记得那个秋冬的夜晚，经常停电，每当夜深人静，月亮升起时，苍凉清冷的月光倾泻在院子里的空地上，一片惨白。唯独时而从远处的屋子里传来孤独的二胡声，这是有人在用二胡拉那首《航标兵之歌》，这首歌曲的旋律慢而低沉，伤感。那琴音在院子的上空盘旋游荡，飘向远方。这时在我听来倍感悲凉。好一阵子每当晚上听到这凄惨的琴声，再想到自己的不公遭遇，更催我泪下。

这件事对于不谙世事的我是沉重的打击。我的心情一落千丈，就像落入无底的深渊。在那以后的几年里都不想说话，就像得了抑郁症。那一年我刚到十

八岁，虽然我的卫生员工作被迫下岗，但是我想，无论如何不能沉沦，要挺住，要坚强，无论何时何地我都是好样的，一定要给自己争口气。

后来才知道，可能是外调的回来，父亲的历史问题还没有平反。但是，一直没有一个领导对我解释过是什么原因不让我做卫生员工作。

六

在1969年初的春节前，我们大同兵团的八团全体人员集体迁入内蒙古五原县建丰农场，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15团。我被分配在一连菜班并任副班长、班长。经过4年的劳动考验后，又被调到团部基建连任卫生员。在一年后又调团部卫生队任卫生员。1975年兵团现役军人全部撤离兵团，又交回地方农场，医院更名为建丰农场中心医院。1976年春，医院派我去呼和浩特市内蒙医学院附属医院眼科进修一年，后回到农场医院。1978年3月份我的病退函从北京到达场部。因为要病退回京，和绍兴战友王慧娟又被下到五连大田班劳动。场部把全场知青的病退函一直扣压半年，不放人走。在这半年对我来说，又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大田劳动，每天晚上锄地回来，躺在床上，一闭上眼睛满眼是绿色的麦苗。直至9月份，麦收过后，才在一天的晚饭时，突然通知放行我们病退的人员，马上打行李，第二天一早送我们上火车回京。这是最后一批北京知青。

记得我同宿舍的一个北京女孩听到消息后，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不知是否因为太突然，太激动，时间太紧，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哭了半天才开始收拾东西，一边收拾行李，一边哇哇哭。那一晚根本无眠。这就是我们在兵团最后的一个晚上，第二天，天不亮就开始搬行李装车，集合，直奔火车站。就这样结束了我们的兵团生活，结束了这场上山下乡的厄运。

七

文革是一场浩劫。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知青上山下乡是文革的延续。所以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无疑是错误的。劫后反思，数以千万计的年轻一代，在人生中最美好的年龄，荒废了学业，被送到农村受苦受难，实为掠夺

整整一代人的学业，空前绝后。他们失去了理想和前途，一切都变得那么渺茫和迷惘。坎坷的经历和命运，折射出中华民族曲折的历程。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回顾这段往事，仍然令人感慨不已。

一位哲人说：“……为了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自己经历过的苦难，都应该留下记忆，不能白白地消逝。”另一位哲人认为“上山下乡运动的本质属性，应是一场褻渎人的尊严，泯灭人性，悖逆社会进步的空前浩劫。至于这场运动中知青一代人的社会历史定位，我想至少有三点：社会危机的蒙难者，经济改革的牺牲者，历史教训的醒世者。”

我认同他们的反思。📷



【往事】

我和我的知青老师们

徐卫国

1969年9月，新学年开始了。15团学校陆续调来了兵团战士担任老师，他们多为师范生或老三届高中生，知青老师任各班的班主任，课任老师也大部分都由知青担任。他们穿着绿色军装，都讲普通话，老师对我们这些虽然年龄尚小，却也曾参加了文化大革命，经常被停课去参加批斗会，也经常举着小拳头喊口号的小学生们，进行了彻底的整顿。因为兵团的特殊体制，学校很快恢复了正常秩序。学校还对我们各年级进行军训，内容有列队、投弹、拼刺等。同学中现役军人的子女较多，他们经常穿戴着父母的旧军装及鞋、帽。学校从老师到学生，从穿戴上就与地方学校有着较大差别。

开学后，全新的知青老师，全新的教学及管理方式，让我们一切都觉得新鲜，老师对我们原来的一些习惯，如刷牙、洗脸、洗澡、换衣服都有全新要求。老师们在讲课中把许多相关的故事、事例穿插其中，内容新颖、丰富、生动。在课间，老师们又一同与我们做游戏，打排球、打乒乓球等，短短的课间活动，同学们都很开心。在班级管理上，各班主任在带班上都抓得很严很紧。

我们的第一任班主任是北京知青邢国侠老师，她梳着短辫，一口标准的“京腔”普通话，因为我们班同学人数多（不久还分出一些到别的班），年龄差别大（有的相差4岁），淘气的也多（包括我）。邢老师接手我们班后，关心备至，严加管理，不久就把我们“震”住了，课堂纪律大为改观。尽管是在烈日炎炎的大中午，她也经常不休息，总担心我们的安全。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趁老师不注意，中午偷偷溜到学校南侧的向阳渠游泳去了（学校明确规定不准擅自到渠里玩水），游得正尽兴时被邢老师发现并“捉拿归案”。因为我们未穿短裤，看到邢老师站在向阳渠边时，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身体不敢浮出水面，那份尴尬至今想起来都忍不住想笑。虽然班里调皮的，但每遇班里举行活动，同学们却都能踊跃参加。邢老师组织我们排练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片段，我演杨子荣，李志国演李勇奇，钟荣娟演小常宝，贾福华演卫生员，当时我们就十来岁。同学们在排练中都积极认真，兴趣十足。在全校的会演中，我们班的节目受到表扬，从而增强了同学们的集体荣誉感。

还有季玉璞（天津知青）、舒顺林、夏潜（均为呼市知青）3位老师也分别担任过我们的班主任，同样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季老师朴实、热情，和蔼可亲，他的体操功夫好生了得，能瞬间窜上单杠，连翻几个跟斗，常常给我们带来惊喜和欢乐。舒老师讲话中时而掺杂点湖南口音，引经据典滔滔不绝，恨



不得把他肚子里的知识全倒给我们。他讲话幽默，和学生关系极为融洽，我们在他面前也都无拘无束；面对我们尽情大笑时的表情，他经常说的那句“看嘴巴笑得跟那坝口子似的”，同学们至今念念不忘。夏老师作风严谨，语速不快，声调不高，温和中渗透着威严。他给我们讲立体几何时，自如地摆弄出几种形状，以此来讲解公式及推理，生动形象

（教练龚玉老师与校男篮，1975年6月）的教学便于学生理解、吸收。

不同阶段的课任老师，为培养我们也都兢兢业业，和蔼可亲，各有特点，

让我们也记忆犹新。学校1970年就成立了篮球队，第1任教练是女知青董笑菱老师（呼市知青）。她每天早上带着我们训练，一同与我们打比赛，不知疲倦。她还担任高年级的班主任，教过数学、俄语、音乐（最初几个班合起来上大课）。第2任教练是张武一老师（北京知青），带我们训练或打比赛时，很难看到他的笑容，但他带领我们打比赛或下连与知青比赛时却取得了不少的胜利。他还教数学、体育，他任班主任后就不带校队了，他训练的本班足球队，我们高年级都踢不过。第3任教练是龚玉老师（北京知青），她曾经是15团篮球队女队的主力前锋。她注重系统训练，并传授给我们更多的篮球知识技能及篮球理念。龚老师性格直爽、做事节奏快，很（第3任教练龚玉老师）少对我们发脾气。她同时还担任高年级的班主任和数学教学，1977年恢复高考，她居然报考的是文科，且高分被北大中文系录取。



1973年学校又成立了宣传队，原团宣传队的刁惠萍（北京知青）、吕德勇、孔留锁（均为天津知青）3位知青调入学校任教，同时负责宣传队的排练。刁老师总负责，宣传队的成员就是由刁老师从全校各年级中挑选的，我们班的同学被选中5男5女（我有幸被选中），几乎占到宣传队的一半。宣传队主要排练舞蹈、小话剧、曲艺小节目等。当时我们都上初二了，还有更高年级的同学，大部分男同学形体动作僵硬，刁老师就从基本功开始训练，一点一滴，一招一式，慢慢把我们这些“笨鸭”赶上架。演小话剧特别难，我们所演的作品大部分是反映兵团战士的题材。因为年龄小，缺乏生活阅历，难以入戏和刻画人物，刁老师就不厌其烦地引导、启发，最终我们的节目还是搬上了舞台。刁老师给我们编导的几台节目在团里都演过，1974年还被团里委派赴14团和1786骑兵团慰问演出，均获得好评。

在学校宣传队，刁老师对同学和蔼可亲，因此同学们常常围在她身边，无拘无束。傍晚她还常常邀请团宣传队的队友来学校给我们讲故事。讲的故事的有“带血薄币”“一只绣花鞋”等，讲得我们一会儿兴高采烈，一会儿惊恐万状，讲到最恐怖时，还突然拉灭了电灯，令同学们发出阵阵尖叫。有时讲到关键时刻又忽然中断，随后是“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次分解”，同学们在可怜巴巴的

哀求中散去。

在听故事的过程中，我学会了恶作剧，有一天晚上，我们排完节目，同学们先离开，刁老师最后关灯，锁教室门，就在她关门转身的一刹那，我拿着事先准备好的一张白纸往她眼前一举，只听到“啊”的一声，刁老师直立着靠墙，没有了呼吸，这时我傻眼了，大声呼喊“刁老师”！大约10多秒钟后，才听到刁老师倒过一口气，随后“哇”地哭出声来，后被同学们搀扶回去，这时我才意识到摊上大事了。第二天，教导主任马士义老师（北京知青）严厉地批评了我，我又向刁老师诚恳地承认错误。很快我们又一如既往地刁老师有说有笑——刁老师没有“记仇”。

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忘了曾经犯过的错误，我与高年级的同学一起，又对刁老师搞了恶作剧，不过由于刁老师经历了上次，已能“挺住了”，说明知青老师“钢铁般的意志”，也说明幼稚无知的我，在“恶作剧”下差点闯下大祸。长大后，我常常为此事后怕和羞愧。

许多同学爱好文体活动，都是受团里活跃的文体活动的影响。15团聚集着4000多知青，分别来自几个大城市，可谓人才济济。兵团组建不久，15团就相继成立了团宣传队和连宣传队，成立了团篮球队。各连的篮、排、足、乒、羽等球类活动也相继展开。印象最深的就是全团各连都在赶排样板戏，因为新鲜和好奇，观看排练和演出是同学们最大的乐趣。看得多了，许多同学都能把整场样板戏中不同人物的唱腔、道白背下来，对戏中的“翻跟头”动作更是着迷，许多同学都在校园里模仿着练习，自发地掀起了翻跟头热（当然是简单的翻跃），我也投入了翻跟头的热潮。我在沙坑里练前空翻时，因翻过了劲摔到沙坑边沿上，导致右大腿脱臼。尽管如此，同学们翻跟头的激情丝毫不减。4连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演出，让同学们第一次接触到芭蕾舞剧的剧种，我们还十分好奇地跑到后台，亲手触摸着芭蕾舞鞋。（左一是本文作者）



团篮球队、乒乓球队的训练和比赛，给了我们极大的吸引力，因家住团部大院，团篮球队每天都在大院里的球场上集训，我很快就被知青称为“秃子”的男队队员所吸引。他在球场上动作优美，而富有个性，打球机智而显得很狡

猾，拼搏精神格外突出，是队里的绝对主力，很快我就成了他球迷“粉丝”，而且每天着迷般地模仿着他在球场上的一招一式，甚至连他的内八字走路和球场上哈着腰的体态都去学，结果学出了毛病，一段时间里自己的走路姿势和体态变得很不“顺眼”。后来“秃子”和球队的杨永平（副业连呼市知青）被学校邀请担任我们校队外出田径赛、篮球赛的指导，这时我们才知道他叫张胜民（一连北京知青），开始称他为“张教练”。与他熟了以后也开始“粘上”他和团篮球队，不管是他们在团招待所住，还是后来被安排在3连，我都是经常去找他们玩，“粘着”他们，是因为他和他的球队，才使我从儿童时期就开始对篮球运动的迷恋，也使我在篮球场找到了童年的欢乐。因为张教练在球场上穿的是13号球衣，1971年我也穿着13号球衣开始在球场上驰骋，这也是我在球场上背了30多年13号的缘故。我先后成为建丰农场球队（1983年获得巴盟农垦系统篮球赛亚军）、巴盟农管局篮球队、内蒙古师范大学篮球队队员。

兵团时期，学校经常组织我们学习各条战线上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团里的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也屡有涌现，6连呼市知青的勇拦惊马、身负重伤，9连天津知青高烧仍不下夏收火线，最终病情恶化光荣牺牲——这些典型事迹对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人物】

从绝食女生到极左排长

沈岩真

1969年我们陆续来到建设兵团的连队，不久，我所在的15团2连发生一件新鲜事——一位女孩绝食要求退回北京。

那是9月，她躺在被窝里不起床，不吃饭只哭泣，要求退回北京，后悔来这里了。于是，刘玉芳——我们姑且这样称呼她，成为新闻人物。

每天下工后总会有人跑去瞥几眼绝食者，回来向大家实况报道，绝食的事迹很快传出连队，分布在全团的同学们都听说了又加以扩散，刘玉芳声名远播。想反悔想回家想回北京的，多了去啦，谁采取行动？不敢，没用，鸡蛋往石头

上碰，绝不会让你离开这里，大部分人都这样想。偏偏这个小姑娘就行动了！许多人都说风凉话批评她、鄙视她。

然而她很坚决，1天、2天、3天，仍然不吃不闹在炕上躺着，人们才意识到她是来真的。我亲眼见到她是绝食第5天，好像是午后，她宿舍门前围着一圈儿人，其中有我。眼见指导员和他老伴一同来了，老伴手端一碗热面条，这碗面条啊，绝不会是大食堂做出的，而是熟悉的妈妈味儿，久违了，碧绿的葱花透出香味，满满的面条上还有胖胖的卧鸡蛋，在这地老天荒满眼泥坯房的地界，天天喝糜子粥啃胡萝卜咸菜，哪能见到面条，可想而知我们馋成什么样子。

指导员敲敲门，老伴递给他那碗面条，门开了，是陪伴刘玉芳的女生打开的，指导员进屋，我们听不清他劝说什么，只能看到刘玉芳躺在炕上露出的黑头发。许久没动静，指导员一直坐在炕沿温言劝慰，微微冒热气的面条放在枕边的炕席上。

忽然，刘玉芳从被窝里抬起头面朝门外的我们，有点气愤有点矫情地告状：“她们说我！”她声音嘶哑低沉，黑发凌乱、面容苍白。她耳朵真尖，我站在人群里都没听见，指导员更没听见，一个劲儿地哄“谁说你哦，没人说你哦，”刘玉芳倔倔的低声反驳：“她们说：还求她吃饭！”她有点恍惚地眼睛半睁着，弱弱地盯着我们，但是，眼神冰冷，冒着丝丝寒气。指导员走出门来示意老伴进去，然后紧紧关上门，转过身，脸板得硬硬地训斥：“我们做工作，谁在捣乱？散开！散开！”

大约从那天开始，刘玉芳进食了。绝食无果而终，应了大家的预言。多年后她曾提起进食的事，淡淡地说：“如果再不吃，就死了”她会饿死吗？连里和团里会任她被饿死吗，会的！因为关系到军心动摇的问题，假若她成功获准返回北京，绝食立即蔚然成风，局面将不可控制。比如我，就在等待。

人是奇怪的动物，大部分人都后悔，都想逃离，而刘玉芳没有损害任何人的利益，甚至有可能为大家踩出一条路，但是几乎没人同情她，没有任何人伸出援手，反而各种议论层出不穷（尤其女生），当然还有革命义愤。

另类的命运是被同类唾弃。她敏锐地感觉到了，所以用乖张来反抗。

刘玉芳以失败告终，不仅是退出舆论中心那样简单，她是最垫底的落后分子，扛锄下地、开会发言、打饭挑水，生活中一切，时时刻刻都抬不起头。

因为我们2连纪律差，那位端面条劝慰刘玉芳的指导员调走了，新来指导员风格大不相同，严厉整肃，从抓政治工作入手，阶级斗争那根弦一下子绷得倍儿紧，班长和排长增添了统治权，于是管治降临，顿时，歌声嘹亮红旗飘展，秩序建立井井有条，大家松了口气，内心产生安全感——终于不乱了。

正是此时，刘玉芳出现在聚光灯下，高调返场。

晚上，新指导员巡视营区，透过宿舍窗户发现刘玉芳在昏暗的油灯下读毛著，连续多日皆如此，大部分人不是串门聊天就是早早睡下，总之累了一天这会儿都在放松，唯有她坚持不懈地武装思想。新指导员颇为感动，全连大会上郑重表扬她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自觉性。此后一发不可收拾，越表扬越学，越学越表扬，有时甚至彻夜苦读！仅仅学不行，还要运用，随之而来是让她上台发言介绍学毛选经验和活学活用的事迹，如何改造自己脱胎换骨顺带着“一帮一，一对红”还拯救了另一个落后战友。她大翻转的事迹太典型了，很快走向团里的讲台，走向师里的讲台，走向兵团部的讲台甚至到北京参加北京军区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她像迅速升起的红色明星，成为2连响当当的品牌。

平心而论，刘玉芳确实没有自暴自弃，结束绝食之后谨言慎行，从不像别人那样随意发牢骚讲怪话，劳动上也是苦干实干拼命干，严于律己，但她把自己封闭得很严，如此大转变的契机是什么？谜一样，内心深处的话不向人透露。

那些讽刺过她、蔑视过她、慢待过她的女孩们，没有被她的光环炫倒，尊重并没有随之而来，但是无论如何，她跨过了忍辱负重的阶段，即将迎来什么？谁都没有想到，刮目相看的日子在后面。

刘玉芳被提拔当排长了。于是她的女排也响当当过硬，大会小会得到表扬，劳动任务不止完成得漂亮，还经常超额。下工她的排回来最晚，回来后她的列队总结最严格，解散的最晚。带动其他排也热火朝天奋发图强，男排也有他们的先进人物。总之，连里的精神面焕然一新，表扬奖励接踵而至，一跃成为先进连队，人人自豪，庆幸走上正轨。

事情没那么简单，治理一个连队，靠的不是刘玉芳，靠的是指导员，他靠的是什么？纪律。是纪律带来了井然有序，维持秩序靠什么？要靠不择手段地维护纪律和无情的打击违反连规的刺头。要让每个知青明白，你们都是改造对象，老老实实接受再教育，闹小脾气？反了你啦，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

因而，连里的阶级矛盾眼见着升级，三天两头的有阶级斗争。初进七十年代，尚值文化革命高潮时期，社会上斗得你死我活，连队也适量引进，时不常地揪揪反革命小集团，比如一打三反运动，军队是不参加的，但是我们连的男生被捆起来好几位，扔进冰冷的空粮库，最长的关了5天。其实几个大男孩只是欣赏了几首旧歌，被连里渲染定性为黄歌。正所谓听话者平安无事，不听话者挨整。我们的“良民”性格便由此扭曲塑成。

在女排，刘玉芳这个排阶级斗争分外激烈，她也投身政治挂帅，目光灼灼动辄上纲上线。但她是69届，小学毕业便没有机会读书，文化水准低，又不热衷学习，使得她狭隘短视，所作所为更多的是可笑而不能让人服气，更严重的时候是盲目行动不知轻重。

她虽然对于盛行的“阶级论”并不懂，却敢于无知无畏地乱扣帽子整人，比如有女孩搽雪花膏，她组织开会批判人家，说是资产阶级思想泛滥。

对于爱看书的人，她不能理解，曾说：毛主席都不让办大学了，老师都下放了，看书有什么用。这种肤浅的认识如果只停留于此，那么与大多数人一样构不成危害，可怕的是，她被授予了“生杀予夺”的权力，她又属于不怵滥用权力的性格，造成对别人的伤害极其严重。有这样一件事。排里一位女孩好学、喜爱读书，换到今天，这类孩子必居优秀之列，因为主动学习是难得的品质，将来往往会出类拔萃。然而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代，情况就相反了。全连范围内其实没有多少书，几本小说偷偷传阅而已。

这个女孩看一本《欧阳海之歌》，红色小说，被刘玉芳发现，声色俱厉地叱道，不许看小说！欧阳海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交上来！注意，她竟然不知道欧阳海，曾经风靡中小学生的英雄励志小说。书没收，但事情没完。女孩吃完饭急着上工干活，不小心把空饭碗放在毛选上，不幸又被刘排长发现了，立即成为重大罪行，召开批判会，驱使班、排里的小姑娘们发言声讨这位女孩，前账后账一块儿算，从政治上定性：不忠于毛主席！

逼得这女孩不想活了，跑向盛水期的二支渠想跳进湍急水流，至今她还在感激拦住她的人。那时，我们处于人身依附状态，离家千里，没有后方，只能与同伴依偎在一起互相取暖，一旦失群被孤立，脆弱得很。2连对个人的打压素

来无情，男排也有轻生的事发生，当事人几十年来一直感激从高塔上将其劝阻下来的战友。

她的排死气沉沉，沉重压抑，我们这些旁观者非常同情，也非常不满。胆怯的反抗偶尔出现，一天下工回宿舍，刘玉芳当头看见门上4个玻璃格里写着4个粉笔字：石皮化贝，她立即明白。第二天是难得的休息日，人们利用珍贵的一天洗衣、晒被、访友、补觉，轻松一下，她却集合全排站队训话，足足训了两个小时，追查谁写的粉笔字，威胁有人搞小集团，吓得大家不许串门子。

4个字组合起来是“破货”，更像人身攻击，而双方也都在泄私愤。她颐指气使地对待战士，连里领导知道吗？当然知道，我们，包括男排，都能经常听见，她下工回来作队列前总结时的凶巴巴声音，对排里说话一副没好气地蛮横语调，其霸道人尽皆知。至少，她是得到默许的。这就是盼来的秩序和必须付出的代价，值得吗？领导天天让喊口号“加强纪律性生产涨一寸”，实质是，纪律可以任意制定，成为用来驯服的鞭子。

总的来讲，刘玉芳靠自己挣开了个人的生存空间，非常人所及，令人难于理解的是，当她地位稳固后，对同命运女孩们仍旧相煎至急，在女干部中少见，猜测一下，恐怕症结还是跟绝食时的怨恨难消有关，迁怒于无辜者。兵团后期随着年龄和阅历增长，她有所转变，成熟些了。

我写此文前，曾想采访她们排的一些人，但她们都不愿再提往事，可见受伤之深。然而，我想，她也是受害者，而且受害甚深。她在连里没有朋友吗？有，都在别的女排，很真挚的友谊，朋友回京探亲超假了，返连队后写检讨通不过，不深刻，她着急拿来看，检讨里写着“比较散漫比较”什么的，她立即责备：“什么比脚比手的！我给你写吧！”一气儿写了18页，顺利过关。

很有人情味，很开朗，很不讲原则。而她的这位朋友，就是指导员送面条时开门的那个善良女孩，当时她怜惜刘玉芳。结果刘玉芳与她保持终生友谊。

我的一位好朋友在她排里待了很短时间就逾假不归，一年多后，其母亲来替女儿办理转插手续，运走行李，是那种棕红色木箱，我帮忙，找刘玉芳寻个草帘子当作外包装，她带我到排里库房取了一条草帘，本来做了好人，临了她却带着敌意说：“我们排这帘子可不是为了伺候她的！”我赶紧卷起草帘就走，

吞回谢意，她又说：“知道吗，为领你到这儿拿，我的脚崴了好几次。”说话态度缓和下来。

是抱怨还是表白？难分辨，我相信她走过来非常吃力，知道她脚骨骨折长期无法愈合，伤筋动骨一百天，她却不好意思休息那么长时间，所以瘸了一阵仍坚持下地劳动。这就是先进人物的难处。当时我没领情，一心要离这个脾气乖戾的人远点。

我认为她不是存心钻营捞政治好处的人，时势把她推上那位置，尽管当年她飞扬跋扈，内里却缺乏安全感，时时防范，用出击来自卫，日子也过得艰难。在政治互害社会里，谁能安全？

她积极配合但并没有什么长远眼光，受素质的局限。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点，她没再被提拔。是不是出于大公无私不考虑个人利益？不，不，她最敢争取个人权益，单纯而不加掩饰，这是一种难得的特质，读几天毛著就能改变？

随着知青运动的结束，在返城大潮中刘玉芳也回到了北京。这里才是她一直渴望生活的地方。为此她曾经豁出去了，如今为此她也舍弃了许多。洗尽铅华归于平淡，回归了原有的本相，分配工作，建立家庭，有了儿子，一切圆满。工作干得不错，当了会计，依靠自己努力有了专长，生活稳定。她属于敢追求美的人，从照片上看，长发披肩烫着大波浪，衣衫合体颜色明快，人很漂亮。

挫折也有，夫妻不和，只好离婚，她是好母亲，心疼儿子怕他受委屈，一直没有再嫁。时光飞逝，儿子成家立业，她退休该享福了。可叹，在人生转折处，她再一次钻进牛角尖，再一次行为极端而不顾后果，为一些不切实际的感情想不开而逐渐抑郁，多日拒绝进食，终至器官衰竭而猝然离世。生命结束得如此倏忽，怎能不让人震惊？况且，悲剧似的谢幕人生，方式如此吊诡，怎能不让人联想？她，是不是受害更深？

一直准备为她写点什么，当然不可能是歌颂，更无意声讨，如果责难，就责难那时的反常政治吧，正如汉娜·阿伦特说：没有独立的思考和判断，每一个普通人都可能是恶的代言人。

我哪有资格臧否人物？

只想写本真的她，但是难，眼中见到的也只是折射出的影像，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与她同时，连里还有另一个绝食女生，几天后逃跑回京。因无出路最终返回连队，之后也是努力进步，也是未到60岁，病逝。☞

2017.10.02

【人物】

炳年之死

——浮光掠影的往事

王金堂

炳年，姓刘，天津5中68届初中生。矮个，长圆脸，脸蛋子胖得稍有点嘟噜着，黑黢黢且无光泽。说纯正的普通话，很自然地不带津腔。他能让人在不经意间觉出重点中学出来的学生有不一样的底蕴，特别是“刘炳年”三个字的签名，写得龙飞凤舞，接近他的人时不时能看到。据说，在死刑判决书上的签名，依然不改龙飞凤舞的本色。

1970年底至1971年初，我从15团煤矿下来，几经辗转又回到1连，与炳年同班，住一个宿舍。

没有荣升通讯员时的炳年是乖巧的、沉静的，从不与人开玩笑。

生活中，他节俭、自私，与人无深交；工作中擅长干表面上的活儿，重活、难活躲着走（我的感觉：一是他体力不够，二是怕干不好出丑）。

遇有人说脏话讲荤段子，炳年从不参与，但听得饶有兴趣。大家哄笑时，炳年闪到一边，嘴咧开一点，浅笑。嘴唇是紫的，露着白的牙。

“炳年子，你丫最坏了！”有人嚷嚷起来，炳年一笑了之。

骂起来，炳年不语，神色凝重；再骂，则是不屑，是那种从心底透出来的“胸藏风云世莫知”，俯视群氓的不屑。偶尔也会分辩几句，但绝不会带粗口。

在峻急的言语压迫下，炳年会口吃。

表面上的炳年是孱弱的……

教唱“样板戏”

表面上弱的、静的、力拙的炳年，每每有惊人之举。

1970年中至1971年初，在“大唱大演革命样板戏的高潮”中，炳年在连里贴出自己教唱“样板戏”的海报，摆出敢与连办的主流《智取威虎山》剧组竞争占领无产阶级文艺阵地的架势，一片哗然……

“炳年，什么是二黄倒板？”

“炳年，西皮流水怎么唱……”

自以为深谙优孟之术的炳年，几无招架之力。在回答什么是“回龙”时，竟说是京胡拉“的龙”时的那个音调，招致一片嘲骂声。炳年不知，国人中爱演戏会唱戏的人何其多，以至“做戏”的传统已深入到我们的骨髓中。

平心而论，炳年唱戏的知识和其小翻（跟头）的功夫，我不能望其项背。我尤其欣赏他击鼓的技艺：熔激越、舒展、潇洒、恬淡于一炉，“吾辈好生羡慕”。

教唱“样板戏”没有得到“上头”的认可，自然是无果而终。此举在群众中没有得分，在领导那儿也没有失分，总体效果是得大于失，“扩大了知名度”。

夜读“毛著”及晨练冷水浴

炳年的夜读让我记忆犹新：夜半，煤油灯下，昏昏然；以箱为桌的桌面上，书、笔记本、日记本、沾水笔等堆放有序，灯影之下，森森然。往往有炳年自己手书的毛泽东的“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一类的励志小条幅置于明处。

炳年夜读的标准形像是：披着棉袄或大衣，长且胖的脸在摇曳的灯光下神色凛然，满带“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庄重，正襟危坐……

其夜读的戏曲样本应是关云长夜观《春秋》的套路，现实样本则是林彪读毛选的剧照。而冷水浴显然是以“伟大领袖”为楷模的。

毛说，冬天在井边把一桶桶的冷水从头淋下去，没有勇气的人能做到吗？

炳年诗云：“冷水浴，练心意，惊风雨，气天地。”

不过，炳年的冷水浴是在宿舍里表演的：赤裸着身子，用毛巾沾着冷水擦，擦。奇凉之下，嘴里发出“啊”“啊”的啧啧声。

炳年的夜读和晨浴着实让我感到“革命”的压力。

实在烦了，我有时会阴险地说：“炳年子，有能耐到井边冷水浴去！别影响别人睡觉。”

炳年并不上当。细想，同样是隆冬腊月，“岳麓山下红旗展”是什么温度？而“乌加河畔尽朝晖”又是什么温度？

炳年对度的把握颇有分寸，不仅是冷水浴。

炳年壮门面的脸和他瘦骨嶙峋的身子骨形成的反差让我惊讶，他用毛巾擦拭细瘦的四肢和凸现的肋骨的影像在我的脑海中清晰如昨，而他发出的“啊”“啊”的声音似乎穿越时空还在我耳边回响。

干谒王侯

炳年给高级领导人、名人写信，是一以贯之的。

他跟着形势写，赶着潮流写。或自荐或举荐或建议或探讨或批评。信里有自己的想法，也有大量道听途说，一并写入，洋洋洒洒。

他深慕“识荆”的古风，也相信这“上书”（写信）至多不过是落一个焦大类的愚忠，可能会被“塞一嘴马粪”，但不会伤及筋骨。他看到的尽是黄帅、张铁生、李庆霖一类的“写信明星”的发迹。他对“领袖”“革命”的忠诚、真诚“日月可鉴”，同时他也太想一夜成名、太想出人头地、太想改变自身的“奴隶地位”（革命导师语）。他自视有成为大人物的才干，而没有干重体力活的能力。

人生如果是一场戏，那对他来说，这是最出彩、最关键、最好演的一折。

唉，炳年，殊不知，写信写出名、发迹的，寥若晨星；写没了命，下大狱的数不胜数。

有人劝过他，不听。

炳年写信的对象，择其体积巨大者，计：毛泽东、周恩来、林彪、江青、李讷、陈伯达、康生、谢学功、郭沫若等等。

给毛写信，其中的一封是建议成立“马列主义国际军”，武力统一世界，其想法之荒诞，类组织现代“十字军”东征异教徒；

给周恩来写信是举荐自己的大哥（据他说是天津名中医），可医好周的病，

心意款款；

给郭沫若的信是探讨新诗歌问题（这大概是受毛当时发表的新诗词和议论新旧诗的启发），寄去的诗作里“冷水浴”诗及引起女生公愤和男生嘲讽的“神州不统一，永世不娶妻”诗就忝列其中。

但是，要了炳年性命的主要是写给李讷（或江青）的一封信。炳年写的一时兴起，问江青阿姨：“在家里，主席有缺点可不可以批评？”这其实也是毛泽东一贯挂在嘴上的主张，即孩子可以批驳父母、家里人可以批评家长。这样写，本意是投其所好，没话搭拉话，属于拍马之一种。然而炳年出事时正是邓小平先搞治理整顿、然后是治理整顿邓小平的1975年，这给了人们以充分的联想和上纲上线的空间。

这些都是炳年出事后，有关方面组织对其“大揭发、大批判”时披露出的鸡零狗碎的材料。

“代理通讯员”的辉煌和大蹭蹬

炳年的革命方略在1971年下半年（或1972年上半年）起了作用，他被连里宣布为通讯员，但因群情激愤旋被改为“代理通讯员”。

代理通讯员的炳年，帽檐捏成船形（或像棺材头型），衣服簇新、略大（炳年因节俭，保有的新“垦服”派上了用场），风纪扣一丝不苟，一脸深沉。从连部出来，穿过长长的操场去水房或猪号，踱着步子，举手投足间最像首长。这是炳年最辉煌惬意的一段时光。

那时，我正在经历着朦胧的初恋，天天盼着来信。炳年掌管收、寄信的生杀大权，免不了要麻烦他。

我紧追在他背后，小心地叫：

“炳年子”，不理；

“刘炳年，”仍不理；

“炳年，”“……”；

“小刘，”“……”；

最后喊：“通讯员（大声）！你妈的（小声）。”

“干吗？有事吗？”炳年在听到通讯员的称谓时才慢慢扭过头来。

“有我的信吗？”

“有信，我会让各班的班长到连部来取，由班长发给个人，不要直接找我……”对曾住一屋的熟人，炳年照样正气凛然。

“浮华的背后是危机”，有位高人如是说。

事实上，炳年甫一就任“代理通讯员”就受到了上、下双重压力。

上层是连部的其他人员（文书、会计、出纳、统计、保管、卫生员）集体挤对他，采取一致的敌视态度，因而对他不利的负面信息呈辐射状；

下面是，连里的部分知青或真的对他有意见，或是看不上他的做派，以讹传讹，呈人云亦云状。

其代理通讯员的生涯不长即民怨沸腾。

总括炳年的“劣迹”，一是有“一阔脸就变”的嫌疑；二是对女知青过于热情，对男知青过分冷淡，违背其“神州不统一，永世不娶妻”的誓言，对几个女知青格外殷勤，“疑似”心怀不轨，甚至扣留个别女知青的信件（据说）。

但是，造成炳年被众人当成异类，导致他最后被撤职，受到一次人生大蹭蹬的原因，我以为应该是他那不加掩饰的、要改变自己的地位的“力争上游”的精神，和“狠狠作秀”（当代语，源自一个新左派的戏剧导演）的表演。

我们的文化基因告诉我们，对功利的渴求要迂回地表达，要“谦虚”。炳年体力不逮，又一贯地“怕苦怕累”，他属于那类干得不好，又不懂得谦虚的人，凭什么“发迹”？于是，干得不好，无缘谦虚的；干得好，不会谦虚的；干得又好又谦虚的；干得一般，但很会谦虚的，都迁怒于炳年。

他成了众人攻击、发泄、嘲笑的目标。一时间，恶搞“冷水浴”诗和“神州不统一，永世不娶妻”的声音不绝于耳。

“炳年，什么台湾不解放，一辈子不娶媳妇，是找不着急的吧……”

“炳年，这顺屁股溜也叫诗呀！”

在如潮的笑骂前，炳年表面上的气定神清让我佩服。换了我，早就发疯了。

在各种舆论的压力下，炳年在一个很没有面子的公开场合，被连领导宣布撤销“代理通讯员”的职务，把铺盖又拎回了大田排。炳年在1连从此跌入深谷，一蹶不振，其革命方略似乎只剩下干谒王侯——写信一法了。

末路

被罢了官的炳年，凄凉地回到了原点。在连队又一次把人员打乱重新分班、排后，我和炳年已不在一个宿舍了。

听到他杀人的事，我并不十分吃惊。让我震惊的是他因此而被枪毙。

炳年的杀人，根本的原因是和他的精神状态有关：极端的自负与极端的自卑，极端的功利与极端的无望，交织缠绕在一起，使精神处于妄想狂的临界状态，几近崩溃。

炳年不是一个异数，而是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只要那个让人诅咒的时代继续下去，就不断会有新的炳年涌现出来。

炳年杀人的直接原因，因观察角度不同有多种版本。我以为较接近实际的原因是这样的：

炳年自认为这次的上书（写信），自己终于可以一鸣惊人、一飞冲天了，但是竟然被轻蔑地对待，错过了他苦心设计好的符合天时地利人和的最佳时机，断送了他唯一的出路、唯一的机会。

这无疑是对他生命的毁灭。

当众拿他追求女知青的事情嘲笑、讥讽，是对他即将成为大人物身份的藐视，“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要报复。

这次他要表演的是“大人之怒，血光冲天”。他用一把小号三角锉磨成的刮刀把人扎了若干下，又把一瓶煤油和一盒火柴置于明显处。他有时间将人杀死把火点燃，但没有做，又若无其事地回屋睡觉去了。

在似不可理喻中，我们又一次看到戏剧化的因子：架子要端足，表演要极致，尽量与众不同。

炳年的杀人毫无疑问是个悲剧，不管是对受害者还是害人者来说都是如此。

但是，人们从开始时的震惊、愤怒、莫名，很快转入到兴奋、新奇，索隐细节的喜剧状态；继而在上边组织的对炳年“大揭发、大批判”的活动中，又“有枣一竿子，没枣一竿子”搜肠刮肚地揭发凑材料，挖空心思地“上纲上线”，这喜剧又衍绎成了闹剧。

炳年以“现行反革命杀人犯”被处决，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让我们知青自

己给闹死的、说死的。

炳年的末路，是他优孟人生，演砸了的一个悲剧，而怀着看客心理的我们，又把这个悲剧演成喜剧进而变成闹剧。

从那个时代到这个时代，从“引车卖浆者流”到精英阶层，从台上政治秀到下台后搭班唱京戏当票友，都走不出这悲、喜、闹的环形剧场。

鲁迅说：现代史是一出耍猴戏，实际上，整个历史就是波澜壮阔的戏剧秀场。优孟的中国“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优孟的中国人与众不同。

尾 声

如果记忆没出错的话，炳年是1975年2月1日被处决的。

当时邓小平再次失势华国锋等政治新星冉冉升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方兴未艾，内蒙兵团“无可奈何花落去”正在撤制与地方交接。倒霉的炳年，赶上了“杀一批”的政治形势。

照一般的理解，炳年的罪行也就是到萨拉奇劳教3年或充其量判几年刑，无论如何也不至于犯到了所谓“现行反革命杀人犯”的惊天大罪。

据说，内蒙兵团上报北京军区建议判炳年无期，北京军区上报中央是死缓，而华国锋批示为：“思想右倾，留此人何用”。

在我们生活了很长时间的年代，有一个不应忘却的规律：大凡新起政治人物或政治势力，在他们“走台”“坐台”的关键时期；或一个政治运动的肇始、勃兴、低谷、谢幕的要紧场次，往往会有“杀一批”的“战略部署”与之配合，为之添彩、提神、壮行色。

可怜的炳年，赶上了“杀一批”。

让人聊以自慰的是，炳年赶上的“这一批”有张志新等众多的智者、殉道者，当然，这是现在的自慰。

开公审炳年大会的那天上午，连长白文好安排我看家（守连队）。

不去观看处决炳年的场面，正合我意。我不愿意看到一个熟人被这样杀死。

我的信念是：不应杀人，更不应杀不该死的人，这是我们人性的底线。

正像闹剧过后，当听到炳年真的被判死刑了，连里的人都默然了。我相信大家内心的感受如五味杂陈。我接触到的所有人都说，没想到会是这样。

那天，全连知青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连队，连里死一般的沉寂。接近正午时分，似乎从2连方向传来了枪声。事后，人们说：吕宝华（同时处决的人，案由是为女朋友抢一块手表而杀人）瘫了，是从刑车上拖下来的，枪响后，脑袋炸裂了；炳年是自己蹦下来的，头上只有个汨汨冒血的小洞。

有人说，炳年有视死如归的气概，如果不是嗓子被塞进浸有麻醉剂（待考）的破布，未准不能喊几句或唱几句（就像阿Q那样引起看客的鼓噪）。

但，我宁可相信在场的15团政治处的人的判断，一直到从刑车上跳下来，炳年仍以为他是来陪绑的。当看到有两个埋尸坑时，他崩溃了……

可怜的炳年，他可能至死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杀了他，他是那样地笃信那些政治寓言，痴迷那些做戏的表演。

可怜的炳年，死后被“再教育的老师”——当地生活并不太窘迫的农民剥夺了衣服，被“屯垦戍边”的同伴掰掉了脚趾……

2005年10月

【人物】

指导员·副政委

徐鸿年

李凤良：我始终叫他指导员



第一次见他，是到连队第二天早上，我跟车在“O”号地卸化肥。五月春末，绒绒麦苗钻出地面，斗渠上，银白色钻天杨饱满充盈闪着琥珀一样光泽，拍成散兵线的女排战士们在锄地，他扛着铁锹迎着阳光走过来。军装褪色徽章鲜红，身材挺拔，面容冷峭，无论着装、神态、讲话、举止，都是我学生时代对军队政治工作者

（本文作者：徐鸿年）的想象。

初到连队，作为一排一班的排头，几乎每日两次在队列里比别人距离更近听他讲话或点名，真正对我个人留下印象是在两个月后的麦收。

班里的皇甫锦义，来自集宁地区，“内蒙粮干校”毕业。他割麦子的姿势特

殊，两脚微分侧身向前，左手笼住麦子右手前探，镰刀由远及近轻松划来，裁纸样悦耳“沙”的一声，小麦从容聚在手里。麦收开始，连里曾组织他和几名复员兵和来自华北兵团的一位女排长进行过擂台赛，结果皇甫夺冠。

每看他第一个冲到地头，坐在渠背上，推起草帽眯缝着细小眼睛掏出一块小巧磨石边蹭着镰刀，边悠悠地瞭望还远远在麦海里游弋得我们的样子，抑制不住要学他姿势也试试的念头。

转天，乌加河北面一块稠密的麦地。淡淡晨曦中紧随皇甫扑下身子，他三拢，打要，我四拢跟。潮湿得泥土气息迎面扑来，挺过腰肌撕裂那刻阵痛，小麦倒伏声中只有粗重喘息，不停甩出流进眼里的刺疼汗水，余光紧紧追住侧面的皇甫！……终于，八百米地头我们同时到了。扔掉薅在手里的最后一束麦子，另只手按住膝盖努力撑起上身，让冲到脸上的血慢慢归位。渠背上先是看到一

双特大号光脚绿胶鞋，然后是军裤膝盖两大块黄补丁，再往上是军帽下压着的指导员雕塑般看不出喜怒的表情，目光投在我身后用镰刀木柄正指点着。我了解，他这语速较快的南方话是情急之下



才用的，但总不至于是批评吧？（前右一：李凤良指导员，后右一：徐鸿年）

心思写在我脸上，他提高音量蹦出了给力的普通话：

“回头看看，看看！丢了多少？儿马进地啦？乱弹琴！”

这下听清楚了，表达情绪的标点符号都感觉到了。（黝黑的肤色掩住了他的表情，此时应该属于“铁青”。）陆续上来的全班人也听清了，都努力严肃着免得我难堪。最先憋不住的是那个来自H市外号“老猪”的家伙，哇啦哇啦咧嘴出声像京剧叫板，顿时引爆全班。当时情景最贴切莫过于那句话“找个地缝钻进去”！

这是指导员第一次专门对我个人的“点名”，也记住了那句“乱弹琴”。后来这个口头语常听，不同情景不同表达。

八月末，随着“六九届”到来，我由一排一班调到二排五班，宣布前有了

指导员第二次谈话：“一排二排农业生产和管理侧重不同，立志扎根边疆一辈子的兵团战士，要戒骄戒躁团结同志……要抓紧学习，尤其注意向原场干部学习，尽快掌握全面生产技术，能够尽早独立工作。”除了简单对我来兵团四个月表现的肯定，这段记录几乎是这次谈话全部内容，像报纸摘要。

成长和选择需要这样的谈话。

一位先哲说过：“世上两种东西震撼我们心灵：头顶上灿烂的星空和崇高的道德准则”。生命的意义在于一个人的努力和品行得到尊重和信任。

我走出连部，心境清澈如这秋日晴空，高远无际纤尘不染，对脚下这片陌生的土地生出由衷亲切，看到的一切都充满友善。

“八一”在兵团是特殊日子，上级首长决定在二连组织一场千人以上的“麦收大会战”向建军节献礼。机关抽调了百余人，三连、七连支援。为体现重视，师部还从百里之外的乌梁素海调十九团一个连战士参战。

会战地点选在最具画面感的‘X’号地。领受任务的各级通讯报道员们早早拟好了宣传稿，只待临阵填上关键词和数字。厚厚的挑战书、决心书、火线入（团）党申请书递交到党支部、团党委。

7月29日，“大会战”前夜，紧张亢奋在连队蔓延。近半个月的“龙口夺粮”终于迎来了曙光，每个人对明天的表现充满想象和期待。

然而，一场猝然而至的食物中毒给了连队沉重一击。

为了大会战，也为迎“八一”，连里杀了头牛改善伙食。蒸过一次包子，暑热天气剩余部分肉馅变了质，炊事班把表面变颜色的铲掉，加热后，连同之前的剩包子放在食堂门前大簸箕和菜盆里随意加取。

几小时后腐败的牛肉露出狰狞。平日没有急促尖锐哨声根本醒不了，是被莫名动静惊起的。那夜有电，东边女排宿舍亮起灯光，夜色浓重光亮格外刺眼。影影绰绰有女生蹲在外面发出尖厉呕咳声。愣怔间，门窗大开的身后，睡在大炕中间的贾建设闷叫一声黑暗中弹起，我进屋摸灯绳功夫，隔着蚊帐，他“嗷”的一声横抡着喷射过来！几乎同时，几排宿舍声响大作，灯影晃动中呕吐的战士一个又一个踉跄奔出，也有往黑暗中公路边厕所跑去。一时，连队四处此起彼伏怪异拖长呻吟声不绝。没有症状的忙着照顾痛苦扭曲的战友，而腹痛呕吐病号还在不断增加，连部、卫生室亮着灯，连干部卫生员不知道被绊在哪个班，

跑来求助的人四处撞头！

车灯划破黎明前黑暗，一辆又一辆从师部团部来的汽车往返拉走症状严重的病员……。天色大亮连队逐渐平静，百多名战士食物中毒，昨天还生龙活虎一样的连队转瞬失去了活力。

师团首长精心组织的大会战夭折了。

公平说，这次食物中毒不能归咎为漠视战士健康发生的责任事故，炊事班年轻学生根本没有“变质”的概念，况且，谁能下决心处理掉那么稀罕的牛肉？炊事员们同样食用了肉馅，也有不同程度症状，尤其那个憨厚的上士最厉害，团部卫生所治疗回来又“二进宫”转到了师部。

大家感到了实行军事化管理的兵团对食物中毒的敏感，在“一律待观察”命令下，人员不准外出，食堂只供解毒的绿豆汤和稀饭。打破沉闷的是频频到访的吉普车和被簇拥着的各级首长，陪同他们的是脸颊深陷，蒙上秋霜一样的指导员。

按常识，指导员当然有责任，但直接责任人不言而喻。

食物中毒后全连总结大会八月二十七日召开。团政治处主任毕武成主持，首先传达内蒙兵团、二师党委、15团党委对二连食物中毒事件的通报批评、对有关人员的处理，最后李凤良指导员做检查。

他没有了往日挺拔，竟有些撑不起军装，失水的声带干涩嘶哑，眼角鱼尾纹裂痕一样触目，不像真实的皮肤。

念到后来他垂下稿子，目光扫视到每个战士：“同志们，这次食物中毒，给大家带来很大伤害和痛苦，给团党委，给党支部带来很大影响，给同志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取得的麦收胜利抹了黑！我非常沉痛……这个事件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你们要恨，就恨我，你们要骂就骂我，如果你们心里有气要打就打我！”说罢，从没见过地脱下军帽，黯然肃立。

少小离家，无依无靠的学生们无不自然亲近善良有担当的长者。中毒事件没削弱指导员威信，大家看到往日峭石般冰冷严峻的指导员有常人一样的脆弱和温度，消弭了对他的畏惧和距离感。多年后，突然意识到这是自己几十年职业生涯中听到的唯一一次担当责任的领导检查，之后再没有过这种经历。

几场西风，四野一片肃杀，犁铧深翻的田地裹上了白霜。拂晓，水渠边的

枯草结起晶亮的冰花，初冬了。

这些日子我一直负责秋浇地，24小时换班轮流吃饭。早上，连队刚刚出工通讯员小宗骑马奔来通知指导员找我。

太阳越过树顶晒得僵硬酸痛后背渐渐有了暖意，我把皮帽子抓在手里，趿拉着后跟与鞋帮快分家的黑条绒鞋迈进连部。隔着那张斑驳黄色两屉桌，指导员示意我坐下后递过一张表格，抬头印着：“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15团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

我满脑子还停在昨夜马灯光晕下混浊的黄水破渠而出那刻，担心无人看守的渠水漫过堤埂会冲向公路，没有意识到这张表格什么意思。我放下铁锹，僵硬的手抓不住钢笔，活动着手指。黑色摇把电话机陡然叫起来，倨傲抖动似乎要顶起话筒。抓起后，习惯的“喂”字还没开口，喷薄而出的尖锐撞击耳膜：

“二连吗？！叫你们连长、指导员来！”听出了这个地域味道特殊的普通话，司令部饶姓参谋。曾去过他办公室，浅蓝色烟雾缭绕得清晨阳光斜射下，正和一位女战士下跳棋。书本大的袖珍棋盘，木制小棋子很精致，大概正走着一步好棋，凝神屏息，两指尖捏着一枚骨朵儿一样的棋子头部，其余三指上翘成想象的兰花。

指导员接过话筒，隔着两张桌子对方声音清楚传来：

“团长命令二连马上紧急集合，跑步到团部……”

很快，我听明白了原委。

食物中毒事件后的二连，整整一个秋季后终于被通知可以去看电影了，战士们过节一样兴奋期待，憋足了劲儿要表现出经过学习整顿后的精神面貌和对集体荣誉的珍惜。傍晚，我在二支渠北面浇地，远远听到比平日操练更整齐的步伐声口号声往团部方向而去，几小时后，黑暗中返回的队伍保持着同样铿锵气势。

电影在三连与团部服务社之间空地放映。散场后，地上遗落了许多砖头、土坯、草垫子之类。听到汇报，首长相信了那片区域应该是平日作风散漫的二连战士所为，为严肃作风纪律，命令二连全体战士由连首长带队，跑步来团部清理现场。

指导员先是平静解释：“连队已经出工了，分散在好几个地号，现在通知马

上集合很困难……”

听筒传出的声音短促坚决不容置疑。

指导员又说：“大概有多少杂物，能不能叫司务长集合连部、后勤两个班去清理？”

对方音调显然已经不耐烦：“团长的命令是全连紧急集合跑步来团！”

指导员脸上慢慢罩上白霜，肃杀的有点令人生畏。胸口起伏拼命遏制冲撞，推开话筒不再言语却也没挂。

对方更显尖锐紧迫：“喂！喂！听到没有！”

终于，他怒吼起来：“你们怎么认为就是二连战士扔落的东西？二连去了多少人？坐在哪个位置？”

不待落音，“嘟嘟嘟”对方挂了电话。

无意撞上这个事有些不安，我只能沉默，尽快填好那张表格离开。

两分钟后铃声又起，仍是饶参谋，一改前态，语气拖长而低沉：“团长去现场了，~他就在那等着，~命令马上紧急集合！”

“你们岂有此理！”指导员的满腔怒火终于冲出喉头，甩掉的听筒被卷曲得话线拖拽着弹跳。他离开桌子，双手插进裤兜又抽出来，抓下头上的帽子露出眉际以上两种截然不同的肤色，暴怒狮子一样在连部大步转圈。

“岂有此理，简直岂有此理！”

我竭力平静，抓起铁锹撤了出来。回到地号，边巡看渠水边眺望连队方向。一上午伙房上空始终轻烟袅袅平静如常，显然，指导员并没理会那个紧急集合命令。

“学代会”结束进入年终“总评”。结合“两忆三查”，开展兵团组建后的第一次“整党”。

我生也晚，少年时代的“整风”记忆漂白模糊，但被引蛇出洞的右派们在文革中的遭际是亲眼看见的。更经历了文革以来，学生们单纯政治热情是如何被各色人物利用和操控，潜意识里对整这个整那个有本能疑虑躲避。

不是所有年轻学生都能守住鼓动和引导……。

中旬，风向悄然变化……。

尽管有疑虑，我潜意识里始终心存期待不相信这种荒诞会重演，然而还是

发生了，而且定性这样严重：

1月19日，团X副政委来二连做“整党”第二阶段总结，亦即发出了全面反击动员令。他先宣读了二师党委对十一团前期运动中揪出“非法小集团”的通报，话锋一转：“我们15团也出现了令人警惕的动向……，他们暗中串联开黑会，打着帮助整党的旗号反对党支部！我代表团党委号召全体指战员要……！”这位造型讲究的副政委不断配合着挥拳劈掌动作，表达迎头痛击的决心和力量。

散会后班排长到连部布置学习讨论，指导员把我留下，他表情沉郁：“整党……，七连有你的同学参与……，斗争复杂，对有些（复员战士）提出的那些意见和要求，你们不了解情况，不要头脑简单盲目跟从”。

欲说还休，从头至尾不知明确所指。

当夜，躺在宿舍望着黑沉沉屋顶，那些不连贯的话萦绕在耳。尽管隔着雾一样不清晰，可以看出蕴藏的是提醒和关心。

整党结束了。二连的年轻学生们安全渡过了“整党”。据传，连党支部有过被上级批评“走过场”现象，但没发生“引蛇出洞”，没被揪辫子，也没人被记入跟随一生的档案。而有的连队则进行了“组织处理”和人员调整，那位副政委点到的七连，有四个班，两个排建制被拆分到其他连队。

被称为共和国同龄的这代人注定一生伴随政治运动淬炼，“整党”事件为他们心智成熟催发了飞跃和省悟。

冬日昼短，收工天已黑透。晚饭后正抓紧组织大家“晚汇报”，指导员推门进来，冷风灌进，灯芯晃动，他的身影投在半面墙上。不在意大家疑惑探究的目光，直接招呼我去连部。

两盏马灯照亮连部里间，迎面单人床一位面色白净陌生中年军人颌首微笑。屋里已经站了四个人：一排长李，五排长常，我的同学女排长李莉莉，通信员赵光宏。指导员以没有太多色彩声音介绍说：这是二连新任（武德明）指导员，我们已经交接完工作。现在由他宣布一个决定。

随即，这位初次见面的指导员念出：

“根据中共中央……，根据×××命令……，经连党支部研究决定：×××、×××同志执行“支农”任务。……做好一切准备，听候命令随时出发！”

这是一1970年2月×号。此后，开始了近两年跟随指导员的日子。

正在“接受再教育”身份的兵团战士一夜间突然到了另一个世界，他们远离领导，交通闭塞，在陌生环境下独立担起了责任与挑战。指导员一项重要工作，是在“前指”统一要求，陈主任直接负责下，巡视检查所属三个旗县几十个“支农点”：传达文件、组织学习、听取汇报、指导工作、检查纪律、解决困难、听取地方干部群众对支农人员的反映。（对参加“支农”人员的纪律要求中，除了熟记于心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区前指”还制定了九项规定八条纪律十项守则，而执行最严厉的一些规定并没写在纸上。）

这是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世代农民为基本生存始终在苦苦挣扎。高寒缺水土地贫瘠很多地方口粮平均二百多斤（毛粮），常年吃返销。壮劳力每天分值不到一角，年终分红罕能见到现金，一些多年“×保户”买返销粮的钱都要从队里赊欠。很多大龄孩子失学（尤其女孩子），有的甚至不熟识面额大的票币。

他们居住原始简陋。平原地区多为就地取材的干打垒土坯房，如果哪个村突兀出现砌砖地基顶上盖瓦的“穿靴戴帽”房屋，这家一定有吃商品粮挣工资的城里（公家）人。起房是惊动全村的大事，再难也要请全村每户出个代表吃顿糕。盖房娶亲几乎是年轻人一生全部梦想。

山区农民沿袭祖辈习惯住窑洞。（这里成规模大片田地很少）每家都以自己选择的地势风水和土质土性**碓**（捏）窑，往往一个村子几十户散落几百米。窑洞远不是想向中的那样冬暖夏凉舒适浪漫，选择它是因为几乎没有成本。为了抵御严寒和活物侵扰，门窗洞砌的深厚窄小，光线微弱，我每次进去都要稳住身子闭会儿眼睛慢慢适应黑暗。里面永远弥漫着挥之不去积年气味。

终生没娶的光棍很普遍，数量与贫富程度成比例。这里女子金贵，婚后多数就不再下地，却无法掌握自己命运。女孩子成为有价资源，男孩子家中如果没有相应的女孩子换亲就会失衡。这里事实上的童养媳从没绝迹，为了家中迟迟不能娶亲的大龄男性，有些女孩子早早被预嫁出去换回彩礼。婚姻也会成为政治行为，有的地、富子女为了改变命运可以不要彩礼，嫁给根正苗红有政治前途的贫、雇农子弟以期改变血统。

为了跳出贫困，一些女性会选择嫁到条件好一点地区，被那边的人以更多彩礼买走，女性资源外流更加剧了性别失衡。

工作组都有这样的经验：开展运动，进村后扎根串联首要建立骨干队伍，

不需要太认真研究考查，最先吸纳的骨干一定包括队里的饲养员，贫穷坚定对政治运动积极性最高。其中很多中年光棍以生产队饲养房为家，了无牵挂政治可靠，被委以管理农具和饲养牛马羊牲畜，这是生产队（集体）的主要家底。他们大都有“土改”时期的光荣史，但政治上的优越没带来在农村赖以持家的勤劳节俭品性，本分人家不会把女孩子嫁给他们。一生无婚，终老孤寂。

初到乌盟，曾在一个叫“纳林沟”的村子蹲点。组织社员把大路两侧的坡田用石块垒出上级要看的梯田样子。初春的阳光慵懒温暖，残雪融化万物萌动。地头休息时，一团团劣质烟草吞吐中围成一簇的老汉后生们开始了那个重复不变的话题，暧昧恣肆亢奋迷离，遥远陌生却是昨天今夜当下身边正在发生的那些不可言状……。

日光温暖却感到阴冷，此刻何处？竟生恍惚。

在这里第一次听到“拉边套”“搭伙计”“×锅”。这让我震惊，学生时代书本上曾经至纯至爱得神圣，在苦苦挣扎的原始人性和贫穷面前如此不堪一击！

对“支农”人员严格规定吃派饭由生产队干部指派贫下中农，不可以自行指定且必须轮流。指导员视察过程中发现有违反这项规定或仅仅听到反映，不给解释机会就发回兵团。

我违反过。

这是三孔窑一家人，迎面是灶间，东西两孔格局摆设一样。家中无老人，老大中年木讷，老二年轻灵醒，满地跑的女孩儿对两个男人都喊“大”。女人怀里抱着一个男婴，响起啼哭就撩开衣襟转过身，几声吮吸会发出更大哭声。女人便无奈地俯下身，用嘴把莜面糊糊或嚼烂的土豆泥度给孩子。当我走出院落，弟弟追上来，半天才听明白他窘困的嗫嚅：男婴没有奶水发育不良，一岁多了还不能呀呀发声，我派一次饭付给三角钱、一斤二两粮票，如果两次就可以有现金和粮票去公社给孩子买一袋“八宝面”或“代藕粉”。实在无法拒绝他眼中攸闪的谦卑和对孩子的怜惜，我答应了。

第二天，尽力不被注意把多给的几角钱和粮票压在酸菜盆下逃出窒息的窑洞，面对夜色中天顶压来得连绵不尽的大山，恨不得呐喊，尽快摆脱这个梦魇。

这里，我了解了中国农村，中国的农民，给了我一生巨大的影响。

旗县、城镇、苏木浩特到处留下了足迹，我们轻装简行尽量不带背包，尽

管，这意味着住宿条件简陋时要忍受那些浓烈复杂的气味和悚然可疑的污渍。挎包里只装几件内衣、笔记本，牙膏换成不拍挤压的牙粉，住宿当枕头，长途乘车硬板木椅当坐垫，随时随地进行的座谈调查，席地而坐可以隔开底下冰冷坚硬。

这年，夏秋之交开始了对陈伯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到“政治骗子”的批判，提出二百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学哲学及马恩列斯原著《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等九本著作。很快，成为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要求。

每次出差，为了保证不同情境下学习需要，指导员都要带上所有书和参考资料，半尺厚的大部头，挎包像塞了沉重的砖坯。远路没轻担，走路热上来只穿一件单衣，挎包带勒进肉里，汗水浸沓肩头紫红杀疼。指导员和我一样两边肩不停调换，更不可言处，有了这些红色典籍再不能坐在屁股底下当垫物了。

我对那些哲学和经典很少真明白，指导员的虔诚和投入不是因为身份刻意做出来的，每次阅读他会把那些字句一段段地拽出来与我面对面讨论，对此我常肃然起敬。

朝鲜战场他落下严重关节炎，下乡睡火炕。黎明醒来，朦胧中经常见他长大的身子靠着背包凑近窗户，借着淡淡晨曦一手揉着膝盖，一手把书端在眼前。这个情景印在脑海里。

九月，去兴和县与李指导员谈工作，罕见暴雨冲毁了回集宁的公路。来电紧急通知回军管组，于是联系了驻军去山西的军车冒雨出发。山路上半旧的嘎斯如一艘风浪中的破船，帆布篷只遮住多半车厢，头顶不时闪过蒙蒙雨雾中黝黑长城，水流如瀑从雉堞倾泻而下挟裹泥沙碎石砸在篷顶。车厢底板冰冷湿滑，往常，把挎包用雨布包住可以坐在底下，现在两人只能护在胸前半蹲着身子，时而挤靠时而相撞如筛摇煤球。

近傍晚，车到“柴沟堡”，这里有通集宁、察右前旗的列车。湿透的裤腿淌着水，冷雨吸走了身上热气。站前有个叫“红卫”小饭馆，柜台后小黑板写着“烩饼每两0.4角（素）”。猛然意识到这里已是河北省，耽误几天身上没有了全国粮票，按流行规则没粮票可以出黑市高价，但军人是不公开允许的。

我示意指导员坐到远处角落，不动声色端来两大海碗热气缭绕的土豆烩饼，不知他意识到没有，看他埋着头再没有了往日严容肃貌，格外开心。

高高的路基上，黄色小站依着雨后黛色山峦像个精巧模型，越过空阔的河滩是日落前一望无际的大平原。站台靠窗有张破旧长条椅，体温烘干了周身潮湿，不觉困意袭来，枕着挎包蜷身歪倒——。惊醒，眼前闪过车轮撞击呼啸而去的尾车背影，指导员为了能让我舒展，只在长椅一端斜身侧靠着，张手揉着膝盖，专注在那本浅黄色封皮的“哥达纲领批判”。

夕阳悠长斜映山体，漫天铺满彩色云锦，河水泛着宁静的橙红，仿佛伸手可触碰的油画。

1973年4月，福建有李庆霖者为生活陷入困境的插队儿子上书，得批复“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由此生成中共中央《中发（1973）21号》文件载入知青史册。其实，关于知青的第一个文件最早发于1970年5月《中共中央转发关于国家计委军代表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报告》，是为中共中央《中发（1970）26号》文。所以由国家计委军代表行文报告，当时知青工作归口也已经被“军管”的国家计委负责。

这份文件列出了九个方面的问题并提出要求：

“对知青政治有人抓，生产有人教，生活有人管。”

“凡强奸下乡女青年的都要依法严惩，对女青年逼婚诱婚的要坚决进行批判斗争。”

“干部利用职权为非作歹的，要撤职查办。包庇怂恿违法犯罪分子的要给予严格纪律处分。”

“国家支援知识青年进行建房的材料不准挪用。”等等。

可见，“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第二年，引发的问题就已经比较严重，上层已经了解解决知青问题的迫切性。而此时，运动正如火如荼，最应该知道文件内容的知青群体却少有知晓。

得军队系统之便，文件很快下到“前指”。经研究，把落实文件精神，检查“知青”工作的任务交给了经常下乡的指导员。由此，跟随他走进这里的“知青”群体。

为了看到真实状况，我们尽可能多的走访边远闭塞知青点。巧合，这里插队“知青”多数来自指导员和我的家乡，尽管身份不同，有种“少小离家”“同是天涯沦落”的本能接近和理解。荒凉孤独环境下的年轻学生们，乍然听到熟

悉乡音时的惊讶雀跃，至今想起仍然为之心动。

江南的学生清新纤秀，不似北方人刚硬。和所有接受再教育的知青一样，“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的誓言写在标语上，“不但在口头上，而且要在行动上——一辈子与贫下中农结合”的决心写在日记里。不经意间却固执地守护着深入骨髓的习惯：这里靠天吃饭，水像粮食一样珍贵，老乡们困惑：知青们宁肯耽误挣工分每天专门留下一个人，走几里山路从几十米深井打来水，明矾净化后却用作洗手，洗脸，漱口，甚至洗脚，毫不心疼的用水一遍遍冲洗那些锅盆碗灶。更触目的是：门外晾晒的铁丝上，炫目的日头下从不间断飘荡着五颜六色湿漉漉的俏丽物件，与背后延绵不尽光秃裸露的黄色格格不入！——老乡们从没认真相信知青能在这方水土扎根，他们不属于这里。

有时指导员会用家乡话与他们交谈，阿拉依依，尽管我听不懂，他们温籍融合如在自家院落邻里街巷。每次告别，这些学生都要在队干部和村民目光注视下簇拥着送我们，不停地高声说着家乡话，仿佛失散后找上门的来自家乡长辈和朋友。常常，走出很远回头望去，山崩天际线几个孤零零小人儿站在那的情景成为无法磨去的记忆。

“沙坝疙梁”在乌兰察布最南缘，重峦叠嶂交通闭塞，古来是内地人“走西口”出关后回望家乡的地方。这有个“天津第×中学”知青点，他们1968年秋响应号召组成“毛泽东思想长征队”到此落户，是旗、盟两级先进典型。

来此，主要是为了解一件事：一位女知青怀孕了。不可思议的是据说朝夕相处一个屋檐下的同学毫无觉察，深夜，焦急的同学们寻到她是在村外场面草秸中，下身浸着鲜血……。惊惧恐慌的同学轮流背着她赶到公社卫生院，赤脚医生手足无措，天亮用拖拉机送到旗医院。失血过多已经休克，幸好现场有同学血型匹配，输血抢救后脱离了危险。

蹊跷的是昏死中醒来的女知青不说一句话，仿佛魂魄也随之流失了。医生说，婴儿已经×个月，孕妇腹部有多处陈旧淤青，如果不是外力，不可想象是自己造成的。无论对谁仍然只字不说，昏睡中惊醒经常垂泪。

于是，流言猜测像草原不息的风飘忽流动，人们都以听来的只言片语和想象拼凑演绎，甚至与阶级斗争有了联系。正是贯彻中央有关知青文件的敏感时期，于是指导员来这里。

羊群踩出的小路崎岖狭窄，迎面仅容两人侧身通过。一侧石壁狰狞，脚下河槽陡峭。我注意到沿途没有线杆，这是偏僻山区和草原的路标，沿着它可以找到村落，——这里没通电也没有广播。

早上从公社出发，到知青点太阳已经偏西。山坡上，知青这排房子俯视着沟壑对面如羊群过后遗留下的稀疏窑洞，那里不时传来悠悠狗吠。屋前，我主持座谈，知青们显然心不在焉沉闷沮丧。远处，指导员与叫去的每一位学生散步，夕照的逆光勾勒出一高一矮清晰剪影，这是在连队常见的情景。

太阳即将落山，视野中，那条通往山外的灰白小路细如游蛇，曲折蜿蜒渐渐被天地间弥合的暮色吞没。我无法遏制想向：漆黑深夜，面前的这些学生们在这条蹒跚小路上轮流背负着滴血不止的姐妹，怀着怎样惊恐和疑惧？那个女学生到底经历了什么？

落日收去最后一抹光线，东山坳露出橙黄月亮。摊在膝盖上的记录本渐渐模糊，我示意大家进屋点灯继续聊，几个人面面相觑，最后那个女组长说：“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不点灯，算计这几天是阴历月中……有月亮。前些天煤油没了，就一直没去公社买，……不知道你们来”。声音低沉，月光迷蒙在她眼中游移。

山风料峭，我陡然一沉。幽幽月光让围坐的知青们脸失去了线条色彩，变成朦胧的平面。眼前闪现出当年市委门前数万人“大辩论”，就是戴着鲜红袖章的她们争先跳上高台，青春炽热，挥动小白桦一样光洁耀眼的手臂呐喊：“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每个手势都掠起惊涛拍岸的欢呼，响彻城市上空……。

这一幕景成为我文革记忆中的圣洁画卷。今天，我努力搜寻找回那些熟悉的身影，却怎么也无法固定在她们身上。

当晚，借宿知青点。

指导员寡言，但长时间赶路我们每次都会碰撞到相同兴致的话题，途中不显沉闷。这天，我们一路沉默。

一年多时间走过数十处知青点，听到看到太多发生在他（她）们身上的事情，以我的视角见证了这些被过早抛到困苦贫穷环境下的年轻学生，知识荒废、生活艰难给了他们怎样影响，语言和行为了有了怎样差异，生存重压下在招工、招生、选调、改变命运的时刻有过怎样灵魂挣扎，不同情境下有过怎样不同的

表达和无奈选择！……。

1971年1月26日，农历除夕。

文革以来，视为封建糟粕的传统节日有意淡化或取消，但旧历除夕老百姓有根深蒂固的积淀。

地方干部放假，战备轮值的首长赶回部队，大院变得清冷。夜幕上来，远近零星爆竹声更增添了沉寂。办公室里和小张各守一部电话机，平日健谈的周参谋一直举着报纸，看不出表情。

与许多同学不同，当初去兵团我不能辞行，清晨离家那一幕始终如一枚硬物，此时比平日更深在胸口游弋。

指导员推门进来，往常一样站着对我说：

“小徐，我请示了陈主任，给你四天假，回家看看。”

生活中会有这种瞬间，有些事突如其来让你震动，无论悲喜终生难忘，此刻就是这种感觉。傍晚，街灯透迤亮起的时候，我迈进家门。

我突然从天而降出现在父母面前，能想象带给他们的惊喜与满足。尽管不是全家团聚，这个春节父母沉浸在两年来最为喜悦幸福中，有了久违的发自内心的笑，这种幸福没有任何感觉可以替代。

陈秉文：从主任到副政委

陈秉文主任是“整党”结束，从部队刚到兵团就被派出执行“支农”任务的。“前旗军管组”除了警卫、通讯、机要、炊事我们几个兵，几十名“四个兜”的军队干部来自各个部门，（包括经常轮换，来自一线部队指挥员。）工作相处中陈主任和指导员很快赢得大家尊重信任，关系融洽，毫无违和感。——这不仅仅来自军人间对资历和军功的尊崇。

陈主任性格随和，相处轻松，他不像指导员似乎生就的严肃特质。生活中指导员不吸烟、不喝酒，甚至不喝茶，（只喝白开水）。陈主任相反。

主任吸烟，还剩少半截烟蒂就从烟盒中弹出一支新的，往办公桌或拇指盖上一敦，烟丝紧实腾出空间，把还燃着的烟蒂接上去，有时几只香烟吸到底，只用一根火柴，剩一个烟蒂。

主任喝浓茶，那只跟随多年的瓷杯像挂浆的文物，不放茶叶，冲进热水也

出来淡茶。

他善饮，原籍黑龙江××，也是通信员出身，给我重复最多也是最得意的故事是当年随“四野”挥师入关时，一些干部贴身装金镞子，而他的首长马褡子里只有酒。

夜寒料峭。地炉子红红的火舌向上腾跃，半截烟囱烧成绛红，水壶滚开的水汽冲顶壶盖“扑扑”跳动。迟散的会议后，焙在炉子上的馒头焦黄酥脆，一碟酸菜一碗豆腐一盘辣椒土豆丝。随着绿色军用水壶塞子“嘭”地跳起，醇厚清冽在屋内每个角落弥漫翻滚！如此晶莹剔透，第一次却似吞下一团灼热炭火，慢慢地却有了说不出的暖意和无以言喻的美和妙，使一个个漫漫寒夜有了温暖有了记忆。

他原来所在的部队天津人很熟悉，“支左”中与保定那个坚定支持左派的“万岁军”观点相悖。造反派诅咒这个部队是“带枪的刘邓”，数十万人游行示威中高呼口号：“刘×不支左叫他玩蛋去！”尽管语言市井却凝练传神，极具海河特色。——刘×者，该部队军长也。聊这个话题我们观点、感觉极度契合。

他参加了天津解放战役：从西营门城防攻入……冰封的护城河流淌的鲜血使脚下打滑……从狗皮帽子判别是东北联军还是国民党军……炮火猛烈，堆积的尸体做掩护……。

他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演进：战争年代戎马倥偬，执行纪律常常是：“两相情愿，禁闭三天”；和平时期，他作为营教导员最紧张是部队转移前夕处理与驻地群众的善后，钢铁纪律与温暖人性纠集……。

军管组主要首长都有自己蹲的“点”，陈主任的“点”在黄旗海边的呼和乌素。蒙汉混聚，农牧相间，有湖泊，平原，丘陵，地域复杂。

1970年秋天开始了自上而下领导班子的调整，对各级干部文革以来的政治表现进行“路线分析”。即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基准红线，考察文革以来他们在落实伟大战略部署，执行各项光辉指示中的立场观点态度和站队。

这就不可避免触碰到之前一直没彻底解决的“挖肃”问题。

一九六七年初，以上海“一月风暴”为发端，夺取上海市委市政府权力成立“革命委员会”，引发全国性武斗夺权混乱局面。边陲内蒙开始了“极左”路线推行下分裂民族团结的“深挖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肃清乌兰夫流毒”的运动。

持续两年多的“挖肃”给内蒙古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文革肇始，以“革命群众专政”取代了“公检法”专政机关，声势浩大的“挖肃”运动将“群专”暴力推至登峰造极。“群专”名义下，被称作“牛棚”的所在遍及城市机关企事业学校街道、农牧区生产队。一批又一批被打成“内人党”的无辜干部群众在这里被囚禁关押受到迫害凌虐。

“群众专政”没有程序和规范。根据不同时期运动重点经常被冠以“学习班”名目和方式，如“斗批改学习班”“揭批查学习班”“清队学习班”“挖肃”“打反”“清查×种人”以及“×××专案”等。

被认为“内人党”的怀疑对象无论从家中从单位或者从批斗会现场带走，即失去自由，家人无从打听关押原因关押地点更没有关押时限。（公职人员首先停发工资）。

这年夏季，那个被称作文革旗手的首长就愈演愈烈的全国性武斗发表了著名的：“好人打好人误会，好人打坏人活该”的讲话，“挖肃”运动的暴力残酷更如燎原野火蔓延开来。（不得不说，“挖肃”初期刚到农牧区插队的个别“知青”挟红卫兵狂热被利用过）

作为蒙族干部，这个公社革委会主任云生远“挖肃”第一波就被关押囚禁，近两年时间受尽折磨。偶然，我见过他身上的疤痕，前胸被烫烙的皮肤粘连着胸毛，扭曲的疤痕像死蚯蚓令人头皮发麻。

老云讲，刚关押时面对凭空飞来的子虚乌有，一直咬紧牙关，不自辱，不诬陷。他说：以前，皮鞭棍棒老虎凳辣椒水这些逼供手段，都是电影上看到的。实际上，多年无情斗争滋孽出的打手们和幕后操控者早摒弃了那些原始费力手段：他们用钝器××××××腰肾，让你尿血而没有外伤，用××××××肝区，让你求死不得……。甚至为你造出逼真的自杀现场，冰冷眼神里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死了也背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叛徒罪名，永不得翻身。

这里高寒，当地人习惯贴胸带棉兜肚。深夜，那些打手们在炉火中煨一堆土豆，边审讯边享受着香喷喷熟土豆乐趣。饱食后，过来扎紧审查对象裤带，挑出最软烂的土豆捌开领口塞进肚兜里，……当胸几拳，滚烫的土豆泥拍烂在心窝，撕心裂肺……。有时塞进热土豆后四周站人，拿老云他们当沙袋练习拳击不许倒下。如此反复，胸部燎泡还淌着脓水又一轮审讯开始了。老云苦笑：

后来好一阵子听见烧土豆味，就想往厕所跑。

老云说：那段时间最盼的是尽快正式逮捕定罪进监狱，死在“群专”没有烈士也没有凶手。

这天，应该是一处饲养房。脚下踩着冻硬硌脚的牲畜粪便和杂草，那些人用缰绳把他双手吊起在拴牲口横梁，脚尖点地，取来马灯把煤油从头顶淋到下体毛发，然后举着燃烧的火柴逼问。闪着暗红灰烬火柴梗、铜烟锅按在张开的腋窝，空气中弥漫着皮肉的糊焦和浓烈的煤油味……。

老云终于屈服了。开始从他熟记于心的公社党委正副书记、党委委员、各大队生产队支部书记、队长、包括贫协主任、民兵连长无一遗漏写上了“内人党”名单。再审讯时，按照启发和揣摩，开始往上罗列：旗委书记、旗长、局长……后来有干部反映说，那些日子人人自危，每当关押云生远他们的“××专案组”传出濒死得野狼一样悲怆哀号时，不知谁又上了令人心悸的“内人党”名单。

1969年自治区实行军管后，纠正制止了“挖肃”的进一步扩大化，平反释放被错误关押的干部，对一些受牵连群众和家属进行了善后。¹

此次对干部进行“路线分析”考查评议，受云生远牵连而蒙受冤屈的干部群众自然一腔愤懑，注定影响了对云的政治品性的评判。

军管组在讨论对云的工作安排时，意见是调离原公社，任旗“生产指挥组”（原建委）副组长。坦克兵副营长转业的老云挺有性格，表示：“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不愿屈尊第三把手，于是降级安排到股级的“土产日杂公司”任经理。

九月秋寒。

这晚，盟“前指”来检查工作，值班室我和小张（建文）比平日更警醒倾听着动静。空阔的大院外隐隐传来低沉的嘶吼声，路灯下两个人正拖拽拉扯，一个挣扎往里冲一个拼命往后拦。快到军管组门前，其中一个见势不对跺脚溜了。我迎了过去，一团冲鼻子的酒酸臭扑来，云生远衣衫不整，袒露着那件终年不离身印着部队番号旧绒衣，撩开我胳膊，趑趄着跌进办公室。

酒精烧红的眼睛像含着晶亮的血滴，高喊：“我要找岳组长”“我要见大老

¹ 一九八零年十一月二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庭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起诉书称：“内蒙古自治区因‘内人党’冤案，有三十四万六千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

张”（大老张，负责干部工作的张教员）我边按他坐下，边说：“岳组长正开会，你先回招待所休息，我一定转达”。

终归有过几面之缘，尽管酒醉，他清楚我这个军管组里最小的大头兵斤两。仗义地指着我说：“你让开，今天没你的事”。

刚刚提拔为组织干事的小张一直负责办公室工作，严肃持重不苟言笑，还从来没见过进军管组谈工作的地方干部这种行状。站起身，面色冷峻斥责起来。不待说完，老云环眼圆睁蹿起的豹子一样向他一头撞去。早听说过蒙族人最实用的角力技术包括撞击，身材颀长的小张像捆稻草飞出2米开外，仰在行军床上翻了个滚，右手护住枪套，左手按在腹部五官扭曲再发不出声。

老云收不住，扭身撞翻了靠墙立着的拇指粗钢筋焊制的脸盆架，满满一盆水“哗”倾泻下来，毛巾洗衣粉肥皂盒四处蹦跳散落，那个大搪瓷盆邪性得骨碌碌滚出门外，跃过方形大地砖直往走廊尽头会议室奔去。顾不上水花飞溅，我往外追，眼睁睁看着它“咣当”一声狠狠顶到会议室大门，旋跳几圈才将息下来，蹦出一地碎瓷渣。

亮光从门缝闪出，探出岳组长鹰隼一样眼睛，狐疑的目光从头到脚上下打量一遭怔怔捧着破脸盆的我，重重撞上了大门。

回到办公室，老云像泄气的熊伏在办公桌上，受屈的大孩子一样放任呜咽。急忙叫门卫通知招待所来人把他架走。然后开窗散风，拖地清扫，收拾那一片狼藉。

送走首长已是午夜。例行碰头会后正庆幸一切平安。已经站起身的岳组长不经意问：“怎么回事，刚才这么吵吵？”小张一肚子隐痛气还没顺走，把事情经过演示个详细。

小张每句话都像有重量，把岳组长头往下压。“抬头婆姨低头汉”从我坐的那个距离角度最后只看到岳组长两只上翻的眼白，我知道老云触大霉头了！

果然，岳组长抬头刹那猛地一拳砸下，墨水瓶蹦起老高，平缓普通话转换成表达酣畅的家乡腔：“娘了个×！反了！反了！大闹军管组！”指点着负责“公检法”的赵副营长厉声说：“去！叫中队¹把个狗×的押起来，先好好给他醒醒酒再说！”

¹ 当时，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三合一实行军管，“中队”是对公安局看守所军人习惯称呼。

回到宿舍，我想不该这样结果。周围安静下来陈主任对我说：给赵副营长长打个电话，把老云安顿好，送两床被子。明天上午如果岳组长……。通知公社来人把老云接回去，……注意影响，先送到招待所，别直接去中队领人……。

全国性“一打三反”运动高潮中，盟里组织过几场各旗县参加的数千人规模的“宽严会”，期间跟随去过那里提人。拘留所依山体改建，四面青森森巨石压下来，只在前面是手臂粗的铁栅杆，像个关动物笼子。夏天滴水冬天结霜，如果沉醉不醒石板地睡一夜，注定会做下病根。

办公室久了，心照不宣在瞬间对视的理解。电话打过去，果然，赵副营长没多问一句，四个字：“好的，明白”。

此后一切都是按预想，无人再提及这件事，当然，老云永远不会知道后来发生过什么。

三十年后，已经主政一个闻名遐迩旅游城市的张建文，我们聊到陈主任，建文说：“那老汉是个好人！”

寒潮越过大青山，横扫“前、后套”，严冬来临了。

冬闲的农村，除了要组织农民“学大寨”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历来是运动高潮期，补上农忙劳作季节欠的运动账，每次运动重点不同。这次重点是“严厉打击瞒产私分”

建国以来粮食和主要经济作物实行严格统购统销，农民年终收获分为三部分：国家公粮、集体储备、社员口粮。宣传口号是：“保证国家的，留够集体的，最后自己的”。自来种地，交租纳粮，是农家的传统。但是当他们辛苦劳作一年，饥饿的阴影仍旧挥之不去时，他们会本能地为自己和家人多留一些赖以生存的口粮。

一九五九年，国家进入经济困难时期，连续三年的大饥荒。当年内蒙曾征调大批粮食牲畜支援内地；敞开胸怀接纳过一批又一批从内地侥幸外流逃荒人员；甚至从中国最富饶的“江、浙、上海”地区收养数千名为了活命被父母遗弃街头和收容院无力抚养的孩童，草原上的额吉哺育了他（她）们。

饥荒看不到尽头，天高地阔水草丰沃的内蒙古也出现了罕见的背井离乡。据传，当自治区主席在农村基层视察时，面对牧守一方官员们焦灼忧心，指着场面上的一垛垛一圈圈秸秆糠麸大手一挥说：“粮食就在那里嘛！”茅塞顿开，

一句话点醒各位官员，于是这种方式的“瞒产私分”推广起来。经历四清、文革，几乎没有农村干部再以做假账方式搞“瞒产私分”，原始方法是收割庄稼的时候粗收遗落，刨土豆时粗刨粗收，随后再由妇女儿童仔细梳拣一遍。队干部甚至会把这种地块作为对一些特殊户的奖励。庄稼上场，碾压脱粒扬场入库，秸秆里常有残秕瘪粒，这些可再精筛细拣的秸秆会作为柴草饲料分给各户，由于是按工分分配体现了多劳多得，村民认为公平，利益均沾心照不宣。文革开始，这成为自治区主席被打倒罪名之一。

以打击“瞒产私分”为这次运动重点的思路，每个干部都具备了心领神会。

豪迈的誓师大会后工作组开进各个村落，地方干部带队，队员里最活跃得是那些来自“五七干校”“××理论学习班”待分配干部。任何运动最为牵动干部神经的是后期“组织处理”，他们明白“反瞒产私分”这班车对每个人政治前途的影响。

“××苏木”是黄旗海畔有三个生产大队人口的公社所在地。工作队队长是旗卫生局医政科杨科长，50岁年纪，知识分子形象。档案显示，天津解放曾作为副团级军代表挎着驳壳枪接收敌伪“××纺纱厂”，人生风光达到巅峰。不久，没能抵住这个几乎清一色女性工作环境的糖衣炮弹，仕途如过山车一路下滑，先是下放自治区卫生厅，再后下放到旗卫生局。

经过两天扎根暗访，有着多年基层下放经历的杨队长，声称已经掌握了重要证据和突破口，准备召开现场会，形成震撼再全面开花。典型引路以点带面是传统工作方法，他的提议获得一致通过。

（来前，陈主任对我的要求只负责宣讲文件，只记录，不表态不解释。）

第二天上午，薄云浅淡，阳光散漫不清，当看到场面上集中了包括老弱妇孺几乎所有村民时，感觉哪里不对劲却也说不清原因。十几个队干部单独站在一簇，寒风中小心踩着脚。公社武装部长带着几个民兵聚拢人群，无论怎么吆喝，那些青壮年社员袖着手陪着讪笑依旧缩在老人妇女背后。

没有开场白，杨队长持一把特大号木掀上场了，几百双眼睛注视下先走到那座十多米长房子一样高的莜麦秸垛，紧贴地皮兜底铲起一锹，侧顶风头向着煞白的空中抛去。麦秸糠麸被风撕扯飘走，社员们顿时明白了，一阵骚动后留下死一般沉寂。仿佛风雨来临前扬起的沙粒打在窗纸，肉眼看不清楚的颗粒蹦

跳在社员脚下，队干部们脸色慢慢变得苍白如天上的浮云停留下来。

颗粒弹跳像击打牛皮鼓越发激励起杨队长狂放，失控的双臂机械一样撩起一锹又一锹，旋风挟裹秸秆尘土形成一条游走的长蛇。许久，他收起架势。涨红的脸上抬头纹灿烂绽开，那是洞穿对方把戏的睥睨和得意，目光投出鞭子一样扫到每个干部社员。

寒风掠过黄旗海掀起浪花如漫天白雪。一声明亮的啼哭带着惊惧划破冬日的空气。前排一个双颊冻得通红小女孩，扭过脸拼命想挤进身后人墙。旁边苍白发老妇俯身搂住……：“可不敢！可不敢！”尽管裹着厚厚的兵团棉大衣，瞬间被拖进冰窖，感到刺骨的寒气，恍惚间闪过一帧帧熟悉的电影画面。

铺天盖地云散了，太阳清晰明亮晃着耀眼的金光。祖祖辈辈依赖土地生存的农民们，失去了往年大自然赐予得严寒时节“猫冬”期蓄养生息和温暖，在各级工作队的督导下开始了“秋收”后的又一场紧张“冬收”。

随着“一二一九”一周年的到来，打击“瞒产私分”开始了最后冲刺。连续不断的电话会，现场会，表彰会，经验交流会，像连续扣击发令枪，每个队员都驱上了赛道，每日都有突破新数字的工作队在领跑。我们感到很大压力。

几日后，陈主任来公社，照例地检查汇报总结动员。当晚我向他讲了几天来看到听到的真实想法。他谈了以下几点：

1. 各地情况不同，个别生产队翻出粮食（目前还没有数量比较大的），不能依此类推进行攀比。

2. 换个角度想问题，实行军管一年了，如果经历一年军管体制农村还存在比军管前还严重的瞒产私分，实际否定了军管的工作和意义。

3. 各级领导班子正进行“补台”，要特别注意一些人急于表现自己，“形左实右”违反政策侵害贫下中农利益。今后群众会把“账”算在“军管”头上，“军管”要给他们擦屁股。

他的这些看法与大会上那些激昂亢奋截然不同，却扫去心里多日阴霾。

1971年元旦，随着悄然而至一场大雪，打击“瞒产私分”战役终于收兵了。

1975年兵团转制。



李指导员上海××县人转业回了原籍。江南富饶又得改革开放之先，风起潮涌身份发生很大变化。每次通话，我仍然称“指导员”，他一如以往，板板正正南方普通话喊我“小徐”，尽管我已过不惑之年。

陈副政委回到天津，市公安局×分局预审处工作。我仍称他副政委，他还是那个儿化轻音字“徐儿！”

这个世纪初，他们先后辞世。

这是一代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曾经的一代特殊材料的人。他们寄托革命，是信仰忠诚的革命者，但恪守人性良知清白刚正不为世事所易。他们金子般的情怀对自己影响至深至极。

这代人已经渐行渐远。📷

2018·5·16

【人物】

连长杨如玉

——兵团战友素描

龚玉

内蒙兵团实行准军事化管理，从兵团至连队干部，全部由现役军人主政，这是与其他兵团非常不同的一点。现役军人与知青，当年曾是一对矛盾：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但几十年后，我们都共同认定：我们是兵团战友！写杨连长，是因为他故事的典型性和他所代表的思想的复杂性。每当大伙儿忆念起他，在对他敬佩之余，也另有一番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在心头……

——题记

1

杨如玉是我曾经待过的15团5连的某一任连长。5连的现役军人干部曾经换过几茬，杨连长到底是哪一任的？我已记忆模糊了，但他第一次在全连战士面前亮相的那一幕，却历历如在眼前。



好像还是在劳改犯留下的旧食堂兼礼堂里，某位连领导将他介绍给大伙儿后，杨连长就站起来给大家行了个军礼。他个儿高、瘦削，军装穿得规规矩矩、端端正正，连风纪扣也一丝不苟，一直紧扣到下巴颏儿，以一个标准军人的形象，直立在大伙儿面前。我是在部队大院长大的，父母亲都是现役军人，父亲直到70多岁后（他72岁逝世），仍然腰杆儿笔挺，有股军人气概。我是看惯了军人的精气神儿的。杨连长着装严谨，军礼也敬得标准而又严肃，但我不知为什么，却觉得那军装穿在他身上显得有点儿邋遢。不是脏那种邋遢，而是不合身那种。衣服显得有点儿松松垮垮，衬不出精干来。

第二件对连长印象深刻的事，是在第二年开春的时候。那天，连里安排我们女排锄地，并破天荒地让大伙儿坐拖拉机去。据说，是因为地号离连队有点远，要节约走路的时间。连队所有地号我们都去干过活，无论地有多远，活儿有多累，我们从未有过因为路远坐着拖拉机去干活的待遇。这是我在兵团7年生活中，绝无仅有的一次。

那天天气多云，早春的太阳薄薄的，刮着小风，一阵阵内蒙高原特有的黄色沙尘浮荡在空气中。因为不用扛着锄头、排着队列、唱着歌儿地去出工，我和所有人一样，有点学生时代，学校组织大家去春游的感觉，心里充满了欢悦。车斗的帮子很浅，上去的人只能坐着。大家拖着锄头，大呼小叫、欢声笑语、七手八脚地踩着车轱辘，或从后车帮子往上爬，人人都兴奋异常。

突然，杨连长一脚踩在驾驶楼子的踏板上，背朝后，面对着我们，大声吼道：大家注意了，大家注意了，注意阶级敌人的捣乱破坏！注意阶级敌人的捣乱破坏！……他个儿高，又站在踏板上，脸露出在车帮上方，声音传得远。他连吼几声“注意阶级敌人捣乱破坏”的警告声，一下就盖住了所有人的嘻嘻哈哈，空气凝固了，所有人都噤了声。我那时还没上车，站在车子右边，一下也愣住了：这么美好的初春时节，这么令人愉悦的劳动出发场景，怎么就会想到阶级斗争？怎么就会与阶级敌人的捣乱破坏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什么思维逻辑啊！更何况，这是一帮混了几年，天天吃喝拉撒睡都在一起的兵团战友，怎么就会想到，在这帮年轻女孩子们中间，会有阶级敌人呢！那时我已有了一点独立思

考的能力，虽没有反驳什么，心里却很不以为然，觉得这举动太不可思议了。

再一件事情，也是在野外劳动时发生的，距离连队的距离也很远。

挖大渠属于重体力劳动之一，因为靠黄河水灌溉，所以每年都会有几次挖渠清淤的硬仗，冬天尤甚。在我的记忆中，这次不在冬天而是在春末或者初秋，天气还暖和的时候，所以它不属于挖大渠，而仅是一次一般性劳动：修整一条旧“毛渠”。出动的劳动力，只有我们一个女生排；干活也不用扁担挑土，而是大家分立在渠两边，只使铁锹挖，挖出的新土，就用铁锹扬甩到渠背上加高加厚。但因为地段遥远，到达时，许多女生已感到了疲累。而随着太阳的移动，渠背越加越高，取土距离越来越远，活儿也越干越吃力。

临近中午，杨连长过来检查质量时，许多女生已经饿得扬不动土了，都是挖一锹土，再用铁锹端到渠背上去。我们班有个矮个子的小女生就问他：“连长，行了吗？”大家都是眼巴巴地仰脸望着他，希望他能给个肯定的答复，这样，大家就可以收工回连队吃午饭了。没想到，连长毫不含糊地一指自己那条大长腿的膝关节，说：“不行，要到这儿才行。”

内蒙高原一马平川，他身材瘦高，蓝天艳阳下，立在新堆积的渠背上，我们站在已挖出土方的洼地下方，望他真是“千里平地，一杆突起”。女生们一听还要将土培到他的膝盖骨才算完工，“妈啊！”一声，许多人立刻跌坐在地上，站不起来了。

我当时的感觉是，这位连长，一定情感粗糙，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情商”太低。你想啊，一帮大城市来的小女生，已经很不容易了，又干了大半天活，早已力乏气短，你就真是想把渠修得好上加好，也可以将话说得委婉一些，至少先表扬几句，说点鼓励的话，再提要求不迟，让别人出了力，起码心里也温暖舒适一些。就这么干巴巴的一句，多么生硬和缺乏人情味啊。

后来，我就开始听到一些有关杨连长的传闻了，说的人大多是用一种既敬佩又带点嘲弄的口吻。比如：秋末，运来了过冬的煤火，这当然是先尽家属院儿的干部们了。勤杂班的小伙子们立刻先拣最大最好的煤块送到连队最高领导层的家中，其他捞不上这种待遇的家属们则自力更生，争着抢着到刚卸下的煤堆上去扒煤。等她们挑拣够了，剩下的就归大堆，是知青们冬天取暖的煤火了。

但是杨连长不这么干，他回家一看这些上好的煤块，二话不说，立刻用小推

车推回到大堆上，再推回一车碎煤碴儿倒在自家院里（最极端的说法，是连长还成心筛了一车煤末面子推回家）。质量好的煤块自然好用，但知青人多量大，当时实行的又是类似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大锅饭供给制，大伙儿都是按班排居住和用煤，十个人一屋，几车好煤平摊不到谁头上，所以一般没人去计较这些。杨连长的洁身自好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非常叫人钦佩，但即使在文革这种“政治高于一切”的“极左”时期，也仍然叫生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们，感到有点“过”了。而最苦的，就是杨连长夫人了。据说，杨连长是从北京参的军，他爱人却是农村户口，身后还跟着三个孩子（孩子分别取名：忠党、忠民、忠华）。杨连长一心扑在工作上，是从不操心家务的，一车碎煤末子叫老伴怎生过日子啊！于是她对连长十二分的不满。（我回城后听到的一个更夸张，又更令人哭笑不得、心痛不已的版本是：面对难以煮饭和过冬的煤末子，面对老伴的流泪和不满，克己奉公、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杨连长，却大声念起了毛主席语录：我们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又如：我连毛祖林是羊号班的，他说，当时连里在4支渠北边挖了一个水塘，准备养鱼。有一次，他亲眼所见：杨连长穿着整齐的军装，但当看到斗渠里有小鱼时，就摘下军帽，用帽子拨水，舀起渠中小鱼，然后又捧着滴水军帽，将小鱼送到水塘里去放养。现役军人不懂生产而又违背自然规律的瞎指挥，例子俯拾即是，比如这养鱼塘的水（内蒙盐碱地啊），是否真能养住小鱼？杨连长以及他们，真是一心为公，心中所系，都是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又可气而又可笑。

再一则传说，是讲杨连长在休探亲假时没有回家去探亲，而是到当时“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山西省昔阳县的大寨大队去自费参观学习。山西省的大寨大队，当年如日中天，是个了不得的地方，他们的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一介农民，在毛泽东提携下，平步青云，直线飞升到国务院副总理之高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生前也立下遗嘱，要求死后葬在那儿（据说人们后来满足了他的心愿）。当然，大寨人也不容易，他们的成绩，确实是靠“苦干实干”干出来的。当时从全国各地到大寨去参观学习的人马，就像现如今各级各层干部到全国各风景名胜区、甚至到国外去考察学习一般，川流不息。为了帮大寨人更好更快地实现他们“移土造田”的宏愿，

每个去参观学习的人，还都自携一包泥土，去填埋黄土高原之沟壑，以人工造出更多更阔的“大寨田”来。当然，去的人都是公家出钱，是公费参观学习，占用的也是工作时间，如同现在的公费旅游一般。像杨连长这样，用探亲假而又自费之人，大概也是绝无仅有了。

我现在回想，那恐怕不是探亲假，因为连长家属后来随调至兵团，应该没有探亲假了。当时已盛传兵团要交给地方，现役军人因全部要重新安排工作，许多人都回老家去联系新的接收单位。杨连长的探亲假，估计也是回北京参军前的原工作单位去联系后路。但是连长却拿这宝贵的机会去了山西大寨，而且路费没有报销，全部自理。这不能不让我们所有闻听此事的人，都唏嘘感叹不已！

1976年3月，我在兵团待了七年后，由家里帮助办成了“困退”，可以重返北京了。那时候兵团，甚至全国，大规模的知青返城潮还没开始，但内蒙兵团由北京军区交由地方管理的转制已经开始。我是在众人羡慕的眼光中离别的。从我们团回北京，要先坐汽车到五原县，再坐慢车到呼和浩特换快车才行。而从团部到五原县，每天只有一趟往返的公共汽车。

正是初春时节，清晨寒冷的候车点冷冷清清。前一年冬季的“清淤大会战”规模浩大，艰苦异常，时间也长，大批知青因此推迟了回家过春节，还没有返回来。此时，我在团部学校当老师，回城手续早在放寒假前就已办好，行李也早托运回去了，之所以迟迟没动身，是因为我的入党申请还有最后一道程序要走：团党委会的批准。团政治处的李林豪李干事，因曾负责过团篮球队，认识我，好心给我出主意说：政治生命是一个人一生的大事，你还是再等等吧，否则错过了，以后就不好说了。于是我在团里又待了近半个月，借住在团宣传干事的雷霆处，每天吃冻了的熬白菜，过春节时打牙祭的羊肉已经有股哈喇味儿。

但临近转制时的兵团，工作千头万绪，每一次团党委会召开，都有无数的大事小情要商讨和决策。我等了又等，有关这一批人的入党通过之事则是推了又推。在这个大变动之时，知青政策会有什么变化，谁也不知道，而每迟疑一步回城，都有说不清的风险存在（北京的落户手续需要我自己回京后亲自去办）。终于，连身为共产党员、离休干部的母亲也等不起了，催我快点回家，说这是第一要务！于是，我终于决定先回北京再说。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因为我入党的最后一道手续，直到我回京3个月以后，也就是支部大会

通过我的入党申请近6个月之后，才最后获得团党委会的批准。（文革时的新党章规定：新党员没有预备期；而支部大会通过期满半年后，党委仍没有批准的，支部大会通过的决议无效。）

那天，坐在冷清破旧的公共汽车里，我心情复杂：要说我舍不得离开兵团，那绝不可能！能回家能回自己原来生活的城市，是每个知青的梦想！尽管我当年思想偏激，是自己要求来的兵团（我原来的工作分配是留在北京），那我也不例外！但要说一点都不留恋这块曾经度过7年青春岁月、抛洒过无数汗水眼泪甚至鲜血的地方，那也不客观。尤其还有我那么多的知青朋友，现仍留守在这块土地上，临别时，她们羡慕而又泪水汪汪的双眼，一直漂浮在我脑海。（我临回京前，回了一趟我的老连队5连。连里大部分没有希望回城的知青，都已回家过春节去了。剩下的，都是已办完了回城手续，正在等候手续到达兵团的。那时的连队，早已不是当初面貌，即使如我们5连，曾经是全北京军区的学毛著四好连队，也已人心涣散。许多知青担心回城后找不着对象，都已互相建立了恋爱关系。食堂也不吃大锅饭了，一对儿一对儿的，自己打回来吃小灶。还有的知青，拆了班里的大通铺，自己搭起了简易单人床。我见到了方方。方方大名孙际芳，小我4岁，是人大附中老初一的，我曾当过她的班长。因我俩脸型眼眉有点相像，有人称我们为姐儿俩。方方见到我，满脸泪水，呜咽着说：你走了，剩下我们怎么办……她那句“怎么办？”也一直留存我心中几十年。）

我当时仍然思想激进，不知道这么离开，算不算是个在艰苦生活中临阵脱逃的胆小鬼，从前读过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勇敢》等前苏联小说中的青年英雄形象，仍然在我思想中起着作用……

我就这么坐在汽车里离开了兵团。车子开动后，为掉头绕了一个大弯，我忽然看到，在一片冬天寒冷的雾气中，有一个正挥锹铺路的身影。那身影一晃就甩到后面去了，我却想起了另一个与杨连长有关的传说。那时候，基层连队的大部分工作已由原农场干部接手，现役军人都集中在团部无所事事，人心惶惶，等待着对他们今后的安排。只有杨连长利用在兵团的最后时光，仍在做着他一贯的“好人好事”。15团那时全是土路，晴天暴土飞扬，路面上压出深深的车辙印，雨天则一片泥泞，常常走着走着，脚拔出来了，鞋却被吸附在烂泥巴里。杨连长这时做的事，就是义务垫土修路。

我没有想到，在兵团最后看到的会是这样一个身影。我赶紧掉过头去再看，那影子一晃后，却已经辨认不清了。那个身影一直在我心里留存到40年后的今天，虽然我当时没有看清那到底是不是杨连长，但我却确信，那一定就是他！

2

后来，大家都回了城。杨连长也回了城，他是从北京第一机床厂参军的，他就也回了北京。

回城后，因为一切都要重新来过，新生活和工作的压力，使知青们无暇顾及及其他，大家都各过各的，能经常联系的，是关系比较近的好友。杨连长不属于知青，我一般也不爱往领导跟前凑，就与他没有什么联系。但是杨连长必定要出现在我，以及我们连这些知青的生活中。

进入中年后，也许是因为忆旧，也许是生活比过去富裕安定，也有了空闲时间，与过去同学、同事、朋友的聚会越来越多。我发现，但凡是一个集体性活动，必定由于这团体中至少有一位热心人，出面在组织和串联这种大型的集体活动。我们连，以及凡是杨连长待过的连队，都有过这种大型聚会。我后来很久才得知，我们连三次全连性几百人的大聚会，都是杨连长倡导的，但他却并不抛头露面，只是做着各种琐碎而辛苦的幕后工作。

但早期，我却并不知道这一切，我只是得到了一个通知：某月某日某时，在某地点集合聚会。我就去了，然后聊天、照相、吃饭、互问分别后这些年工作生活的状况……热热闹闹折腾一番，留下通信地址，就散了；然后就会有照片或者“联络图”寄过来或者是送过来。

后来我知道了，杨连长是这些聚会的幕后发起人；但同时，我又听到了与他有关的带有一些嘲笑意味的传说。比如，辛辛苦苦好不容易组织起来的聚会，没过一会儿，大家还正在兴头上，他却说：好了，咱们散吧。搞得大伙儿既扫兴又莫名其妙。不知道他就是幕后英雄的人，还对他多有烦言。

我跟杨连长回城后有些接触，是在第一次聚会后，那是上世纪80年代中，在紫竹院公园。再后来某一天，他就登门拜访了。这使我知道了他家离我家其实很近，也就两三站的距离。

他果然如许多人传说的那样，有点怪癖：他不肯进门，更谈不上坐会儿喝口

水聊会儿天了，尽管你热情邀请。他就是站在门外，把想说的话三两句说完，然后就告辞。是不想打扰别人的生活吗？那天他拿了本小册子，还有一些宣传材料，是关于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还有一些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等问题探讨的理论性文章。他要把这些东西送给我们看看。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送这些东西给我，是因为我先生是中国共产党党报的记者吗？

第二次聚会大约在 1993 或 1994 年的秋天，十一前后。因为 5 连战友赵国栋已担任北京口腔医院副院长，我们就在一个周末，借用了口腔医院的礼堂开会、食堂聚餐、招待所供外地战友住宿。我们还在礼堂前厅搞了图片展览，上面张贴有当年以及现在的一些文稿、相片等。开会时，有专门的司仪（当年连宣传队徐凌江和孙连生担任），有配乐诗朗诵，有自由发言，也有即兴表演；隔天，又由在京战友陪同外地战友游览北京城等，好不热闹。当日会后，又有人拿着摄像机，为每一位与会者单独拍摄半分钟，你可以利用这时间说些你自己想说的话，无论内容是什么（我是带着五六岁的儿子一起拍摄的，以留下纪念）……总之，人人都很高兴，也非常尽兴。

第二次聚会后，杨连长又一次来到我家，这次他是来送聚会录像带的。有人把这次聚会制作了一盘录相带，里面除记录这次聚会的盛况、每位到会战友半分钟演说外，还揉进了一些人在重回兵团时拍摄的兵团现状，并配上了解说词和背景音乐。

这次，杨连长进了我家门，但他仍十分抱歉地解释说，他是因家里没有录像机，看不了录像带，才求助于我们的。我们当然是热烈欢迎。看完录像带后，我们又聊了会儿天。杨连长仍坚定地信仰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他告诉我们说，河南也有一个类似于江西的“共大”；每次有这种毛泽东思想理论研讨会召开，他都自费去参加。他还说，等他退休后，他想去这种“共产主义村”义务劳动。

2003 年，我们新搬了家要装修，考察的装修队请我们去看他们正在装修的一家样板间作为参考。这家离我们家很近，在报社西边马路对过的一片居民小区里。我们到时，正巧主人也在，就聊了会儿天。原来他也是北京第一机床厂的，就问了些杨连长的情况。他就说了些杨连长惯有的好人好事，就是那种在兵团时就让大家感受到的、既让人佩服又让人说不出是种什么滋味的好人好事。比如，在传达室窗外挂起块小黑板，每天义务抄写毛主席语录，或是当天的天

气预报。又或者，组织厂里的业余学习毛泽东思想理论小组等。这种好人好事，在文革时代如果还有人在做，并显得不太突兀的话，那在如今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就真正是九牛一毛、凤毛麟角了。当我们得知这片小区有很多那个厂子的职工时，就问杨连长是否也住在这儿？没想到，这人竟说出一番让我们更加吃惊的话来：杨连长不但已退休，而且还离了婚；又与一位和他有同样信念的女同志结婚，后两人一同到河南的一个什么共产主义村定居了。

我倒吸一口凉气，没想到杨连长真会迈出这一步！新中国成立近60年了，每当一种思潮来临时，都会有大批跟风者，而当风头过去，又会有大批人在说自己是如何上当受骗。这种人，过去叫“墙头草”“两面派”“投机分子”，现在反而成为一种时尚，因为其脑子灵，变得快，跟得紧，能不断地“进步”！

3

时间如流水……

2008年秋，忽然听说杨连长得了癌症。看望他的知青很多，各连都有。我也去了。他躺在病床上，枯瘦，已基本不能说话。大家都唏嘘不已，因为他的为人正直，因为他的病重，因为他的离婚再婚，两任夫人还在为他而矛盾重重。

2009年2月，杨连长去世（1942-2009），享年67岁。

2月27日，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参加的人很多，大多为当年内蒙兵团15团的知青，我也去了。会前，听说两任夫人还在争执，为了谁能参加与不能参加，谁有资格站在遗体左边、拥有逝者亲属的身份（前老伴虽说对他有怨恨，却仍是中国传统女性的贤妻良母，认准了，虽已被迫离婚，但他仍是他们家当家的，是她的夫君，是孩子们的父亲）……据说，不少知青都参与其中，劝说调解协商……最后，当然是第一任夫人站在那里，二夫人都没能参加追悼会……试想，当年与知青们可以称之为“同一战壕战友”的，当然是杨连长和他的第一任夫人以及他们的孩子们哪！

但让我震惊的，却是追悼会上杨连长的生平简介，那不是单位从档案中摘录出来，再加以溢美之词、堆砌而成的格式化文件。它的主要部分是杨连长写于2008年9月9日的最后一次向党的思想汇报。另一张纸，则是“河南省临颖县南街村村民委员会”听闻杨连长病重后，写于2009年2月4日的一封慰问信。

现在，还有谁会写思想汇报啊？！我们单位连组织生活都有人根本从不参加，包括一些领导们。我飞快地扫了一遍，标题是：《为学习、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建设南街共产主义小社区舍妻别子、舍生取义》，副标题是：《纪念毛泽东主席 116 周年诞辰，杨如玉写于入党 40 周年后的 2008 年 9 月 9 日》。我心情复杂，将其慎重收起，留存至今。（详见本文附录）

连长的思想汇报有 3 张纸，共 6 页，正反面书写。天地侧边，只留有很窄的空白。顶天立地，密密麻麻的小字，一笔一画，端正、工整、清晰。他历数了他的工作、成长、骄傲与自豪，也写了他的困惑与坚持……9000 字的文字，铺满在整张纸上；充溢在字里行间、丰盈得几乎要溢出纸面的真实思想，令人感慨不已。这都是那个时代，一个普通的现役军人，所能到达的最高峰了！

然而，这又犹如一把双刃剑，刺得你心痛，忍不住要反思，要痛定思痛！因为，这些当年最时髦的、充塞了我们头脑的政治宣传，与当今这个时代又有何干？人们早已忘记了这一切！后人看到这几页纸，根本不可能理解，大多只会认为，这是个神经有点毛病的人发出的与时代不相称的一些臆语而已！

我有时也会有些臆想：为什么板板正正的军装，规规矩矩穿在杨连长高大的身材上，会显得不合身？会显得有些太大晃荡和邋遢？就如那些兴盛一时的政治运动和环境，如那些空洞无物的政治说教和标语口号，如那些“高大上”的政治术语排比句一样？它们好似正确、流行一时，却不接地气儿，与老百姓无关，只是一个空旷晃荡不合身的空壳子！雷锋如果活到现在，又会怎样？📷

2019年1月12日

【附录】

杨如玉的思想汇报

为学习、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
建设南街共产主义小社区舍妻别子、舍生取义
——纪念毛泽东主席 116 周年诞辰

2008 年 6 月 30 日，是我加入中国共产党 40 周年纪念日。12 月 26 日，是毛泽东主席诞辰 110 周年纪念日。在党的亲切教导和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

哺育下，我由农民的儿子成长为首都工人阶级的一员；在解放军这所大学校园里锤炼了近15年。2002年5月，我领取了老年人优待证，同时退休。今年9月8日，深切怀念毛主席的沉重心情使我彻夜未眠，思前想后，深感有必要向党组织作综合汇报。并以此作为向我的老首长、老师、师傅、长辈；向亲人、战友的综合倾诉；向家人、晚辈的综合交待。水平有限，未综合好，敬请指正。

一、党是阳光我是花，毛泽东思想是秧我是瓜；花儿向阳开，瓜儿靠秧长，幸福地成长在祖国大地上。

1. 曾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首都的作战警卫参谋。1966年7月，纯属组织调动，从驻秦皇岛市的陆军第197师步兵第591团特务连调往北京卫戍区司令部任作战警卫参谋。多次执行光荣而艰巨的警卫任务；多次在几米、数十米内看到毛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首长；跟随叶剑英副主席前往卫戍区部队视察。参与制定了多次重大活动的警卫任务部署；多次参与外国驻华大使馆举行的盛大宴会的警卫任务。

2. 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接见。1968年9月，在人民大会堂前7区第2排（前排为8341部队警卫）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首长的亲切接见，相距仅约5米。此次还担负着全7区的警卫任务。

3. 参与毛主席、周总理8次接见红卫兵的警卫任务。1966年秋，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首长在天安门广场8次接见红卫兵。参与了每次接见的警卫部署和警卫工作。每次都能在近距离看到毛主席、周总理。

4. 从新华门进入中南海。1967年3月，乘坐卫戍区首长的车从新华门进入中南海，前往中央警卫局、8341部队协同执行警卫任务。从古至今，能进入中南海的人非常少；能从新华门进入中南海的人就更少。

5. 被批准为中国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会员。1989年10月，由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毛泽东思想研究室主任韩荣璋教授亲自介绍，并破格批准为研究会会员。多次聆听韩副会长的谆谆教诲。

6. 连续10次出席全国毛泽东思想学术理论研究会。从1990年10月至2000年12月，连续10次在长沙、天津、西安、韶山、重庆北碚、延安、贵州安顺、呼和浩特、厦门、四川德阳出席会议。在长沙，与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部长陈登才、校毛泽东思想研究室主任金春明二位副会长同室住宿，使我深受关爱。

国防科技大学政教室田 禾（原文如此，空一字）副会长多次邀我出席座谈会。多次聆听中央党校副校长苏（原文如此，空一字）星会长和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会长与四位副会长具有很高学术理论水平的报告；多次聆听了来自全国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教授、研究员、专家、学者高水平的学术理论报告。结识了数百位来自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全国近百所高等院校，省、市委党校、社科院等单位的老师，拜读了他们研究毛泽东思想高水平的论文，使我深受教育和启迪。每次出席会议都是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我还多次是国有大型企业或工业系统的唯一代表出席会议。

7. 被批准为南街村荣誉村民。1997年3月，被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批准为荣誉村民。向南街捐赠了200多本政治书籍，其中有未公开发行的2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26册。《毛泽东军事文集》6册，《毛泽东文系》14本等，还有一本珍贵的建国前出版的《毛泽东自传》。杂志500多本，其中有从创刊到停刊的一整套《红旗》，1948、1949年和1966至1970年的《〈人民日报〉索引》，比较齐全的《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还有一些比较珍贵的书籍、杂志、资料。为南街人民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尽心尽力，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增砖添瓦。

8. 向韶山纪念馆捐赠3件文物。在纪念毛主席诞辰100周年前夕，到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捐赠了1967年外国元首赠送给毛主席，毛主席又转赠给我厂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一个芒果；从1983年又由我自行精心收藏，在精美的玻璃盒内浸泡着药液，仍完好如初。还捐赠了1967年我厂工人精心制作的30多斤的毛主席全身铜像和约5斤的机加工铝制头像。纪念馆执意要奖励我500元，我婉言谢绝，只收下了韶山人民的心愿。

9. 从农村到北京。1942年5月13日，我出生在山东省嘉祥县梁宝寺镇钱集村的一个贫农家庭里。1957年9月考入县城关民办初中，父亲杨建善时任城关供销合作社副主任。1958年4月，父亲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主动申请辞职还乡，我也同时失学回乡，在农业合作社从事农业生产。7月，父亲把北京招工的人民日报广告交给我，在父母亲 and 全家人的大力支持下，我考入北京第一机床厂。我这一生中的重大转折，不仅决定了我的前途和命运，甚至还决定了我的子孙后代的前途和命运。

尔后我又走了非常关键的两步：1961年8月，我应征入伍的半年后，工厂

精减了1958年从农村招收的全部工人回原籍；1964年11月，我提为少尉正排级排长的一个月后，我团复员战士一律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后两步取决于时机和我的主观努力。如果有一步失足，我就只能是原籍的农民或新疆兵团的战士，也就不会有我和我的子孙后代的今天。

10. 亲身经历了工农兵学商。1958年7月以前，我是原籍的农民；后考入北京一机床，先后在工厂近30年；在部队近15年，期间曾多年从事农业生产，还经营过商店；1986年9月毕业于北京自修大学；1995年以来，为南街直接推销了数千斤产品，1998年9月9日，创办了南街驻涿州代办处，经常在大中商场和农村集市闯商海。间接推销了数十吨南街产品，产品销往高碑店、涑水、易县等地，并与固安、保定代办处联手协作。

二、在从事18种平凡的工作中，上级党组织为鼓励我，给我了一些过高的荣誉。

1. 1959年12月，在一机床（试造C后）改为重型车间学徒时，被评为厂级优秀徒工。

2. 1960年10月，在重型车间任桥式电动起重机司机时加入共青团。12月，被评为厂级红旗手。

3. 1961年12月，在591团炮兵营高射机枪排任二枪手时，递交了入党申请，被评为五好战士。

4. 1962年12月，调特务连警卫排任战士时，任连革命战士委员会副主任，被评为五好战士。

5. 1963年6月30日，在警卫排任战士时，由政治指导员姚仲和、班长邢玉金介绍，在同年入伍的战士中第一批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被评为五好战士；荣立三等功一次。1964年6月，按期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6. 1964年2月，调特务连侦察排任班长；4月，在唐山市出席24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1月，提升为侦察排长；增选为连党支部委员。1965年2月赴海南岛游泳集训，留任教练近3个月。

7. 1966年7月，调北京卫戍区司令部侦察处任见习参谋。10月，合并到作战处；后作战处与警卫处合并为作战警卫处，任作战警卫参谋。1968年9月，被评为卫戍区直属机关、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1969年5月，珍宝岛

自卫反击战告捷不久，苏军针对我国屯兵百万，战争一触即发。为巩固北疆，由毛主席批示，组建了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未等组织动员，我即刻接连3次请调兵团战备值班连队屯垦戍边。

8. 1969年6月，调兵团2师15团3连（武装战备连）任副连长。不久，卫戍区何尚纯副司令员亲笔给我回信，鼓励我在边疆建功立业，为卫戍区增光添彩。1970年1月，任代理连长，在呼和浩特市出席了兵团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了郑维山司令员等军区和兵团首长的亲切接见。7月，任政治指导员。1971年10月，调5连（武装战备连）任连长。1974年2月，调粮站（综合加工厂）任主席兼党支部书记。1975年1月，调团司令部任生产参谋。5月，兵团改为国营农场；12月，服从组织分配复员回北京一机床厂，随之全家在京落户。

9. 1976年1月，任一机床厂重型车间政工员；6月，任人事劳资员。12月，被评为厂级先进工作者。1978年3月，调党委组织部任人事档案干事；1979年12月，被选为党委机关党支部组织委员，连任近12年。1984年5月，任组织干事兼党委组织员。1989年1月，任党委宣传部宣传干事，厂报编辑。1991年11月，调干部处任干部干事。1991年12月，评定为政治工作师。期间，1986年12月，被评为厂级先进工作者；7次被评为厂级优秀党员。

10. 1993年2月，调老干部办公室任老干部干事。1997年10月，被评为北京市先进老干部工作者。

退休后，一直在河北、河南、内蒙古、山东等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南街的光辉业绩，从未在京居住。

三、在学习、工作、斗争实践中逐步增强了学习、研究、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的自觉性和紧迫感。

1. 接受毛泽东思想的启蒙教育。父亲于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在北京出席了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首长的亲切接见。母亲富有中国农村妇女的传统美德，全力支持父亲的工作，是标准的贤妻良母。

早在我学龄前，父母亲和大姐、大哥杨如金、二姐、三姐（姐姐出嫁后即无名字）、二哥杨如银（我最小）就经常教育我要听党和毛主席的话。我入学后，

哥哥、嫂嫂、姐姐们以趣味小故事为榜样，对党和毛主席都怀有深厚的感情。全家人遵纪守法、团结和睦。虽然生活都不算富裕，但却体现了大家庭的温暖与祥和。在我幼小、少年时期就热爱党和毛主席，是唱着《东方红》成长起来的。

2. 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周总理。1959年10月1日，我作为首都工人游行队伍的一员，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首长的检阅；第一次非常幸福地看到了毛主席、周总理；还参加了盛大的焰火联欢晚会。

3. 抄写《毛泽东著作选读》。刚入伍时，每个班只发给一本近200页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书店里也无毛主席著作。为便于学习，在不影响别人学习的前提下，我挤时间全文抄了一本，从此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至今。

4. 学习雷锋好榜样。1963年3月，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在全国、全军很快掀起了像雷锋同志那样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我把立功奖给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献给了连图书室。

5. 组织、带领大家学习。全军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典型的动人事迹深深教育、启发了我，使我逐步明确了方向。任班长后，不仅自己首先要学习好，当好表率，还要设法组织、带领大家学习，把学习高潮逐步引向深入、持久。

6. 抓紧点滴时间，系统学习理论。调卫戍区后，警卫任务非常繁忙，越是节假日越忙。我就挤出点滴时间，如饥似渴地攻读《毛泽东选集》4卷合订本。通读与精读相结合，理论也实践相结合，学习典型与自身相结合。

7. 带领知青改造主、客观世界。兵团的各项任务繁重，生活比较艰苦。不论担任何种职务，我都注重组织、带领广大兵团战士坚持学习毛泽东思想，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使连队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课堂。

8. 在逆流中勇进。1976年9月9日下午3时，惊闻毛主席逝世的噩耗，使我万分悲痛。9月18日，我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为毛主席举行的追悼大会。此后，每逢9月9日，我都停止一切娱乐活动，深切怀念毛主席的沉痛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多次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多次举办一些纪念毛主席逝世日的悼念活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毛泽东思想的地位的作用也逐步受到削弱。有的人打着“改革”的招牌，公然否定、丑化、诋毁

毛泽东思想，丑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甚至把毛泽东思想中最正确的理论与实践竟然诬陷为“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同时公然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竟然把勇于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干部加以撤职、惩罚；把坚定信仰毛泽东思想的党员、群众诬陷为“极左分子”。面对严峻的现实，更增强了我学习、研究、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的自觉性、紧迫感和责任感。

1979年，我在精读毛主席著作的同时，摘录了大量的毛主席的名言、警句；从1980年1月1日起，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每天都坚持至少学习并摘录毛主席的一段论述或论点。数千个节假日、数千个夜晚我都是在厂总值班室或办公室度过的；为购买有关毛泽东思想的书籍、杂志支出了数千元；为搜集一整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红旗》杂志，数千次地前往旧书店、废品站、废品收集点。为了取得废品站的同情和支持，经常要把数千斤的废本册整理得整整齐齐。数千次地向误解毛泽东思想的同志加以耐心解释；数千次地据理反驳恶意诽谤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人，甚至勇于向领导者、理论研究者据理争辩。同时也数千次地遭受冷讽热嘲、打击报复，甚至遭受诬陷，但从不退缩。

我敬佩的张新旗老师于1969年入党，1996年7月有加入我们研究会，1997年出席了在呼和浩特召开的全国毛泽东思想学术理论研究会。和我同时被批准为南街村荣誉村民。在从教36年中，曾任过小学校长、中学教师、幼教高级教师，曾两次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虽出身于高干家庭，即始终保持着普通工人、农民的优秀品德。从幼年就接受毛泽东思想的熏陶，坚持学习、研究、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几十年如一日；在从事毛泽东思想的启蒙教育中成就显著。具有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多项艺术才能，精通音乐、舞蹈、钢琴、手风琴等，善于运用文艺形式宣传毛泽东思想。带病苦练艺术基本功，虽已年近六旬，仍每天坚持近300度的后弯腰，90度的劈叉，演奏乐器。勇于冲破重重阻力坚持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尊老爱幼、艰苦奋斗。是我学习的楷模，同一战壕中最亲密的战友。为我们共同的追求和事业付出了艰辛的劳作和沉重的代价。

我们共同为研究传抄写了20多万字的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书稿；编印出席研究会的论文（宣传南街的资料）9份，约6万多字，编印了《毛泽东选集》4卷三种版本的页码对照表，并随论文印刷，共印刷45000多份广泛宣传。共送往南街约3000多份。还经常协助我搜集《红旗》杂志和其他书籍、杂志、资料。

9. 壮大学习、研究、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队伍。经过大量的筹备工作，于1991年3月5日发起成立了我厂毛泽东思想业余自学小组，后改为研讨班，学员由5人增加到67人，其中16人是由张老师介绍的。与张老师共同编印学习资料150期，每期刻印100份发至学员。创办了《毛泽东思想宣传专栏》，共编写396期。所需经费全部自理，未要厂里一分钱。

10. 学习南街好榜样。从1994年3月8日的《中国青年报》上才获知南街人民用毛泽东思想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辉煌业绩，我们读后格外欣喜，5月初即前往学习、参观，至今已前往11次。南街人民是我们学习的光学榜样。

四、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和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自觉养成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1. 超标准数倍缴纳党费。1964年后，我每月发津贴费66元。1965年6月，改套行政22级，每月减为60元。月标准党费为0.30元，从此我每月缴纳党费2元。20多年后，每月又增加到5元。至今共多缴纳党费500多元。

2. 自费出席全国毛泽东思想研究会。10次出席研究会的费用全部自理。理事会照顾我免收每次的会务费300元，使我非常感激。但为尽一名会员的义务，减轻研究会经济负担，我每次仍全额缴纳。为节省支出，均乘火车硬座往返安顿、厦门、德阳等市。会期自行住会址附近低价的旅店、招待所；自费印刷论文（资料），共支出8000多元。

3. 骑自行车往返天津出席研究会。1991年12月，骑车赴天津南开大学出席会议。回京时顶着五六级的西北风，一步不蹬都走不动，还遇7级以上大风，只好下车推行，早5点出发，傍晚才到厂，饱经劳累、饥寒的磨炼。

4. 尽量不给南街人民增加经济负担。自我被批准为南街荣誉村民后，曾7次前往南街，每次前往，办公室的同志都热情接待，安排我在宾馆免费食宿，除一次陪同宾客外，均婉言谢绝，自费自行安排食宿。1999年5月，我带领客户前往南街，请客户在宾馆免费食宿，我在取得客户谅解后，仍自行在宾馆外自费食宿。自觉为南街人民分忧。

5. 请客户免费品尝南街食品。为扩大南街的影响和所产食品的知名度，我自费购买南街食品后，前往一些商家介绍南街食品，并请商家免费品尝。还经常作为礼物赠送给老师、新朋等。在经营南街食品中只赔不赚。

6. 义务借阅、售书。我和张老师在厂里开设了毛泽东思想图书站，把图书义务提供给大家借阅。中央文献出版社以8折优惠我们义务为广大职工代购图书。还为厂党委和外单位优惠购买了大量的政治图书。

7. 春节除夕长途骑车遭冷遇。1998年以来，骑自行车带着南街食品仅往返涿州300多里就20多次。1999年除夕，骑车带着15箱南街食品去涿州过春节。尽管天气寒冷，也要脱下毛衣裤，途径北京南大门琉璃河，进入工商银行短暂避寒餐饮。为免去穿脱毛衣裤的麻烦，我坐在了靠暖气的座位上，正准备餐饮，经警就往门外赶我，不论怎么向他解释，介绍南街简况，都硬要赶我出门不可。没走出几步，我又急中生智地进入门内准备存款100元。经警只好哑口无言，我虽无心再餐饮，但继续宣传南街的业绩，最终赢得了经警和人们的理解与同情。

途中，我由此联想了很多：如果我花几元钱去餐馆餐饮，服务员会笑迎入内；如果我在家过年，就更称心如意；难怪有人说，在市场经济中，金钱虽不万能，但没有金钱却万万不能；成千上万的人为了金钱，却葬送在金钱的万丈深渊之中……

8. 出行宣传不畏艰辛。退休后，自行支配的时间虽然多了，但健康状况和体质却明显下降，尤其是美尼尔综合征（头痛、恶心、呕吐）等病时常困扰着我，虽然尽量骑自行车宣传，但乘火车、汽车长途出行宣传明显增多。为节省开支，不惜赶早或拖晚出行，尽可能乘坐非空调的普快或普客火车及普通汽车，这类百姓车往往格外拥挤，往往要站立几小时。为减少去厕所的次数，只好尽量少喝水。为节省食宿费，时常要在普通候车室等候几小时。餐饮、食宿力求低标准，2003年春节期间在内蒙古，冒着严寒却住在无取暖条件的旅店、招待所内。短程就尽可能步行。

9. 制作醒目的宣传品。把有关南街的图片缝制在大红布横幅上，悬挂在繁华市区展览。以“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为背景的图片为景，制作了2幅各1平米多的“南街村毛泽东思想宣传车”和以东方红广场为背景，制作了2幅各1.5平米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建设南街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喷绘宣传品广为宣传。

10. 克己为公，遵纪守法。以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倡导的“两个务必”

为座右铭，自觉遵守党纪国法，自觉履行党员义务，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侵蚀。学习、工作上高标准，日常生活上低标准。从未有较大过失，从未受过任何处分。从不操办过生日，从不抽烟、喝酒，从不下棋、打牌。唯一的业余爱好是读书学习。

五、40多年来，有些事没有做好，甚至没有做到，内心总感到不安，甚至感到羞愧，成为终生遗憾。

1. 参加工作的44年中，入党40年来，学习、工作等方面平平淡淡，辜负了党和人民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

2. 在学习、研究、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实践中，还停留在一般化状态，现实与愿望的差距还很大。

3. 在用毛泽东思想建设南街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实践中，还未尽到一名荣誉村民的责任。

4. 在兵团工作期间，对战士在政治、生活等方面关心、照顾不够，辜负了他们和其亲属对我的殷切期望。

5. 复员前申请调西藏边防部队和复员后三次申请参加援藏工作队的迫切愿望均未能实现。

6. 1996年9月9日就确定退休后骑自行车走遍全国县以上地区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南街的愿望，因病至今未能启程。

7. 对老首长、老师、师傅、长辈；对亲属、家人、晚辈均未尽到自己的责任，辜负了他们对我的殷切期望。

8. 对父母亲未尽孝心。病重、病危时未能回原籍尽孝；病故后又未能回原籍为父母亲守灵、送葬、祭奠。

9. 为最大限度地集中我的精力和财力学习、研究、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我只好舍小家，顾大家。

10. 有的人，甚至我的少数家人不能客观、公正地理解我，甚至把我的功绩也误认为是谬误。

六、毛主席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死后，下述就是我的正式遗嘱。恳请朝阳区人民法院、朝阳区公证处认可。

1. 最首要、最关键的是我要选定最信赖的遗嘱执行人，经我长期地反复思

考，特恳请我的恩师张新旗为遗嘱执行人，全权处理我的一切后事。任何人，尤其是任何亲属、家人丝毫无权以任何借口加以干涉、阻挠。

2. 在我处于病危状态又无抢救价值时，要果断放弃一切抢救措施，全权代我签字实施安乐死。

3. 从我最后一个月的退休金中支出 1000 元，代我向南街村党委缴纳最后一次党费；向研究会汇报。

4. 将遗体无偿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与首都医科大学遗体接受站联系。遗体全部由医科大学全权处理。

5. 遗体着单军装、军大衣（便于医学脱衣），见毛主席后，我还要请求领导担任保卫毛主席的作战警卫参谋或战士。

6. 只拍一张遗体照，不举行任何形式的遗体告别仪式，永不留骨灰；永不原籍杨氏墓地搞任何形式的入葬。

7. 前往医保机关结算医疗费，自付部分完全由张新旗老师代付；并请张新旗老师代我还清所有借债。领取殡葬费。

8. 前往退休职工管理机关注销退休金；前往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注销户口。死亡证请张新旗老师收存。

9. 待办理完所有后事手续后再通知家人，给原籍杨承春寄封不足百字的挂号信。原籍亲属不要去北京我家。

10. 我是无产者，我也未继承父母亲的任何遗产。所有遗物由张新旗老师全权处理，任何人绝不许干涉、阻挠。

愿中国共产党世世代代更加伟大、光荣、正确；党的指导思想永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世世代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愿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愿南街共产主义小社区建设得更加美好，并在全中国、全世界建成更多、更好的南街村式的共产主义小社区，强有力地促进共产主义社会的早日实现。

主送：朝阳区公证处、南街村党委、韩荣璋副会长、何尚纯副司令员。

注：上述由杨如玉亲笔书写（杨如玉章）。

【资料】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 15 团二连简介

雷霆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于1969年初组建。二师15团是在原五原县建丰农场基础上组建的，建丰农场地处五原县和胜乡境内，行政归属内蒙古劳改局，其二分场位于建丰农场场部正东方向五里地处。在兵团组建之前，二分场除7名管理人员外，其余大部分是劳改刑满就业人员以及这两部分人的配偶及子女。

随着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组建，建丰农场改制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15团，整个兵团归由北京军区领导。二分场随之改为二连。大部分刑满就业人员迁出，只留有部分表现良好有技术特长人员及其家属20余人。新建的二连，连队领导以北京军区所属部队派出的现役军人为主，连队成员包括复员转业军人，以及大批接收的来自城市的中学生。二连存在期间，知识青年是连队的主要组成人员。二连曾是15团规模最大的连队之一。

至1975年兵团撤建，恢复为建丰农场，由巴盟农管局接管。现役军人撤离，复转军人留场成为农场职工。此后知识青年大批返城，农场职工严重减员，无法维持正常的农业生产。为此巴盟农管局批准一部分农工指标。新增农工主要来源于原场及留场职工的子弟、亲属，大都是内地农村投靠亲友，成为农场的主要人员。二连和所有内蒙生产建设兵团的连队一样，由兴盛到消失，成为历史。

四十年后，当年二连知青重写二连的简况，记录史实，以资史乘。

一、人员组成：

1. 组建第一年即一九六九年，二连接收人员如下：

- 原华北农垦兵团部分干部和职工69年3月14日先期到达；（17人）
- 北京军区现役军人作为团连级的管理干部先后到达；（前后7人）
- 北京市电报大楼的职工及其家属69年3月作为下干校到达；（约20人）
- 复员转业军人于1969年4月到达；（约30余人）
- 内蒙古文联个别人员到达；旺亲1人

- 北京市地区医院派出的医务人员到达；裴医生
- 呼市粮食干部学校部分学生于1969年3月毕业分配到二连；
- 呼和浩特地区中学生于1969年3月5日作为知青第一批到达；
- 北京地区中学生于1969年3月30日第二批到达；
- 北京地区中学生于1969年4月12日第三批到达；
- 呼和浩特地区中学生于1969年5月8日第四批到达；
- 天津地区中学生于1969年5月17日第五批到达；
- 保定地区中学生于1969年8月18日第六批到达；
- 北京地区中学生于1969年8月23日第七批到达；
- 北京地区中学生于1969年8月29日第八批到达；
- 北京地区中学生于1969年9月5日第九批到达；
- 北京地区中学生于1969年9月11日第十批到达；
- 原建丰农场二分场管理干部及部分职工及其成年子女均成为兵团编制。

2. 一九六九年后，二连又接受了如下人员：

- 北京地区中学生若干人于1970年到达；
- 由15团六连调入两个女班，两个男班、由15团七连调入一个女生班；
- 由二师六十二团调入部分人员，主要是天津地区的中学生（约30人）
- 由二师二十团调入男女生各一个班，主要是温州、绍兴和青岛地区的中学生（约30人）
- 由兵团司令部警卫通讯班调入个别人员，为浙江地区中学生；
- 呼市地区低年级中学生于1974年到达；

二连人数在六九年底达到最高峰，约为670人，知青分别是来自京津呼包头温州绍兴青岛地区的中学生，以初中学生为主。69年底为组建新九连，调出约200人，后又调往180电厂一个班，调往兵团化肥厂一个班。二连人员数目基本维持为450人左右。

二、建制

1. 1969年组建后二连建制为7个排。其中3个男生排，3个女生排，编号1-6排，为大田排，大田排每排为4个班。另设1个后勤排，包括猪羊马号和1个铁木工班。连里直属1个实验田班，2个食堂，1个卫生室、1个小卖部；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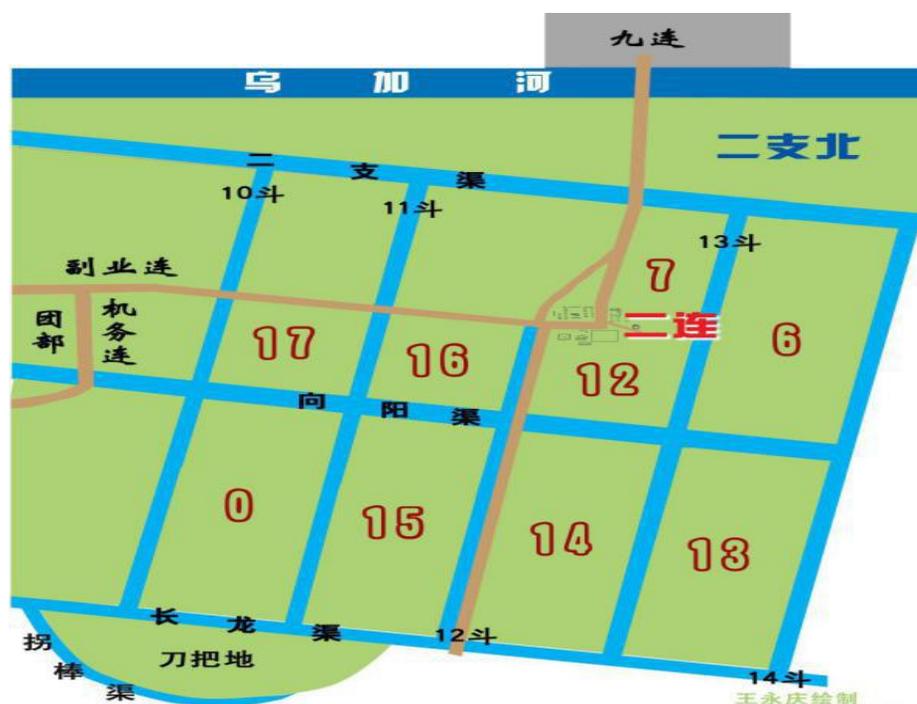
部设文书，统计员和通讯员各1名。现役军人为指导员1名，副指导员1名，连长1名，副连长2名，军医1名，共五名。

2. 1970年与九连分连之后，二连建制为8个排。其中三个男生排，三个女生排，每排4个班。其中6排为半农半副排，将菜班积肥班归入6排。8排为后勤排，其余为大田排，连部编制不变。

3. 1974年二连调整为男女合排，全连共四个排。其中1排和4排合并为1排；2排和7排合并为2排；3排和5排合并为3排；6排拆分撤销建制。后勤排仍为原编制，连部编制不变。并将土地粗分到各排负责。

三、二连所属土地面积

二连最初土地面积可耕地为10000余亩，分连后划拨九连2000亩。二连常年耕种土地面积为8000余亩。地号为：0号地，6号地，7号地（营房所在地），13号地、14号地、15号地、16号地、17号地。（见示意图）



四、二连农作物种类：

1. 小麦品种为：欧柔、良来有、华农五号、白欧柔（自己培育品种），种植亩数约为6000亩

2. 水稻品种为：富国2号、珍珠矮、东方红，种植亩数约为1000余亩

3. 高粱品种为：同杂2号、同杂3号、黑龙11不育系、5903-73-84，种植亩数约为100亩
4. 谷子品种为：小黄谷、东方亮，
5. 土豆品种为：白发财、里外黄 种植亩数约为50余亩
6. 玉米品种：金皇后、白马牙、百日熟、英粒子、中杂44，
7. 豌豆品种为：狼山青、多纳夫，阿拉斯加；
8. 胡麻品种为：雁农1号、雁农10号，种植面积100亩
9. 其他农作物还有：苜蓿100亩，向日葵与胡萝卜间种100亩。蚕豆300亩，糜子、黑豆、黄豆等等

五、二连粮食产量

- 1969年 110万（未分连）
1970年 40万斤
1971年 70万斤
1972年 50万斤
1973年 50万斤
1974年 50万斤

六、二连畜牧业状况：

1. 69年接手原建丰二分场时畜牧业情况如下：
马100余匹、牛50余头、羊500只、猪100余头，鸡兔若干
2. 与九连分连后将二分之一的马牛划给九连。
至75年二连畜牧业情况如下：马40余匹、牛20余头、羊500只、猪40余头，鸡兔鸭若干。📷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成为本刊会员，遵守本刊规定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宗旨，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刊训。遵奉众生平等，百家争鸣之精神，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本刊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着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方惜辰，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